民國叢書

第四編

·97·

綜合類

汪精衛集

汪精衛著

上海書店

汪精衛集

第三卷

汪精衛著

□演講□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

中國國民黨的宣言，已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的公布了。宣言的內容，已明明白白的揭露出來，供黨內外人的研究和討論。我如今所要說的，卻是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宣言？又何以將此宣言公布於天下？

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同志，在今日的環境中，精神上有一種說不盡的苦痛：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我們根據主義來建設中國，理想上現狀是要如彼如彼的，而今日的現狀，卻是如此如此，難道我們當日的革命，是要做成如此的現狀的麼？那必不然，然則革命以後，中國的現狀，何以竟至如此？

中國以內，無論何處，都是曾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的。自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以後，所

發生出來的現狀，卻是武人猖獗，官僚放恣，真真是民不聊生，和革命的主義，立於極端反對的地位。

這些現狀，自北京以至凡在武人官僚勢力下之各處，是隨時隨地，無不發見的。這還可以說，以上各處，都已在反革命勢力盤據之下，然則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又如何呢？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以廣東為例，略說如下：

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有些教育計畫的設施，也有些縣知事民選的試辦，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然而按之實際，平民政治的基礎，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等問題，全未解決，在這種的地盤之上，施行種種革新的事業，設個極不堪的譬喻，就和一個人，身體上有了隱疾，卻將美麗的衣服，來遮住體膚，浮豔的脂粉，來掩住面容，是一樣的。這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也可想而知了。

十一年六月以後，至於今日，索性連那些裝飾品也不要了，赤裸裸的將渾身的隱疾暴露出來，古人說得好，「諱疾忌醫，」如今疾是不諱了，醫卻還是忌的。

十年冬間，有一個外國朋友，來看廣東。他對我說：「喂！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卻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只看見廣東，不看見國民黨了！」我聽了他這番話，只有置身無地。他又對我說：「我惟有希望你們撇了廣東，從新再做。」我答道：「我們撇了廣東不難，只是交給誰呢！難道交與吳佩孚麼？」他聽了也只有啞然，不知所答。

去年冬間，另有一個外國朋友，也是如此的說；他說：「你們不要苦心維持廣東的現狀了，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我答他：「我們不維持，交給誰維持？交給廣東一班羣衆麼？羣衆是不知道承受的；交給敵人麼！包管敵人比我們壞十倍；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得那樣壞。」他聽了，也是無言可答。

諸君！我不是將什麼「吉粟各六之言曰，」什麼「古里丹都之言曰，」來眩惑聽者；我不過因爲他們「旁觀者清」罷了。我也不是對於「吉粟各六」和「古里丹都」欺負他不知中國的事情，隨口抵賴，我且將理由寫在下面。

爲什麼我說「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敵人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試看

元年以來，至於今日，凡是坐在北京握著政權的，眞眞是隨時隨地有他們建設的機會，他們不但不去建設，反去縱他個人的私慾，平空的製造出許多亂子來，將一些建設的萌芽，都摧殘乾淨了；到今日，國勢危殆，民生憔悴，他們却一個個的趾高氣揚，視人命如魚肉，取帑如藏如拾芥，是不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

回頭看一年以來之廣東，吏治是無可言的，財政是無可言的，「賣公產」「拉夫」等等，成爲千夫所指的罪惡；然而一年以來之廣東，它的環境是怎麼樣的？北面呢，是敵兵數萬，由江西殺來；西面呢，是鄰寇數萬，由廣西殺來；東面和南面呢，是叛兵數萬仗著敵人的接濟，由東江和高雷殺來；眞眞是四面受敵。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率馳驅萬里轉戰經年的兵士，周圍苦戰，不「賣公產」拿什麼做餉？不「拉夫」拿什麼做運輸？這兩件事一做，其他吏治財政也就不用說了。敵人和叛兵方面，看準了不剷除這些革命黨，不能在民國以內，隨意橫行，故此拚命要將他剷除。這些革命黨也知道被他剷除，民國必然隨以斷送，故此拚命要和他抵禦。「我願意爲正義而犧牲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人亦必願意爲正義而犧牲，」試看

孫先生的幾番演說，對於廣東現狀，眞是迸出滿腔的熱血，和濺出滿眼的痛淚來，在革命黨勢力下之廣東，弄成這樣壞，眞眞是不得已的，不是安心的。

難道說一句「不得已」就算了麽？不然！不然！我還有話留在後面：

我如今先要問的，是我方纔所說的，「便將廣東交給廣東的羣衆，那廣東的羣衆，也不知道承受」這一句話，究竟確不確？我以爲是十分確的，因爲今日廣東羣衆的態度，對於革命黨和革命黨的敵人與叛徒，似乎還沒有判斷。他似乎說道「最好你們不搗亂，讓我過些太平日子；」至於爲什麽搗亂，爲什麽過不得太平日子，他似乎沒有過問。有時他受了軍隊的騷擾，也知忿怒，也知抵抗，但是他似乎祇知道討厭軍隊的騷擾，卻從未研究軍隊騷擾的來源，我眞佩服他在這樣亂糟糟的環境裏頭，能過這樣毫無容心的日子；因爲這樣，他荷包裏的錢，只有被人用賭局騙了去，用強硬手段搶了去，從沒有他自動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拿出錢來，因爲這樣，一樣的出錢，不但享不著福，反賺些罪來受。這樣的羣衆，便是將廣東交給他，他如何會承受，只有被敵人和叛徒從他手裏頭，一把搶了過去；不然，便是羣衆裏頭鑽出

幾個劣紳土棍，一把搶了過來；將羣衆任意的侮弄，接二連三，還是不休。

我不是只知咒詛敵人和叛徒，我不是只知埋怨羣衆，我對於革命黨不得已的行為，並沒有寬恕。是所要說的，只是要人人知道我們釀成今日的現狀，革命黨，反革命的敵人和叛徒，漠視革命的羣衆，都應該擔負責任。敵人和叛徒，是不肯擔負責任的，至於革命黨和羣衆，卻不能不擔負；那麼革命黨和羣衆便要商量一個共同擔負的方法。

說到這里，我且舉出廣州一個現狀來，做條引線——廣州當軍事緊急不得已而拉夫的時候，大街上一頂三人抬的轎子，中間坐着一位姨太太，滿身珠寶，安安逸逸的四下裏看着熱鬧，拉夫的走向前來，將中間的一名轎夫，拉過去了。這時候，前後兩名轎夫雖也能將轎子抬起，卻是風頭已大減了。姨太太怒容滿面，很很的咒罵「革命黨應該天誅地滅，為什麼滅了我的風頭」被拉去的轎夫，愁容滿面，心裏說道，「這可遭瘟了，眼見得要赴戰地工作了，幾時纔能夠回家呢？」這姨太太和轎夫兩個人一樣的心裏不快，一樣的唉聲歎氣，卻是一個祇為滅了伊的風頭，一個卻為身體和自由遭了意外。

姨太太的心裏頭，只要過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什麼革命黨，反革命黨，全不與伊相干；只要擾不着伊的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伊便什麼也不管；不然，便要咒罵的。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我自己是否和姨太太一樣，只要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如果是啊，我自己已不是革命黨，已成了革命黨的叛徒；第二要問的，在這戰事裏頭，能否容許有一部分的人什麼都不管，只會過他那安逸而有風頭日子；第三要問的，在這短時期內，我們人類，縱然做不到人人都過平等生活的日子，卻是能否容許過分的懶惰和過分的疲勞，永永的相形着。

轎夫的心裏頭，覺得我是一輩子沒人理會的；平時呢，將這身體來做牛馬似的生活；戰時呢，拿這性命往戰地裏送；什麼革命黨，什麼反革命黨，都和我沒相干。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應該怎麼樣？第一要問的，革命黨曾否想到有這一類的人，日日過這樣的生活，可曾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第二，如果想到了，想出方法了，何以不能實行？第三，這一類的人，決然是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的，然不願意，何以忍受呢？何以不能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何

以有人替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他竟不知道呢？

我們如此的一一追問下去，便可以明白革命的主義和革命所惹出來的現狀，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黨和羣衆還沒有眞正密切的結合。革命黨雖抱着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目的，却不能得羣衆自動的助力，所以不得已的乞靈於羣衆被動的助力了。然而被動的助力，是極單薄的，是極散漫的，不但不能供達到目的之用，反而把目的蒙蔽住了；所以纔有種種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演了出來；如今要除去這些現狀，惟有使羣衆明白主義的眞面目，惟有使羣衆知道爲革命而奮鬥，便是爲羣衆利益而奮鬥，也便爲自己利益而奮鬥；羣衆得不着利益的時候，自己決不會得着利益的，若然得着，便是羣衆的蟊賊了。如此，羣衆裏頭，對於革命黨，知道革命不單是他的事，知道不能將革命事業單望於他，他只是羣衆裏頭一個搖旗吶喊的先鋒，羣衆却是他的大隊，羣衆裏頭，雖然還有些人，只圖自己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然而因爲這是羣衆所不許的，他也不能不跟着羣衆的意思做了。在奮鬥的時期之內，羣衆裏頭，雖然還是捱着痛苦準備着犧牲，也許痛苦和犧牲的程度比前更利

害，然而痛苦是有代價的，犧牲是有目的的，由被動的地位，進而至於自動的地位，不但良心安慰得多，便是勇氣也增長得多了。這樣做去，眼前一切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消滅了，根據主義而發生的現狀，自然便漸漸的發生出來了。

革命黨如何能和羣衆做眞正密切的結合呢？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第二要向羣衆宣傳。

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中國國民黨總有此次的宣言。宣言的第一段，將中國的現狀，毫不隱諱的揭露出來，便和一個人將自已的疾病傾吐出來一樣；第二段將中國國民黨的主義，詳細的解釋一過，便和對着疾病擬出根本療治的藥方一樣；第三段將最少限度的政綱，鄭重的列舉出來，便和對着疾病施行救急與看護一樣；中國國民黨是否在羣衆利益着眼，是否願意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看了這宣言也可以明白了。

羣衆啊，現時中國的病狀，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對於這病狀療治方法，是否如宣言所說的？如其是啊，宣言的實行，便是羣衆的責任。

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諸君，今日是實業部演講會第三日，亦卽是最後之三日。演題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第一日邵元冲先生的演講，將歐美實業發達之歷史，及大戰前後歐美各國之實業狀況，詳細說明。第二日廖仲愷先生的演講，將中國實業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聽了邵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因爲實業發達之故，在國內釀成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國外釀成掠奪殖民地的趨勢。這種趨勢，直使地球上五大洲，有三大洲半，改變了顏色。地球上五大人種，有三大人種半，陷於滅亡或奴隸的境遇。其意義可謂非常危險，非常重大。聽了廖先生的演講，可知道歐美的帝國主義，已侵入中國。要使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地圖跟着變色，人種跟著滅亡或做奴隸。其意義可謂非常重大，非常急迫，邵先生的演講，好像說明一種流行病正在世界上猖獗，廖先生演講，好像此一種流行病已流到中國來了。然則今日的演講，

便好像說明對於這一種流行病，應該如何醫治，只是兄弟才力薄弱，恐怕不能勝演講之任。只不過略述一些愚見，來引起諸君的討論便了。

所謂救濟方法，說來本有種種，好像對於疾病，有種種藥劑。只要他能對症，能有效，便是好。不然便是壞。如今試將中國過去及現在所用方法，略加敍述，並附以批評。

帝國主義之侵入中國，第一幕悲劇，便是鴉片戰爭。那時候，英國對於中國，和對於其他各處的殖民地一樣，照例的要達到他掠奪原料消售商品種種實業上的願望。爲達到這些願望，不惜以武力來壓迫中國。那時候中國雖然沒有十分明瞭他的用意，却還知道抵抗，只是抵抗的方法，太不高明。我們廣州人，總還記得，那時候有一段狠可笑的故事，是「楊侯爺擺屎桶陣。」以一個身經百戰的楊芳，看見英國軍隊的槍砲利害，却認爲是一種妖法，便去徵發滿城裏的屎桶，擺在城上，要將污穢之氣，來壓治他。試問這些方法，如何能有效驗呢。從那時候，一直鬧到庚子，中國依然想不出別樣抵抗的方法，只不過把擺屎桶陣，改做練拳頭舞大刀，其沒有效驗，可不是和屎桶陣一樣。如今批評起來，不能不說這些方法是至愚極蠢。

然而帝國主義為達到他的願望，不惜以武力來壓迫。中國為阻止他達到願望，不惜以武力來抵抗，却還是針鋒相對。

庚子以後，中國因為抵抗的方法，沒有效驗，便索性不去抵抗了。大家抱着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來歡迎帝國主義。歡迎他到中國來掠奪原料，消售商品，歡迎他來制中國實業的死命，歡迎他來制中國社會經濟國家財政的死命。一般人民漸漸的以洋貨為時髦，以國貨為背時的東西，這種見解，漸漸的成為風氣。更有少數的敗類，依附帝國主義的勢力，為虎作倀。於是一種「買辦式」始而流行於實業界，終至流行於政治界。及至買辦式有了左右中國政治的勢力，中國之離去亡國滅種，便不遠了。他們提起了從前擺屎桶陣，練拳頭，舞大刀的人，都大笑的說是野蠻。其實他們的愛國心和人格，比起從前那些人，眞眞是有雲泥之隔。如果照着他們這樣的做去，殷鑒不遠，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及南洋羣島的棕色種人，以及印度緬甸安南，便是榜樣。

如上所說，抵抗是不可少的。如今所要研究的，祇是抵抗的方法。舊的抵抗方法，我等已

知道不適用了，則不能不更求新的抵抗方法。好像我們對於一種流行病的藥劑，不能治愈，則不能不更求新的藥劑。剛纔說過，這種流行病，是由世界傳到中國來的，因此我們研究新的藥劑，便不能不求之於世界。如今世界的現狀，就一方面說，歐美是帝國主義的發源地。其他三大洲有半，是帝國主義的對象，便是所謂殖民地。所以全世界裏頭，顯然分出兩個階級。然而就他一方面說，便是歐美的國家裏頭，也顯然分出兩個階級。剛纔說過，歐美各國實業雖然發達，可是土地資本都操於極少數人之手，以致釀成國內貧富不均的現象。同時因爲掠奪殖民地的緣故，這一國也來掠奪，那一國也來掠奪。互相掠奪的結果，變成這一國和那一國的戰爭，因之便有所謂戰勝國和戰敗國。而所謂勝敗，不過暫時的現象，不是恆久的現象。所以戰爭便無終止，惟此之故，歐美的人民，大多數的人民，都痛心疾首的，要解決這些問題。爲解決這些問題，便有了許多答案，這些答案，便是剛纔所說的藥劑，也便是剛纔所說的方法了。如今試將這些答案略述一下。

一是社會政策。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並沒有設法改

造，只不過想做些彌縫補苴的功夫。例如調劑資本家，改良勞動者待遇等等，一些溫情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有時會出風頭。只不過揚湯止沸似的，並沒有根本解決的效用。有些人還痛恨這些政策，足以淆亂根本解決的目標，以為有不如無。這些政策，都是偏於國內貧富不均一方面的。卻是對於國際戰爭一方面，也有些類似的政策，如國際聯盟等等。這些已成為空想，甚至已成為笑話。

一是社會主義。他的內容，對於社會經濟組織，如土地制度資本制度等等，主張根本改造。要將私有制度改為公有制度，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他並且知道這樣的根本改造，單行於一國以內，是不能有效的。必須普行於各國，然後可以成功。故他主張聯合各國被壓迫的階級，一致努力以求實現。這樣，各國戰爭的原因，便根本取消了，世界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兩階級，便也根本打破了。

從前倡導社會主義的，不過根據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道德心。祇是一種理想，沒有實行的條件。所以被稱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又被稱為烏託邦社會主義。自從馬克思發明了唯物

史觀，然後社會主義有了實行的方法和步驟。所以被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別於理想的社會主義。

科學的社會主義，後來又有許多派別。然而他的究竟目的，是沒有不同的。簡單說來，便是剛纔所說，將土地資本等等私有制度，變爲公有制度。只不過達到目的之方法有許多不同便了。例如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改良的社會主義。如其爾特社會主義等便是。主張以革命破壞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者，謂之革命的社會主義。其中更可別爲兩大派，一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爲集產主義，或國家共產主義。一是蒲魯東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亦可名爲無政府共產主義。這兩大派的理想，最顯著的分別，一個是取得政權，一個是要否認政治，一個主張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主義的理想。一個主張由工團直接行動，以工團替代國家組織來實現主義的理想。

以上所說，不過是一種舉例的方法。關於社會主義，流派繁衍，學說深窩，斷不是這短時間的演講，可以說明的。如今所以用這一舉例的方法，無非借來說明世界上對於實業問題，

已有了這些答案，可以作爲解決的方法，至於那一種方法最爲適宜，不外剛纔所說的，只要能對症能有效，便是適宜。世界的流行病，雖祗是一種，而各國家各民族感受的程度，却不能盡同。因而所採療治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只不過對於大原則，却都是逃不了的。說到這裏，似乎應該將各國療治的方法，略述一下，以作參攷。然而因爲時間的限制，只能把一個最舊的，和一個最新的，來做舉例。

那一個是最舊的呢便是維新五十餘年來之日本。當歐美帝國主義的風潮，捲到東亞，日本與中國，是陷於同一境遇的。而日本因國小民寡之故，較之中國尤爲岌岌可危，差不多要和安南緬甸一樣的失敗了去。然而日本何以能至今存在，且有獨立進步的現象呢。當美國兵艦初到日本停泊海口的時候，在美國是藉以示威，在日本果然舉國震驚，一般人民，看見小鳥似的兵艦，泊在海面，而都覺得莫知其然。有些志士見了這樣，又怕又恨，便提議約一班同志，各帶斧頭鑿子，泅至兵艦旁邊，將他鑿沉。誰知作了半刻，竟和螞蟻咬鯨魚似的，分毫沒損。那時候日本志士的知識，也和楊侯爺攏屎桶陣，義和團練拳頭舞大刀差不多，却是日本

志士，自此以後，對於歐美科學文明，得了深刻的印象，刺激起比較的觀念，和模仿的興味來了。維新的思想，便從此發軔。那時候，日本的天皇，是主張攘夷的。大將軍却是主張開港的，判斷起來，自然是大將軍的識力，優於天皇。日本志士，既然知道維新，自然是贊助大將軍以反對天皇的。誰知不然，日本志士，沒有不擁戴天皇的，因而發起「廢藩覆幕」的運動。這是什麼緣故呢？從來要維新必先要改造政治，要改造政治，必先要革命，這是一定不可易的。日本那時候，政治上的大權，在大將軍不在天皇。所謂天皇，不過是個虛器。而大將軍的基礎，却是建築於封建制度之上。幕府與諸藩，聯成一氣，把持政權。日本志士，看清題目，知道革命的目標，在打破封建制度。故以「廢藩覆幕」爲革命運動的標語。所謂擁戴天皇，不過爲一種手段能了。日本志士，因爲看清題目，所以政治改造，便告成功。可憐的中國，自曾國藩以至張之洞一班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一直的糊塗下去。康有爲一班人，便更走入邪路了。日本政治改造成功以後，一班志士，現出本來面目，再也不說什麼攘夷了。一面開港，一面舉國一致的努力於維新事業。將歐美新發明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盡量的輸入，盡量的模仿，幾十年

間，造成今日強大的地位。不但是歐美的帝國主義，不能侵入。不平等條約，老早消滅。領事裁判權等等，老早消滅，政治外交，完全獨立。便是實業經濟，也有一日千里之進步。日本人民，至今舉行什麼開港祭，來紀念開港的好處。一樣的黃面皮人，安南緬甸等，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至於滅亡。日本却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刺激其發榮滋長，這祇由於知道抵抗與不知道抵抗之一念啊！日本從前用斧頭鑿子，希冀鑿沉美國兵艦，抵抗的方法，是何等笨拙。至於今日，已以艦隊與美國爭衡於太平洋上，抵抗的方法，是何等進步。我們中國擺了屎桶陣，棟了拳頭，舞了大刀，至於今日，索性連抵抗的念頭也撇掉了。茫茫世界，只讓日本替黃面人爭氣，這是怎麼說呢！

日本的維新，光明的一方面，如上所述。至於黑暗的一方面又如何呢？剛纔說過，日本對於歐美盡量的模仿，自然連歐美的實業制度也模仿了去。如邵先生所說的，歐美實業狀況，一樁樁的都移殖到日本去了。國內貧富兩階級，登時便顯著出來。歐洲大戰時候，正是日本對外貿易最得意的時候。民國七年的約略統計，日本實業界，每年獲利至十三萬萬元。一般

實業家暴發戶的形象，無處安放。在旅館裏住一日，數元或十數元的結賬，却賞給了幾百元幾千元的茶錢，弄得非暴發戶不敢去住旅館，這也可說是窮奢極侈了。却是米風潮便也暴發於那時候。據一個中學教員的自述，說全家妻子，已經有三個月不能拿魚來下飯了。中學教員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極少數的人民，雖然因中日戰役，日俄戰役，日德戰役，得了不少的歡笑。然而大多數的人民，一片呻吟痛哭之聲，已從那些歡笑裏，直透了出來了。

日本國內貧富階級的軋轢，已經和歐美一樣。歐美所不能解除的痛苦，日本一樣不能解除。至於國際呢，日本從前恐怕受歐美的侵略，把自己變成殖民地。如今却已和歐美競爭，要將他人來做自己的殖民地了。滅了琉球，搶了台灣及澎湖列島，滅了高麗，搶了滿蒙一帶種種特權。榨取他人的脂膏和血汗，以滿足自己掠奪原料消售商品的欲望，比之歐美，更覺無微不至。所差的，歐美是取之於異種人，日本却取之於同種人罷了。這種現象，所生出來的結果，不外被壓迫者之反抗，與掠奪者之競爭。所以日本一面很高興的做壓迫同種人的事業，一面戰戰競競的做日美戰爭的準備。這兩者有一不如意，便該倒運。馬克思說得好，「資

本家自己掘墳墓來埋葬自己」帝國主義者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我們看清了日本光明和黑暗兩方面，便知道日本光明的原因，在於早自覺悟，能抵抗得住歐美帝國主義之侵入。這一方面是我們所贊歎羨慕的。其黑暗的方面，在於惟知盡量的模仿歐美，歐美亦步亦趨。歐美步趨的時候，猛跌一交，他以爲這猛跌一交是必要的，也就撲冬的跌了下去。換句說話，便是不知採用社會主義。我們中國一班時髦學者，見了這樣，便以爲步趨日本，是必要的。猛跌一交，自然也是必要。換句話說，便是將實業發達了再算，社會主義，且勿談起。這種謬誤，眞不可恕。須知日本維新在五十餘年以前，那時候，歐美貧富階級，還沒有現時這般懸絕，社會主義研究，還沒有現時這般精密，日本的猛跌一交，在情理上還可原諒。到了現時，日本已和歐美一樣，積重難返。欲求將社會經濟組織根本改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日本大多數人民，已經焦頭爛額的不知所措。我們中國維新已較日本落後了五十餘年。眼睜睜的看着全世界爲社會問題，彷徨歧路。而社會主義又淸淸楚楚的已指引了我們一條大路，我們一定還要學他人從前猛跌一交的玩意兒，跌入深坑裏或火坑裏

去。那可說是毫無人心了。

以上把最舊的說過，何以說他是最舊呢？因爲這是五十餘年前的事。如今該把最新的說一下了，何以說他是最新呢？因爲這是六七年來的事。人人知道：十八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法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政治革命的導師。二十世紀驚天動地的事，是俄國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世界經濟革命的導師。民國六年之冬，俄國多數黨推倒克倫斯基政府，實行他們的主義和理想，他們的領袖和黨徒，都是相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起初的時候，似乎要卽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然而不久便行新經濟政策，將國家共產主義的目標，移到遠些，此中原因，有些人說，這是豫定的計畫，當然的步驟。起初是以軍事便利爲目的，後來是以推行政策的次序爲目的，並非矛盾。有些人說，這是因時制宜的手段。起初原欲卽刻實現國家共產制度的。後來感覺環境的困難，纔采用新經濟政策，以對付一切。這正是俄國領袖之善於適應，這正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如今要詳細說明這些事實，一來材料不多，二來兄弟的知識有限，三來時間不夠。只得舉一個重要的例，來說明了。我們聽了邵先生所說，已經

知道十九世紀之後半期，俄國的經濟基礎，已由農業移於工業。工業的革新，次第舉行。政府之極端保護政策，更促進這般趨勢。產業之集中，幾幾乎和西歐諸國匹敵。於是勞動問題之發生；社會主義之運動，隨之而起。俄國多數黨得志之後，便要實行勞働者管理工場的計畫。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布命令，各工場受僱之工人選舉代表，組織工場委員會，以管理工場諸般事業。不消說得，一般資本家便逃得無影無縱了。工人得了管理工場的權利，固然高興。可是資本問題，怎樣解決呢？漸漸的資本缺乏，迫於眉睫了。一來沒有本錢來經營調度。二來沒有本錢收買原料和燃料等件。三來沒有本錢來支付工錢。這三樣一來，工場的經營，便有不得不停止之勢了。所以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全俄經濟會議，便生出『工人管理工場制度』和『國有工場制度』兩派之爭議。因爲鑒於情勢，『國有工場制度』，便占了優勝。於六月二十八日發布命令，將工場收歸國有。這就較之工人管理工場制度，容易辦些了。只是那時候的國家和政府，也是缺乏資本的，弄來弄去，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俄國國民經濟會議，便決定全國之中

小工業，得由國家貸與私人辦理。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七月五日發布命令，規定貸與之程序及方法。其命令之內容，極為重要，今述其大概。

一，高等經濟會議，以一定之期間為限，對於個人或團體，以國有工業貸與之。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要依從所有關於勞動法規之標準。

三，貸與人就於其工場之製品，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或販賣之。

四，除裁判判決之外，政府對於貸與人，不得為事業之收回，或特許條件之變更。

自此之後，中小工業，便漸漸的移於民業。有些人說道，「俄國放棄了共產主義了。」其實照第一二三項看來，便可恍然，如此設施，和現時資本制度之社會，大有不同了。至於大工業，因為需要大資本的緣故，竟將來貸與外國人。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布命令，其內容大概如下。

一，政府以一定之年限，得貸與國有工業。

二，貸與人僱使勞動者，於關於勞動法規之範圍內，得為任意之處分。

三，貸與人於法令之範圍內，得自由處分其生產品，且輸出其幾部。
四，在特許年限中，不有沒收放下於事業之財產，以歸國有。
五，特許年限完滿之際，政府得以相當之代價收囘之。
六，特許條件，無貸與人之同意，不得變更之。
七，貸與人關於生產之方法，行顯著之技術之改良進步，政府與以特別之保護。

此命令不止以工業為限，耕地，森林，礦山等亦在其內。在發布此命令之時，俄國政府豫定計劃，要將森林三十八處，礦山十九處，貸與外國人，有些人說道「這不止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簡直是歡迎外國資本主義之侵入了。」殊不知他有了第二第三兩項，外資儘管輸入，也無妨害。這正是能駕馭外資而不為外資所駕馭啊。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千頭萬緒，以上所述，不過舉工業一端，來做個例證。其餘各端，也就可以類推了。俄國的新經濟政策，以後還有變更沒有，此時不能豫言。但專就新經濟政策而論，俄國的決心勇氣，要將社會主義，逐步實現，已非其餘的國家所可企及了。

以上所述，還只是就俄國國內社會經濟組織來講。至於國際，又何如呢？俄國君主專制時代，是以帝國主義加入的。及勞農政府時代，帝國主義，早已放棄，却不能不防備他國以帝國主義相加了。如今舉一兩個例來說。在工人管理工場的時候，俄國政府，還沒有決定改歸國有。却因爲對德講和，派遣拉寧到德國做代表。那時候，德國政府，有些意思，希望俄國，將德國資本家在俄投資及經營之事業，於政府保護之下，依然作爲民業，繼續存在。德國政府這種希望，於俄國前途，關係極爲重大。如果俄國答應這種要求，不但各國一定援例照樣，便是俄國的資本家，也自然會和德國資本家結合起來，躲在德國資本家的背後，指揮操縱，新建設的社會制度，便被他破壞無餘了。拉寧探得這些消息，急忙致電俄國政府，請其從速發布工場國有命令，以杜絕德國政府此項要求。並且使德國政府於和約上承認俄國之國有工業制度。俄國政府接了拉甯來電，便毅然決定發布國有工業政策，這一場糾紛，纔得消弭於無形。及至俄國政府發布大工業貸與外國人之辦法以後，法國政府，認爲機會來到，教唆波蘭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將俄國軍略上之主要點，設法貸得，以便擺布陰謀。幸而俄國政府

偶然發覺，急忙將特許取消，纔算了事。看這一兩個例，便可知俄國防禦帝國主義之情形，至於練赤衛軍，以抵抗列強聯軍的干涉，事實顯著，更無容贅說了。

說到這裏，兄弟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照俄國現在情狀，如果有人恭維他道，「已經實現國家共產主義」，俄國政府的領袖，必然拱手的說，「不敢當，不敢當！」誰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有人說是「已經主張共產」，並且說是「廣州政府已決定於本年四月一日實行共產」，究竟這些話是恭維呢，還是刻薄呢。中國國民黨也只好說「不敢當，不敢當」罷了。

俄國的經濟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聽了以上所講，可以明白。然而俄國這一場革命，不但於俄國有極大的影響，並且於世界也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是促進了先進各國的經濟革命運動，和喚起了世界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無可疑的。

以上所說一個最舊的例，和一個最新的例，我們可以明白實業之救濟方法，既須明瞭目前的環境，又須明瞭將來的趨勢。明瞭目前的環境，方纔能定出步驟。明瞭將來的趨勢，方纔不至於一交跌入坑子裏。不然，縱有藥方，而旣不對症，又沒效用，還是等於無藥方啊。

如此，我們便要研究中國實業的救濟應該用何方法，廖先生已將中國實業之狀況，及產業落後之原因，詳細說明。對於產業落後之狀況，而來救濟，無疑無貳的是發達產業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中國今日共產二字，實在說不到。因爲中國今日實在是無產可共啊。然而有一問題於此，產業要怎樣纔能發達呢？換句話說，產業是靠誰去發達呢？如果照現時這樣的土地制度和資本制度，則發達產業的權柄，必操於極少數人之手。因之產業發達所得的利益，也必歸於極少數人之手。大多數人民，不但不能因產業發達，而得着利益，反因產業發達，而受着痛苦，正和歐美日本覆轍，一般無二。則中國又何貴有產業發達呢。所以企圖發達產業的時候，不但當注意生產的方面，同時還要注意分配的方面。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指生產缺乏；不均是指分配不均。春秋戰國時代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不要緊的。如今是世界交通時代，生產缺乏的結果，便會受帝國主義者所宰割。故此我們不能不患寡。但只患寡，是不夠的，歐美日本的覆轍具在，故同時不能不患不均。既然如此，便須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全國人民，在這公平的基礎之上，共同生產。他的生產力量，

自然來得又普遍，又偉大。而且生產共同，享受也共同，寡的問題，從此解決，不均的問題，也從此解決了。孔子復生，定然也點點頭兒，說是不錯的。

如此說來，我們可以明白，要對於中國實業之狀况，而施以救濟，惟有發達產業。要發達產業，惟有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這是不生異議的。如今要問的，是如何而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了。

要答這一問，至少要略知道本黨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內容，不外兩樣。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這兩樣便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適當方法，而且對於中國現狀，是極對症而又極有效的藥劑。

如今要問的，是怎樣平均地權了。要明白平均地權的意義，先要明白地權的意義。經濟學家眼光中的土地，有三種要質。（一）是面積。我們所行着的，站着的，住着的，都離不了土地，那塊土地，橫有多少，縱有多少，便叫做面積。（二）是肥富，一粒種子，種在地下，靠着地土的滋養，長成穀米，或長成樹林，所以叫做肥富。（三）是位置。一樣的土地，在交通阻塞之處，

和在交通便利之處，地的價值，便有大大的分別。在工業零落之處，和在工業繁盛之處，他的價值，也有大大的分別，所以叫做位置。我們要知道，土地之於人類生活，有重大關係，差不多除了空氣，便算他了。人無空氣，不過五分鐘，便不能生存，空氣是人人可以呼吸的，眞正算得是共產。然而這話也不免於樂觀，試想沒錢的人，住在又偪窄又汚穢的屋子裏，和有錢的人住在又高闊又通爽的屋子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其質的清濁，或量的豐歉，同不同呢？空氣尙且如此，何况土地。古人形容貧窮的人，說他貧無立錐。就是說他連立錐的土地面積都沒有。所立着的，都是別人的土地，住着的更不用說了。講到肥富，地主安而坐食油粘白米。佃農終歲勞動，利用肥富，種出穀子，舂成白米，供給地主，自己却要靠落花生和白薯芋頭來充饑。爲什麼這樣，無非因爲土地屬於地主，故此肥富也屬於地主。單拿面積和肥富來講，已經知道土地影響於人類生活之重大，眞個是一有百有，一無百無。至於位置，比起以上兩者，更是緊要。我們知道全國土地，都是以位置之不同，而定價值之不同的。通都大邑的土地，俗語叫做寸土寸金。比起荒村僻壤的土地，價值相差，自幾十倍以至幾萬倍不等。拿一個例來說，廣

州市長堤西濠口附近的土地，每一畝的價值，十八萬元。比起他處，相差何止百倍。比起廣州市以外各處，相差何止千倍萬倍。上海黃浦灘的土地，價值却比廣州市長堤西濠口的，又更貴了，同是一塊的土地，因爲旁邊開了馬路，或築了鐵路，價值登時就飛漲起來。因爲附近闢了商場，立了工廠，價值登時也飛漲起來。所以有土地的，便不愁窮。沒土地的，無論有如何本事，不能不受有土地的種種的敲詐勒索。古人說有土斯有財，眞眞是不錯的。只是論起來，那些馬路鐵路商場工廠和那地主本沒相干的。然則因爲開了馬路，築了鐵路，闢了商場，立了工廠，而使土地增加價值，這些價值也和那地主是沒相干的了。然而地主却安安穩穩的，享受那沒相干的利益。那地主是何等的僥倖，社會却是何等的寃枉呢？所以許多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不應歸私人所有，這實在是正當的道理。孫先生的平均地權，却是準於道理，而定出一種不偏不激的辦法。他的主張是，「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這樣一來，一班地皮朋友，收買土地，安坐而收社會生產之利益，並且藉以操縱社會生產之野心，便不得不消滅了。

「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定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這樣一來，原有的地主將價報實，政府便照價征稅。將價報低，政府便照價收買。日後那塊土地，因爲交通工業的影響，增加價值。無論增加至幾十倍幾萬倍，他所能坐享的，還是固有的價值。至於其餘的價值，既然是社會使之增加的，也還是社會來享受他。種種公益的事業，便不至經營無着了。一方面不剝削地主固有的利益，一方面維護社會生產的利益，這便是平均地權的概略。

如今要問的，是節制資本了。所謂節制資本，不是節制資本的數量，是節制資本的用途。孫先生建國方略中實業計畫，說得最爲詳細。他將實業分爲國家經營與私人企業兩種。「凡事業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奬勵之，兼以法律保護之。」這是規定私人企業的範圍。「凡事業之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是規定國家經營的範圍。這樣一來，一方面不束縛私人之活動能力。一方面不使私有資本制度得以操縱國民之生計。

這正和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彷彿相似。俄國將中小工業貸與私人，將大工業貸與外國人。其目的一在使私人資本得以供活動社會經濟之用，而不能為社會經濟之害。一在駕馭外資，以開發大工業，而不為外資所駕馭。俄國是由失敗的經驗，得來的知識，孫先生却是在於俄國革命以前運用自己的思想，豫先替中國革命以後，想定種種計畫，他的機器借款論，便是駕馭外資之絕好方法。為中國之產業發達計，所不可不采用的。可是國人對於孫先生的實業計畫還沒有十分認識，這眞是一件缺憾的事啊！

明白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概略，便可以知道這都是「將社會經濟組織置於公平的基礎之上」之最穩當最適宜的方法。若將這兩樣做到，一面可引中國到產業發達的路上去。一面可使中國不蹈歐美日本分配不均的覆轍，釀成社會革命的慘禍。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這樣，再沒別的方法了。

有些人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中國人人，得共同生產，共同享受，固然是好。只是一般實業家，聽了這話，未免失望。因為實業家辛辛苦苦，無非想享些豐亨豫大的幸福。如果地

權平均，資本節制，那裏還有這些指望呢。」這些說話，未免過於誤會。如今一般社會主義者，因為看見社會貧富不齊，既覺得為富不仁者，帶着無量數罪過，又覺得一般人民，都在那裏受着苦痛。所以本身提倡儉樸，來表示自己的理解，安做自己的良心。一班沒有見識的人，看見他們這樣便以為社會主義者，惡富好貧。他的主義實行之後，定然人人都變成乞丐模樣。殊不知社會主義者的究竟目的，正是要人人皆富。吳稚暉先生說得好，「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要將來人人都在街道上鋪着地氈行走，坐在游廊下，看着街上風景，一面吃飯。」試閉目想想，這是何等豐亨豫大的氣象呢。比之自己坐在一間鐵網似的房子裏，黑暗而美麗，吃着飯，聽着街上窮民啼飢號寒的聲浪，心中的苦樂，總不同罷。須知人類的欲望原有兩種。一是使用欲，一是支配欲。飢而思食，渴而思飲，寒而思衣等等，都是使用欲，日常生活，由簡樸以至於奢侈，程度雖有等等不同，都是在使用欲的範圍內。不惟不應該令他缺乏，且應該令他適當而充滿。如果不能適當而充滿，便是社會的缺乏，應該想法子求補救的。至於支配欲呢，却是超出於使用欲之上的。專想以自己的權力支配他人，這種支配欲，却是人類衝突之

根源，不可以不限制的。例如古人往往說「富有四海，」或「富有天下。」試想想，合四海天下之富，以爲己有，自己那裏用得這許多。可見不由於使用之需要，而由於支配之野心了。邵先生說過，美國的汽車大王科特，每年應納政府所得稅五百萬元，他每天的收入，其數可以類推。他要這些錢作何用呢，他一個人，連他一家子，終身使用，也使用不了這些錢。然則他所以要這些錢，不是爲他的需要，不過爲博得一個大王的頭銜罷了。這和古代帝王思想的，人殺了無數的人命，做成皇帝，然後說一句「吾今然後知皇帝之貴，」有什麽分別呢？我們明白了支配欲與人生幸福無關。其與人生幸福有關的，惟有使用欲。社會主義的實行，正所以供給人類使用欲之需要，使其得以適當而充滿。至於支配欲，却是社會主義所限制的。大約稍有良心的人，也決不至於有這些野心罷？然則實業家又何所失望於社會主義呢。况且民生主義，與所謂社會主義，系統條理，還有許多的不同。如剛纔已說過的，民生主義實行，我們中國人，一方面能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不容其侵入。一方面能使國內人民，共同生產，共同享受，使用欲各得適當而充滿。這眞是太平世界，人人得所。無論誰人，必然都歡欣鼓舞以求

其實現的。

以上所述，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除了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沒有第二樣，我們總可以相信。如今所要討論的，是怎樣的來實行這些救濟方法。

我們第一要知道的，這些救濟方法，必須是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方纔能當起實行的責任。如果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如何能為全民的利益着想。全民的利益，又如何能寄託於他的手裏呢？所以人民如果要握着經濟權，先要握着政治權。二十世紀之政治運動，無非藉以取得經濟權，從而保障已取得之經濟權便了，這可說是天經地義，不消多說了。

於是我們第二要知道的，人民如何纔能取得政治權呢？辛亥之役，推倒四千餘年之君主專制政體，和二百六十餘年之滿洲壓制，人民總可以取得政治權了。誰知卻被一班北洋軍閥，一把奪了過去。於是人民不得不向北洋軍閥來收回。論起北洋軍閥，他的地位和力量，如何比得上有四千餘年歷史之專制君主，和有二百六十餘年歷史之滿洲呢。只是他的背後，卻有外國帝國主義存在。人民要將他推倒，外國帝國主義卻要將他扶住。人民一連將他

推倒了幾次，外國帝國主義一連將他扶起了幾次。有癸丑的討袁，便有各國大借款來扶住袁世凱。有丁巳的護法，便有日本大借款來扶住北洋派。有癸亥的反直運動，便有各種巧立名目的借款來扶住曹吳。這些都是公然的事實，無論怎樣不能掩飾的。這般軍閥，恃着有外國帝國主義在他背後，就把什麼公理和民意，都不放在眼裏，一味的賣國殃民，無所不至。鬧了十三年，人民還沒奈何他。究竟那些外國帝國主義，以何原因，和這班軍閥，如此的要好呢？是不是這班軍閥的外交方法好呢？是不是這班軍閥的內政方法好呢？哈哈，這些話，只怕軍閥自己也不好意思承受。然則原因究竟在那裏呢？如果不把最近百數十年來世界歷史看得清楚，再也不得明白，如今邵先生廖先生，已經清清楚楚講了出來，外國帝國主義，既然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以便掠奪原料，消售商品。假使一旦中國把政治現狀改造一番，跟着經濟現狀也改造一番。那麼，中國便有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侵入的力量，他們意中的殖民地，便憑空的溜了過去，和他做對等的強國了。你想他們願意不願意，着急不着急呢，所以他們逼住想出了一條毒計，在中國抓些軍閥，來做傀儡，利用他去對付民黨，壓迫國民。使中國

革命事業，中途停頓。政治問題，沒得解決。經濟問題，沒得解決。然後他們方纔可以把心放下。一面扭扭捏捏的說「中國的內亂，使各國商務，受其影響，損失不少，」他們誠然不願中國內亂，因爲內亂是反抗軍閥的運動。他們最希望的，是連這些運動都沒有。全國人民一味的昏昏沉沉，由他擺布，這纔是他們惟一情願呵！舉一件最近的事來說，舊年曹錕想做總統，便將金錢收買議員，來做猪仔。一時烏烟瘴氣的，惹得人人笑罵。有人說道，「曹錕這樣胡鬧，恐怕各國不能承認罷。」我們聽見，幾乎忍笑不住，說道，「越發胡鬧，各國越承認得快。」果然曹錕就職，各國便一致的承認了。有好些人，還莫名其妙，只有顧維鈞，最爲伶俐。人只道，「顧維鈞做了外交總長，替曹錕幫忙，所以各國承認得快。」却不知道「顧維鈞善窺風色，知道各國承認，所以趕快幫忙。」這樣顚倒的見解，不知阻遲了中國幾多進步，眞是可歎。我們綜合了種種事實，敢決然說道，不抵抗外國帝國主義，是不能推倒軍閥的。一個軍閥推倒了去，又一個軍閥扶了起來，還如沒有推倒一樣。有人說道，「抵抗外國帝國主義，談何容易呢。」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這只看我們國民的決心和團結力至怎樣的程度便了。

以上所說，頭緒雖繁，賅括起來，不過幾句：第一步是，推倒軍閥，抵抗外國帝國主義；第二步是，建設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實行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便是中國實業之救濟方法！

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

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自立黨以來，至於今日，始終一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始，孫中山先生率領黨員，共同發誓，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所謂平均地權，便是民生主義之最要條件。後來發行民報，宣傳主義，登有一篇中山先生關於民生主義之演說。那時，中國人注意民生主義的很少，所以新民叢報譏誚我們，說是「希冀乞丐流氓大盜小偸之爲我用，」我們因他說了一大堆，却沒得一句道著民生主義，便和他筆戰了幾回，後來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了。

從那時候，以至於去年冬間，——國民黨改組以前，國民黨自己的出版和言論，無論是雜誌，是日報，是單行本，是公開的演說，是同志間的商榷，對於民生主義，沒有走過第二條路上去，也沒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走過第二條路上去。

却是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漸漸的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赤化了，已經主張共產了。」我們很不明白「改組」兩字，明明說是「改變組織，」並沒有說「改變宗旨，」何以會引出這些誤會來？這些誤會無論是恭維是譏笑，我們都不能承受，關於誤會的解釋，有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闢謠，」以及民國日報特刊所載漢民實庵兩位先生的文字，一般誤會的人，看了以後，總可以消釋了。

我如今所要說的，不是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和其他之民生主義，有什麼分別？我只要說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就是把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的步驟，顯著出來。我以為如此，則一般的人，對於國民黨民生主義之誤會，更可以消釋。

要知道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先要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是怎樣的？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得清清楚楚，不用我來複說；凡是看了這宣言之後，總可以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是近於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既然如此，那國家必須是人民的國家，替國家辦事的政府，必定要是人民的政府，纔可以付託他實行民生主義；

方纔可以使人民得著民生主義的利益和幸福。如果那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却是什麼軍閥的，國際帝國主義的，這都是人民的對頭，如何可以託付他實行民生主義；還只怕被他假借了去，將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剝削乾淨了呢。所以國民黨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先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而欲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必須先將和人民作對頭把持着國家和政府的如軍閥如國際帝國主義者驅除了去！

有人說道：「中國現在並沒有貧富不平等的現象，用不着你們瞎操心的，講什麼民生主義？」哼！可知道貧富不平等的現象，是從有人類以來，便存在的；只不過階級的懸絕，還沒有十分顯著。自從機器發明以後，那階級的懸絕，纔漸漸的顯著起來，所以民生主義纔成為當急之務呢。於是又有人說道：「中國現在，機器並沒有盛行，多數的人民，還滯留在手工業的境遇，大資本家壟斷利益的事實，還沒有發生，這正是「天相中國，」使我們中國的人民，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所以我們用不着什麼民生主義。」哼！這些話頭，還是眞聾眞瞎，還是妝聾妝瞎？自然，因爲國內軍閥橫行，隨意將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來做魚肉，人民的生

命自由財產，沒得保障，自然沒得發展實業的能力；然而軍閥的力量，祗能制止國人實業的發展，却不能制止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講起那國際帝國主義的來源，便是因他的國內，自從機器盛行之後，工業發達，生產過剩，所以要在國外找些殖民地，來發洩他的有餘的力量。「天相中國，」中國人民，自己不能發展實業，正好讓他來發展了。中國人民被軍閥壓在頭上，掙扎不得，他却壓在軍閥頭上，不但使軍閥掙扎不得，而且還讓他操縱自如；可憐的中國人民，頭上被軍閥壓住了，却想和壓在軍閥頭上的人來競爭，眞眞是不知自量。所以第一步是中國的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競爭，第二步是中國的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中國以內競爭，這樣一步一步的消沈下去，那些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對中國便成了資本國了，中國對他便成了勞動國了。那些由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出來的人民，對中國人，便成了資本家了，中國人民對他，便成了勞動者了。四萬萬人啊！你的將來，只有做「世界的苦力」的地位，這是今日極顯著的現象，觸目皆是，却還要說「天相中國，」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哼！還是眞聾眞瞎？還是假聾假瞎？

我也知道，到那時候，一般「苦力」裏頭，少不得有些「苦力頭，」所以荷蘭殖民地裏，一般中國人裏頭，居然也有什麼「馬腰」「甲必丹」「雷珍蘭」之類；他們一方將頭伏在荷蘭人脚下，一方却將脚踏在中國人頭上，將中國人血汗得來的利益，雙手捧與荷蘭人，趁便從中賺些，放在荷包子裏，幾萬萬的也有，幾千萬的也有，幾百萬幾十萬的也有；這些好差使將來只好讓那些巡閱使督軍去當了。有人說道：「資本家將絕跡於中國」自然是的，中國的將來，大資本家只是外國人，小資本家只是軍閥，一般人民，哪裏有這些指望呢。

只是「苦力頭」的命運，也是不能長久的。因爲有了「苦力」纔有「苦力頭，」可憐的中國人，到了今日，連「世界的苦力」看看也做不成了，從前美洲澳洲等處，不是都有中國工人的足迹麼？那時候，礦山要中國工人去挖，森林要中國工人去種，道路要中國工人去闢，中國工人，因爲能在無限制工作時間裏過活，能在極廉價工錢裏過活，所以便博得「勤」「儉」「耐勞」等等榮名。漸漸的白種工人越來越多了，中國工人便漸漸的受了排拆了，索性連入口的自由，也禁止了，登時的便換了「汚穢」「奸詐」「墮落」等等罪名了。我們試把

世界地圖，展來一看，除了小小的幾點南洋羣島之外，哪裏還有中國工人站脚的所在？以彼例此，中國工人在南洋羣島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然則連「世界的苦力」也做不成，決不是在極遠的將來的，只不過那些「苦力頭」還是在那裏做夢罷了。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再講幾句闢謠的話。國民黨因爲全國裏頭，農人工人占大多數，要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不能不盼望大多數的人民，出來擔任，故此對於農人工人的運動與組織，十分注重，對於農人工人所主張應得之權利，也十分注重，這本是國民革命所必要做的事情，誰知一般造謠的人看見這樣，便嘈嘈的說道，「國民黨是否認商業的，是摧殘商家的，」我問他道：「凡是生息於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現象之下，而不知道反抗的，纔眞是否認商業摧殘商家。因爲他明明看見中國人要走到「世界的苦力」那條路上去，而漠然無所動心，請他承受這個罪名，也不爲枉，至於國民黨，是要反抗軍閥的，是要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這裏顧的是非利害，惟有商界，更容易明白；因爲那些商家，正在那裏，受着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競爭的苦，受着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中國以內競爭的

苦，所以對於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容易感覺，同時對於反抗的運動政治革命，也容易同情；結合起來，將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一齊打破，實現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政府，來實行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以謀全民的幸福，不用說商家當然是在裏頭的。在政治革命未完成以前，一般商家要將「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來振起商業，國民黨不但認爲必要，而且極願意的加以助力。因爲我們今日，在這樣壓迫的環境裏頭，一方面固然要做治本的工夫，以謀徹底的解放，一方面也要做治標的工夫，以謀銖積寸累的成就；那「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對於團結自力抵抗外侮是極有效用的，當然認爲治標的最要方法。至於治本的方法，還是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因爲必須打倒軍閥，我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纔不致動輒被人魚肉，我們纔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我們纔能將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來發達我們所要做的實業。因爲必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我們纔能拒絕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管理權，我們纔能脫離了半主權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我們纔能在法律上與各國人民平等，我們纔能利用稅權，來實行保護政策。以上等等，意義皆是非常重大，

關係皆是非常密切，斷不容我們輕輕放過，也斷斷沒有第二個方法；所以政治革命的徹底成功，是一樁不可少的事情，我們值得爲此而犧牲的。不然，也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舉國人民陷於「世界的苦力」的命運，還有什麼意味呢。

以上所說，我們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已經約略可以明白；賅括起來，第一步是聯合全民實行政治革命，以打破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第二步是聯合全民鎮壓反革命者以實現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以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爲根據以實行民生主義。

我們既明白這當然的步驟，便當以不斷的努力，從事進行，不可半途而廢，也不可躐等，我們的理想中，縱然有極高尙極完美的主義，但都是第四步以後的事；到那時候，水到渠成，用不着豫先去想像；若要將豫先的想像，來做良心的安慰，也未嘗不可；只是不要亂了步驟，尤其要注意的，不可想入非非，以致走入歧途裏去。

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開幕日演說詞

十四年三月一日

今日是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這是國民會議前途可紀念的日子，也就是國民革命前途的日子。會員諸君，有些是在北京的，有些是從各省來的。諸君數月以來，苦心孤詣，不辭勞瘁，方纔得這些結果，兄弟對於諸君，實在抱著無限的敬意，無限的感念。

兄弟知道諸君此時一定不期然而然的同有一種感想，這感想是什麼呢？就是對於發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的感想。孫先生現在病得極重，不能起床，兄弟自一月廿六日以來，一切講演之約暨社會酬應，都已謝絕。今日離開孫先生病榻，來赴諸君之約，臨來的時候，孫先生在病榻上，以微弱的聲息，問兄弟往那裏去。兄弟答以赴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開幕式。孫先生從痛苦的病狀中，微露笑容，點頭說道，「甚好。」諸君知道，諸君此時，感想著發

起國民會議的孫先生，而先生此時，也正感想着爲國民會議努力的諸君呵！孫先生此次北來，一心一意的要和北方同胞，說國民會議的必要，與其運用的方法。無奈孫先生如今病了，不能和諸君見面細談。孫先生的意思無人敢爲代表，兄弟祇能以其所見揣測一下，爲諸君告。爲什麼要開國民會議呢？國民會議何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呢？這些問題，關係至爲重要，不能不先爲解答。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載於約法，其實這不過一句空話罷了。十四年來，主權何嘗在民，只不過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和國內軍閥手裏。因爲這樣，中華民國十四年來，有名無實，人民痛苦不堪言狀。人民深知道些痛苦，都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所賜，若不能驅除帝國主義和軍閥，必不能解除痛苦，所以一致的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之目的，簡單明瞭，便是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所以要開國民會議的緣故，是如此，國民會議所以爲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也是如此。

國民會議之所以爲國民會議，全靠他的搆成分子，眞眞實實，都是國民。不然，國民會議必是冒充的，不是眞實的了。孫先生的宣言，所列國民會議之搆成分子，是現代實業團體，商

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各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以上種種，方纔可稱爲眞眞實實的國民。以這樣的構成分子，來構成國民會議，方纔可稱爲眞眞實實的國民會議。這樣的國民會議，方纔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何以故，因爲以上種種的國民，都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益相反的，不能兩立的。惟其這樣，所以能盡他應盡的責任，舉些例來說，現代實業團體中，如果想起中國實業何以不發達，何以不但不能和外國實業在世界上競爭，並且不能和他在中國競爭，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爲特權階級的緣故，這是關稅權在外國人手裏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便可明白了。如果再想起壓在人民頭上的政府，何以不幫著人民，向帝國主義者抗爭呢，何以反幫著帝國主義者來壓服人民呢？這是軍閥竊據政府，託庇於帝國主義者以自存的緣故。於是現代實業團體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明白了。現代實業團體如此，商業也是如此。

農民如果想起農地何以日即荒蕪，農村何以日即破壞，農民資本何以日即拮据，農家

生活何以日即憔悴，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工業政策來施行經濟侵略的結果。工人如果想起手工業何以失敗，失業者何以如此之衆，何以將人類的身體來做機器的奴隸，大而外國資本家，小而中國資本家，何以能將工人出的血汗，等於鍋爐內燒着煤熱力，將工人出了血汗的身體，和撥出鐵爐外的燒過的煤渣一樣看待，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施行國際資本侵略的結果，如果再想起壓在我們頭上的政府，還正在依附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來束縛我們，驅使我們，魚肉我們，於是農民工人和帝國主義者利害相反，可以明白，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可以明白。

教育家和學生，如果想起教育權何以如此旁落，外國文化侵略政策何以如此橫行無忌，教育經費何以如此缺乏，便一定會想到這是帝國主義者之高壓政策和軍閥之攘奪政策愚民政策所做出來的結果。於是教育家和學生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利害相反，也就可以明白。

至於軍人呢，雖有時被看做軍閥之直接工具，帝國主義者之間接工具，然軍人不是從

天上吊下來的，依然是從田間來，或是從失業工人中來，或是從教育界學界中來。以上種種人，所受的痛苦，便是他的痛苦，一旦明白過來，必然站在以上種種人的方面，替以上種種人出力，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對。不見全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已明明白白的標出他的旗幟來了麼？軍人如此，推之政黨，也是如此。

如此說來，用以上種種人，做國民會議的構成分子，必然能盡他應盡的責任，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手裏奪回過來，還之人民。換句話說，這是他們拿着他們自己的主權，替他們自己興利除害，是何等的親切，是何等的正當，所以他們自己要開國民會議所以國民會議為解決時局之惟一方法。

如今國民會議雖然還沒有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已是開幕了。還可以說國民會議成立的先兆。兄弟想起建設中華民國的原因，和中國民國的大道理，將主權在民四字，為諸君祝！

「平和」！「奮鬥」！！「救中國」！！！

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追悼孫總理大會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涸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平和！」「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澈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却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眞眞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平和」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有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和；」孫先生的畢生「奮鬥，」爲什麼呢？是爲「平和」而「奮鬪。」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平和的眞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平和，是如此的，祈求平和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鬪。三

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平和是仁者的心事，奮鬬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爲平和而奮鬬，以奮鬬求平和。平和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鬬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平和！」「奮鬬！」「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鬬」「救中國」做去！

孫大元帥北上入京之經過

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在汕頭第三次孫大元帥紀念週演詞

兄弟由北京來得參與這裏第三次的週祭，承總司令的囑咐，要兄弟向諸君說幾句話，兄弟謹把這一次到北京去的經過，簡單報告。

兄弟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隨大元帥自廣州出發，十七日到上海，大元帥決定自己率領幾位同志，繞道日本以赴天津，命兄弟先行入京，並在津會面，及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兄弟接著，這時候大元帥已發病了。但是大元帥還不肯休息，雖然病臥在床，而裁答函電，接見重要同志及賓客，仍是每日不斷。至三十一日入京以後，病勢日見沉重，便不能躬親庶務了。一月二十六日入協和醫院受手術後，以至於三月十二日易簀，心神雖然始終不亂，但病勢至此，不能再以別樣事情，擾其心曲。故此這幾個月內，實沒有什麽事可以報告，這是實

可痛心的。

這一次大元帥北行之目的，曾經鄭重宣言，一是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君知道，開國民會議，是打倒軍閥的第一着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第一着手。開國民會議，國人是沒有疑問，廢除不平等條約，國人便有些疑問，似乎是外交問題，總要在內政清明之後，方纔有解決的希望。如今內政還沒有整理，便驟然說廢除不平等條約，似乎太早，殊不知內政所以不能清明，是因爲軍閥把持，而軍閥所以能把持內政，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在後擁護。徵之往事，袁世凱所以能帝制自爲，是因爲癸丑之役，能打倒國民黨，而其所以能打倒國民黨，是因爲得了五國銀行團二萬萬五千萬元的大借款。袁世凱得了這一批大借款，內用以充實自己的軍隊，外用以收買一般變節的國民黨員和懷貳心的國民黨軍隊，所以釀成癸丑之役，以爲帝制自爲的張本。以後如馮國璋徐世昌曹錕之流，每逢要做反革命的事業，和國民黨作戰，沒有一次不求助於帝國主義者，而帝國主義者沒有一次不助他。所以在反革命的方面，他恃著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便全然不顧國民反對，將帝國主

義者所借給的款項，擴充軍隊，把持政治，以與國民革命爲敵。而在革命的方面，同時向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已經吃力，再加以帝國主義者爲軍閥作揄揚，向國民黨作種種誣衊，淆惑國民之視聽，以致國民革命之氣勢，爲之阻滯不少。十四年來中華民國沒有建設得好，甚至十二三年間廣東處於四面受敵之地位，都是這一種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軍閥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國亡無日，還說什麼內政清明，豈不是夢想？所以打倒帝國主義，不但是中國對外自由獨立的必要工作，這些道理從前國內人士往往沒研究清楚，自從大元帥苦心提倡開導之後，方纔漸漸的明白。

開國民會議是奪取軍閥所把持著的政權，還之國民。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毀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施行侵略的武器。故此大元帥的主張，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不願聞的。當十二月四日大元帥抵天津的時候，天津的法領事，竟不許中國各界人士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開會歡迎，還揚言不許大元帥通過法租界。這可說與大元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針鋒相對。而中國的官僚，反以爲這是大元帥不善外交所致，這是何等的夢囈？過了幾日之後，

京津一帶，紛紛傳說駐在北京的外交團要以尊重不平等條約，爲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大元帥聽得，極爲注意。適値交通總長葉恭綽和善後會議籌備主任許世英來見大元帥，詢知實有其事，當時極爲震怒。諸君啊，大元帥所患的肝臟重病，據各國醫生所說，現時世界還沒有治這病的藥，我們不敢說這一番震怒，是大元帥致死的根由，然總是大元帥添病及促其生命的一個原因，這是我們所永永不會忘記的。當時兄弟因爲大元帥震怒，極力勸止，幷自任與葉許兩位切實商量，葉許兩位已經答應向臨時執政商量補救方法。一是在答覆照會裏頭，聲明政府同意於國民修正條約之要求。二是外交次長於答覆照會遞交時，口頭聲明執政府對於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完全同意，然其結果，答覆照會裏頭，僅僅說了一句含糊的話。至於口頭聲明便至今也杳無聲息，尊重不平等條約，果然做了承認臨時執政的交換條件了。須知道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一條鐵鍊，自從滿洲政府套上了這條鐵鍊之後，至今總沒有掙斷；而且每逢北京政府首領登台的時候，各個帝國主義者，必然要使他認識不平等條約之天經地義。例如民國元年八月時候，駐京英公使朱

爾典向袁世凱提出西藏獨立的要求，並以之爲承認民國的交換條件，我們想想甲午的中日戰爭，便是因爲日本要求高麗獨立而起，那時候中國尚不惜出於一戰，而袁世凱竟以西藏獨立，爲取得英國承認他在民國的地位之交換條件。這是何等的勾當？又如民國十二年冬間，曹錕賄選總統的時候，駐京外交團，便以曹錕承認臨城案爲外交團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曹錕便也連忙答應，這又是何勾等當？帝國生義者於他們登台的時候，兜頭的給他們一條鐵鍊。他們爲怯著塌台的緣故，便低頭受之不辭，早已成了北京政府的老例了。大元帥北行，以廢除不平等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受了一大挫折了。至於開國民會議呢，我們看了一月十七日大元帥覆臨時執政的篠電便可明白，依大元帥在廣州臨行時的宣言，是以預備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如今篠電連預備會議的名稱也不爭執，只有臨時執政肯於善後會議之內容納現代實業團體，商會，農會，教育會，各大學生聯合會，軍人，政黨等代表，使國內各種職業團體得在善後會議之內，主張意見，大元帥便不惜犧牲預備會議的名稱，以贊成善後會議。這樣的讓步，已可謂到極點了。然而臨時執政對於這樣的讓步還不能滿意，只

羅致一些未完全的職業團體代表來做什麼專門委員，且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和上海工部局的華人顧問一樣。主權在民的意味，消失無餘。大元帥北行，以開國民會議爲最大目的之一，至此便又受了一大挫折了。

諸君啊！大元帥北行目的，受如此挫折，是在大元帥的意中呀，還是在大元帥的意外呢？依兄弟愚見，這是在大元帥意中的。大元帥於十一月十七日抵上海後，曾召集上海新聞界中人於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寓廬，宣佈北行目的，並且說道「我抱了這樣目的而北上，我知道是會危險的，我只要國民明白，我便什麼都不管，我便什麼都不怕。」可見北行目的之受如此挫折，實是在大元帥的意中。然而國民的明白也在大元帥的意中。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元帥入京，市民歡迎以十萬計，三月二十日以後大元帥靈柩停放中央公園內，市民來祭者前後數十萬人。他們不是來看熱鬧，也不是無意識的崇拜。其中大部分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都認識大元帥的主義，至少也欽敬大元帥主張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用心。他們的意思表示，都可以爲證，兄弟敢說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氣勢，已在北方開展了。

當北方革命氣勢開展的時候，正有賴於大元帥之領導統率，而大元帥溘然逝去，這豈但是北方人民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也就是大元帥的遺憾。所以大元帥在遺囑上，將生平未了的事，付託於後死同志，除了遺囑所載之外，在三月十一日夜，一息奄奄的時候，反來覆去的只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三句話。眞眞是一息尚存，不肯少懈，令人悲傷感激，至於無極！「救中國」是大元帥一生的志願，「和平」是中國將來的光明，「奮鬥」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和平是奮鬥的目的，奮鬥是求和平的手段，因爲和平兩個字，不是偸生苟活，也不是醉生夢死。人類不互助不得謂之和平，不平等不得謂之平。互助和平兩個字，惟有互助平等方纔是眞解。在這樣的不平等社會裏頭，不用奮鬥的方法，不能使不平者歸於平，既不能平，和便無從說起。大元帥一生是一個極仁慈愷惻的人，同時是一個極勇敢強毅的人；惟其大仁是以大勇，故此和平奮鬥，是大元帥一生救中國的大本領。

兄弟常常聽得國裏頭的人，有些將大元帥比美國是華盛頓，有些將大元帥比俄國的列寧。以事功來論，中國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所以大元帥比之華盛頓列寧爲有遺憾。

就環境來論，大元帥所處的艱難困苦，尙非華盛頓列寧可比。美國獨立戰爭是華盛頓爲統率，而美國人民的獨立思想運動醞釀日久，非華盛頓所提倡的。俄國革命運動，將及百年，至列寧而集大成。就列寧的成功看來，實是空前的偉大。然而列寧有深長的俄國革命歷史來做根據，這是他成功偉大的一個原因。至於大元帥呢，四十年前提倡中國革命，由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都是他一手造成。在他人當這環境，只能做一些革命思想運動，而他却已從事於革命實行。這已是在歷史上找不著前例的，揆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例，他當然只能做一辛勤種樹的人。中國國民革命將來定然是成功的，可惜大元帥不及見了。當大元帥病勢沉篤，自知不起的時候，對於革命前途，抱著無限掛念，對於同志之能否繼續奮鬥，抱著無限掛念。在這時候東江戰事接連不斷的捷報，實能使孫大元帥痛苦中得著些安慰。我們同志實在感激總司令，及各位將士的努力。我們同志更盼望總司令及各位將士早日成功，俾大元帥遺囑上所屬望的一一實現！

國民革命之意義

十四年九月六日在黃埔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詞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决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

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議。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高無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略，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爲根據的。因爲有三民主義的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担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

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鬬。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民之最大勢力。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帝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於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爲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

商人獨能除解，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於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玆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於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求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為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為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鬬。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叙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為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强幹，只做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愷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為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麽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為人一世也。踏

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爲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國民政府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裏開國民政府特別黨部的成立大會，論起這個特別黨部，原來是由大本營來的。不過從本年七月一號起，國民政府才成立，一路又因爲國家多故，直至今天才有這個黨部的正式成立，有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選出。單就這點來看，我們對於黨的前途，實在是很有希望，我們想到這個國民政府的來由，大家都知道是由大本營改組而來，當日的大本營，是由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親自統率的。現在孫先生雖然不在，但是我們現在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不論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衞士，大都是跟孫先生，爲國民革命奮鬥多年的同志，其中還有些新的同志，也是因爲想覓孫先生生平未竟之志，入國民政府服務的。故此兄弟今天對於座中各位同志，更加有特別感情，我們很是不幸，在半途上失了我們的總理，這在全國的民衆，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在中國國民黨的同志，也是一件很可痛惜

的事。但尤其比較別人加倍的痛惜的，可說是國民政府的同人——本府中的祕書辦事員書記副官，大多數都是和孫總理日夕親近的，各位衛士都曾爲總理出過死力，自從在觀音山悍衛總統府，一直到總理去世，都不曾離開過總理的，故此今日凡在這裏服務的同志，於大家悲痛之中，便自然地生出一種互相親愛的感情。如果大家都一致團結，把國家的事情努力，弄個妥當，那末，我們才可以對得住總理。否則我們大家都不爭氣，把總理的遺囑置之腦後，那就總理雖死也不能瞑目了！這一點我們在黨部的各種聚會，常常生出這個感觸，但在今天却感觸更深，我們想想大本營爲什麼要改組做國民政府呢？因爲總理已經死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實在是當然的，這一層原本不必等到七月一日，已經知道的了。也不必等到三月十二總理逝世之後，就已經知道的了。當十二年冬至十三年初間，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訂黨章時候，我們就老早已經知道，如果一旦總理死後，黨的政府和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會再有第二位總理的。這在黨章上寫得很爲清楚，大家是可以見得的，黨章上面幷不說是『本黨設總理一人，』是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

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本黨除孫先生之外，是不會有第二個總理的了。如果孫先生之外，還有總理，那末，黨章內應該說「本黨設總理一人」才是，爲什麽說「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爲總理呢？」在這一條黨章上面，是明明白白的指出本黨所以有總理的緣故，是因爲孫先生是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導師。自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今日的中國國民黨，四十年來，都沒有過別一個人做首領的。所以他實是本黨一個天然的歷史的總理。如今孫先生不幸死了，那末在黨便不會再有總理。在黨的政府，便不會再有元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事情，國民政府是受黨的委託的，黨的組織，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的組織，也自然同樣是採用委員制，是毫無疑義的，當着孫先生未死，我們可以一意跟着這個唯一的導師。孫先生既死，我們採用委員制要使各人都盡其所能，以共同負荷總理所交付的責任，繼續國民革命未竟的工作，這就是國民政府所以成立的原因。

因此我們對于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是十分哀痛，一方面却是十分勇敢。所以哀痛

的是孫先生既死，從今再沒有這樣偉大的總理做同志的導師，再沒有這樣英明的元首做國民的領袖了！所以勇敢的，是總理既把他四十年未了的巨大工作，交付給同志同志如果連一點勇氣也沒有，那末黨也可以從此消滅，國民革命也可以從此停止進行了，試問我們各位同志，是否願意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就要跟着總理一同死去？如果不然，便應當振作起我們的勇氣，去擔負各項的工作，這是無可逃的責任啊！

自本年三月十二總理逝世，許多敵人以為中國國民黨也將要同歸於盡，不知總理生前對於這一着，是老早看見，老早曉得的了。總理在十三年時自己已知道不能夠久在世上，這也幷不是因為總理精神體魄已經支持不來，實在因為近來年所受軍事上的苦痛，在在足以危險到總理的生命。座中同志許多是前日大本營的文武官吏，大家總見得總理這兩年來，近則受驕兵悍將貪官汚吏的掣肘，遠則受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如何的可痛？老實地說，如果當十二年時總理一旦死去，中國國民黨或會一蹶不起也未可料，為什麼呢？因為那時新的分子既一些不曾加入，舊的分子又日趨於腐化，就軍隊來看，眞實忠心

於主義，忠心於總理的，都受驕兵悍將的壓迫，一點力量都沒有。那時的軍隊，那裏是能夠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呢，當時正恰有人謠傳總理逝世。如果謠傳果變成實事，那黨的前途，縱然未必就死，恐怕也不是今日樣子了。

總理自從聽過這回謠言之後，所以在百忙之中，也要抽點時間，把他一生創造的三民主義講演出來，又把二十五條建國大綱，親手寫成，好叫後死的同志有所遵依。直到今年春間，他病將不起，更清清楚楚的在遺囑上把他生前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列舉在遺囑上面。其中建國方略，是民十以前做成的，建國大綱，是民國十三年寫成的，三民主義是他一面講演，一面叫同志筆述，再經他自己親自校勘過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他親自提出於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這些實在通通是總理的遺囑，并不是從本年三月十一才寫起來的啊。既然有了這幾種重要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的精神卻還存在，他到如今仍然可以做我們的指導，我們固然知道現在黨的生命，和黨軍的成立，國民黨之改組，都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比較這兩事還更重要的，實是在乎孫總

理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幾件重要的著作既經完成，總理覺得他自己縱然不幸死去，也可以放心了，他的精神，他的主義，他的革命方略，都可以交給同志去繼承。那末，黨就可以不死了。有什麼憑據證明黨是不死，當本年三月總理尚在病中，黨軍肅清東江的戰績，已經傳到總理的耳中，這是一事。到本年六月譚組庵朱益之許崇智蔣介石諸同志，又把幾年來所痛心疾首的楊希閔劉震寰一起掃除，這又是一事。這就是剛才所說的一方哀痛，與一方勇敢，如果沒有總理的各種遺教，也沒有同志去接受總理的遺教，這樣孫總理才真是死了，黨也真是隨着總理一同死了！現在幸而還有這一幫忠誠的同志，願意拿他的勇氣去担負艱巨的工作，拿小數窮困的軍隊，居然肅清東江的陳軍，掃滅廣州的劉楊，使國民政府能夠成立。實都是一種勇敢的精神！

可是我們一面拚着命去做革命的工作，一面許多人却有點懷疑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拿不妥協的態度，解散了許多軍隊，得罪了許多黨人，因之許多人以為我們是太過鹵莽決裂，但我們平心靜氣想想，我們究竟是否鹵莽決裂，我們的不妥協是從勇敢來的，勇敢是從

哀痛來的。現在總理已死，我們總不想把總理的遺囑，成爲空文，我們總是想方法去實現遺囑上所交付的工作。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努力去奮鬥，求衝破這個惡劣的環境了。就拿十月三日我們把熊克武軍隊處分，這一件事來說，這是我們最近的不妥協的動作，因此便引起許多外面的同志，把我們詈罵，也許在廣州的同志，也一樣的詈罵，亦未可定。但是兄弟請各位同志試想想，前幾天的情形如何，就可以了然了，如果熊克武的軍隊還在北江，我們現在能夠調兵去肅清南路嗎？前幾天南路軍事最緊急的時候，陳銘樞師長僅以三千餘衆，抵過萬的敵人，幾乎給敵人圍困住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師既要衛戍廣州，不能調動，除掉第二三軍還有誰可以去援救他？但設使熊克武的部下，還在連縣，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夠調動呢？當然熊克武來到廣州時，我們已經查得他一切密電，他的所部由連縣竄到含洸，一面由但懋辛駐港和陳烱明相互拉攏。幸而第二三軍能夠趕快把川軍解決，到前幾天，譚組庵同志所部才可以星夜趕到江門，朱益之同志所部可以星夜趕到鶴山，南路的軍事，至此才可以勝利。設使處置川軍略慢一點，恐怕現在的熊克武，已經蟠踞着廣州，要說什麼武裝調停，招

請陳炯明來省議和了！所以我們的不妥協是勇敢，不是鹵莽，而這種勇敢，却又是從很深的哀痛中生出來的，我們旣自承是孫先生的信徒，那末無論什麼困難的事，我們都敢去做的，國民政府所以存在，也全在這一點勇敢的精神了。目下我們一方要和驕兵悍將打仗，一方又要和貪官汚吏打仗，和驕兵悍將打仗，固然要拚命，但和貪宜汚吏打仗也一樣要拚命的，你拿他一個貪官汚吏，他就有許多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重重包圍着你，不許你動彈，我們如果不是根據哀痛中的勇敢，更如何能夠衝破這種惡劣的環境？生出新的生命來！

我們幹天下事情，總不外是理性和情感，我們沒情感便不必言仁愛，但我們沒有理性以節制情感，也將變成情面的動物，國事就要敗在我們的手上，總理的遺囑，更無法可以實行了。

今天在這裏開黨部成立大會，離總理的死還不到一年，回想前事，自然是無限哀痛。可是我們大家也要在哀痛之中，生出勇敢，拿起十二分精神把總理遺囑去實現。那末，我們才可以不負總理，現在有些人受了北京政府的豢養和安福系的指使，竟造謠言說這遺囑是

假的，當時孫先生家人和許多同志，都在場看見清清楚楚的簽字作證，假從何來？這本不必多辨，但這些人爲什麼要說總理的遺囑是假的呢？因爲有這遺囑，然後總理雖死而精神還在，就是總理的說話到現在還有效力。那些本黨的敵人，平日想殺害總理，想沒有中國國民黨去做革命的工作的，到現在他們所希望的已成妄想，就要造出一條中傷中國國民黨的毒計來，但是敵人縱然用盡他們的詭謀，到底是沒有法子能夠把孫先生的精神弄死的。

座中同位各志，現在一塊辦事，大家都是跟從孫先生多年的。彼此實係兄弟一樣，這個國民政府原不是直接做事的，不像省政府和市政府都各有他的直接處理的本務，國民政府的工作，是在乎通盤的計劃，接受本黨最高的指導。如果大家團結，本着哀痛中的勇敢，恪守着總理的遺教，那末總理雖死，但他仍然可以常在我們的面前，領導着我們去革命，這就是本黨的元氣，但使這點元氣能夠繼續保持，我們便不枉與大元帥共事一場。

今天在此演說，兄弟實在感觸着無限的哀痛，因爲我們的總理，已經不在！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演說詞

十五年一月一日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君：去年五月十六日，本黨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廣州，議決在八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並議定組織法選舉法，通告海內外各黨部。各地黨部自從接到了這個通告以後，也早經按照組織法選舉法把代表選舉出來。本年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了，後來因爲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各地交通不便。各處黨部許多有函電來請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天，到現在已經兩年。照黨章規定，原本是每年開大會一次的，爲什樣弄到兩年才開大會一次呢。這並不是黨務的弛緩，實在因爲時局和環境的關係。當本黨初次召集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也曾經有過宣言，這是大家都見過的。我們想起今天在這裏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心上都一定感觸非常的悲痛。因爲第一次大會時，我們還有總理站在我們面前，他告訴我們一切，我們事事都有他的指導，我們只知跟着總理向前奮鬥，就斷斷沒有錯了。可是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不見我們的總理了，總理離却我們去了。我們現在能見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像，能聽着的，祇有總理的遺囑。這張遺囑，就是總理最後告訴我們的話，要我們繼續他的精神去做的了。回憶民國十三年這一年，我們也是在很痛苦很困難的環境中奮鬥的，但是雖然痛苦困難，尙有總理同在，我們仍是很覺愉快的。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去世後，我們遵依着他的遺囑去努力，雖然未嘗沒有一點効果，但因爲總理已經不在，我們在奮鬥中，總抱着許多悲痛，所以今天我們曉得座中各位同志，從這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定也會想起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總理的說話。各位還記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間，恰是接到了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先生逝世的凶耗。總理爲着這件事，覺得非常的哀痛，當時曾停會兩天誌哀，總理並且親自出席演說，說明他哀痛列甯先生的感想。這個

時候總理有幾句話，很像是預兆一般的，他說「列甯先生雖死，列甯的黨不死，俄國的革命事業也是不死。我今天在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將本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將來我縱然死了，本黨却還是不死的。」那天總理的說話，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許多都是在座親耳聽聞的，當時各同志聽了這番說話以後，心靈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動。却想不到到了今年，總理的話果然是眞的，一點都沒有錯的他眞是死了，他眞是離却我們去了。此後本黨的死不死，就祇有看現在沒有死的同志是怎樣了。如果各位同志都是聽從總理的話的，就應當想到，究有什麼方法能夠使本黨不死，能夠使中華民國也不死。我相信總理雖死，總理的主義不死的，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還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擴充到全國民衆。總理的主義，就是總理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繼續實行總理的主義，便是繼續總理的生命。故此我們敢說總理實在不死。總理在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如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樣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黨的同志，因爲遵照總理遺下我們的種種教訓，種種政策，固然是已經得了一點進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是幫助總理改組本黨最出力的，又是

和蔣介石同志一同接受總理的命令，同心合力去創辦黨軍的廖仲愷先生，不幸也死了。今天他是也和總理一起站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同志繼續奮鬥。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是因爲努力輔助總理改組本黨而死的，是因爲努力創造黃埔軍官學校而死的。我們現在要想怎麼樣繼續廖先生的工作，便要知到改組本黨這一件大事。不因爲廖先生之死而停頓，便要知到廖先生苦心創造留下我們的黨軍，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後來再成爲人民的軍隊，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沒有繼續發展。這些說話，兄弟固然覺得哀痛，但我相信這不是兄弟一個人的哀痛，乃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人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過由兄弟代表大衆說出來就是了。原來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應該把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各種經過情形報告的，關於政治軍事黨務各項，幾日以後，當有更詳細的報告，今天開會，兄弟祗有很簡單的說話，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總理仍然在我們面前指導。」我們還是要繼續總理的生命，要繼續民國十四年我們努力奮鬬的勇氣。我們還是要把民國十五年的樂觀提起來，因爲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的國

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總理已經指出了一條光明大路交給我們，這條大路，是用他四十年的心血和經驗從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來的。他原本要帶領我們同志一齊去走的，但不幸半途死了。我們曾經跟從他走上這條光明大路的，就祗有繼續總理的生命仍然向着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進。我相信座中各位同志，都是不願意落後的，都是要猛向前進的，我們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從此以後，團結同志做一體，繼續向這條光明大路前進的。第一步，是先求中國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要牢記總理的遺囑，一方面喚起民衆，一方面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兄弟現在敢高呼總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歡迎詞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同志，今天是大會開會的第一天，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薄備盃酒和各位敘會，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兄弟現在受國民政府委員會同人的囑託，敬致歡迎詞於各代表們，我想起民國的成立，到今天已是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元旦之最可紀念者，祇有民國元年的元旦，民國元年的元旦，是先總理就臨時大總統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說是革命政府成立很好的一個紀念，自過了民國元年的元旦以後，由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年，中間歷受袁世凱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的慘害，沒有什麼可以紀念，由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四年的元旦，又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來壓搾人民，人民受禍，日深一日，也是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惟有到民國十五年的元旦，我們在這裏開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兄弟敢說這個是同志們很可紀念

的一個日子！可是中國國民黨很可紀念的一個日子！也就是中華民國很可紀念一個日子！

我相信十五年的元旦，與元年的元旦，有同樣可紀念的價值！元年元旦，是總理成立革命政府的一個紀念日，十五年元旦是本黨同志繼續承總理遺志去統一全中國的一個紀念日。我們因此想起自元年至十四年，中華民國沒有做好，究竟原因在什麽地方，也很明白可以看見，我們不能說民元的革命是沒有成就，最少巳經革去滿淸政府的命，巳經革去數千年專制政府的命，已經把中華民國的招牌高高掛起了，可是中華民國的基礎却實在沒有做好，因爲當時對內則民衆運動沒有普遍，對外則打倒帝國主義的目標，還沒有完全決定，所以十四年來，國家不能做好，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因爲對外沒有鮮明的目標，使一般民衆對於反抗帝國主義的觀念，不能發生，更無從致中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這實是中國革命未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所以到民國十三年，總理雖然在十分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也，要着手改組本黨，並且決定了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是喚起民衆，因爲農工就是中國大多數的民衆，所以更特別注意於農工運動，自從十三年至今，民衆運動的思潮，一天高過一天，

到現在差不多全國已經知道民衆運動之必要，廣東民衆因爲受總理的直接指導，更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這個民治的基礎是總理已經親手打好了在十三年一年中，總理的奮力，雖然未出廣州，但這個策略，却已影響到全國，自從北上奮鬥以後，全國的民衆，更差不多都舉起頭來了。第二個策略，是對帝國主義，取無畏的精神去抵抗，因爲這一層，致民國十三年帝國主義者加於我們的壓迫，較從前愈加顯露，但因此却製造成民國十四年中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高潮，使帝國主義者，都手忙脚亂起來了，這個對外的民族解放的基礎，也是總理已總親手做好了，由這兩層觀察，我們敢决十五年以後，中華民國的進步，與十五年以前一定是不同，因爲從此以後，中國對內對外的策略，各同志能夠都遵照總理的遺囑去做，是斷沒有不成功之理。我們就回想到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這兩年，因爲同志仍然照總理的方針去努力，已經得有一點成績，可見聽從總理的話，是斷沒有錯的，反之不聽從總理的說話，也一定不免陷於錯誤，可是從前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還有總理親身的指導，我們不會有錯誤，現在總理旣逝，一班同志，就要求第二次大會切實的指導了，這次大會

最重要的就是要決定民國十五年本黨努力的方案。我們十五年努力的成績，可說就全在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國民政府同人，對於這回大會實有無限的希望，無限的頌禱，當今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已經明白規定是受黨的指揮監督；實行總理以黨治國的政策，故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之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在既開大會，就全靠此次大會的指導了，國民政府同人，願拿至誠懇至純潔的心事，敬求大會各同志，把本黨工作和國民的關係如何，那一點對，那一點不對，都切實的考量其得失，估定其價值，然後決定種種的方針，國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顧一切，實行大會議決的方案的，大會所議決的方案，無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一定切實執行，期不負各位的希望，今天開幕時候，我們恪誦總理的遺囑，大家的趨向，是已經決定的，今天參觀閱兵式，大家更可以看見廣東民衆對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熱烈希望，但同時也就可以見得他們還是在一個痛苦的環境，是要我們努力奮鬥去替他們解除的；我們能夠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也就是解除我們同志良心的痛苦了，故此兄弟可以說這民國十五年全國人民的幸福，實全靠第二次全

國代表大會各同志的努力，把一條光明大路指示給他們，兄弟現在謹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同人再頌各位的健康，請求各位的指教，並請求大家就此各舉一觴。

對第三期同學畢業訓話

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各位來賓，校長，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今天是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覺得：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第三期學生畢業了，算起來，時間很短的。自從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我們學校成立，那時我們的總理時常到來同我們學生講話。現在呢，總理不在了，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得不到總理的訓話了！還有廖黨代表，開辦我們的學校以後，天天同學生在一塊兒；現在第三期畢業時候，我們也看不見我們的廖黨代表在這里對學生說話了！我們想起來，實在難過；但是我們也有一點，可使總理安慰的地方，就是去年三月總理在北京病重的時候，已曉得軍官學校的學生已經成立教導團，已由廣州出發一直打到汕頭，把東江的叛逆陳炯明……趕出去了。總理已經

聽着這個消息才過去的。廖黨代表呢，一直指導學生到去年八月二十日，看見軍官學校學生怎麼樣去東江作戰，怎麼樣又回師廣州剿滅楊劉，如此說來，總理和廖黨代表是已經曉得國民革命軍已有了基礎而且有了進展才過去的，當可以少慰。還有自學校成立以來，許多同學在東江作戰身死的，在楊劉之役陣亡的，他們死的時候也曉得還有許多同學在那裏繼續他的生命，爲國民革命奮鬥到底，這也是能安慰他們的地方。我們學生到今天畢業了，但畢業以前，因爲廣州要發生戰事，我們許許多多學生把學業拋下，去担任實際的勤務。這，我們反問一下，固然使我們很抱歉的，使得各同學不能完全做學問上的工夫，後來也不能怎樣補習。但一方面我們稍爲有點安慰，就是在勤務時候，大家能繼續先烈的精神，努力奮鬥；雖然學業荒廢了一點，却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這是第三期同學自已很可安慰的！

我想起，爲什麼要辦這個軍官學校？這裏頭，大家都明白，爲實行總理的主義，才有這個學校。我們實行總理主義，要有種種方法，我們可拿什麼方法去實行，拿什麼方法負起這個使命？只看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以來，一直到如今的歷史，便可明白。民國十三年那年，所有我

們同學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已經看淸楚我們的環境，曉得軍官學校在這裏四面的敵人都來包圍着我們，壓迫着我們。比方，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牠一曉得總理喲將校長創辦軍官學校，就十分注意到我們；第二，還有北洋軍閥，也十分注意這個學校；第三，南路的鄧本殷，東江的陳洪諸逆，也知道這是對牠很不利的；第四還有廣州的楊希閔劉震寰這一班人，也在那裏曉得這個學校的利害。這四種人都十分注意這個學校，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用盡方法來破壞。那時候我們的同學，都明白自家所處的地位，明白自家所負的使命，明白大家想去做革命工作，想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一定是有許多敵人包圍我們厭迫我們破壞我們。所以那時候，我們陸軍軍官學校裏，充分的實行「親愛精誠」的校訓，曉得非把大家意志合在一起不可。這就是大家明白了自己的環境，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曉得現在的敵人要在那塊妨害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担負起革命的使命，來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那一點，同學非常親愛，對外非常一致。因爲這樣子，所以去年二三月間，我們學生能夠得到相當的成功，竟打倒東江幾年來打不下的敵人。這一個成功究從那裏來的？就是因爲學生

認識了自家的環境；担負起自家的使命，大家本着「親愛精誠」團結一致，所以才有這個效果。在這一點，我們敢說已實行「親愛精誠」四字。

自從我們打東江，去了一點障碍之後，至去年六月，那情形又稍爲不同，帝國主義進攻得越利害。六月廿三日那天，本校同學竟有許多死屍堆在沙基路上，更加證明帝國主義不容許我們實行革命。爲什麽帝國主義要做出這件慘無人道的事情來呢？六月十二日我們才掃滅楊劉克復廣州，到六月廿三日他便做出這事情來，我們不要說是誤會，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示威，以爲你們可以掃滅楊劉嗎？給個利害你們看：所以拿機關槍打死我們許多學生，來證明學生能不能夠反對帝國主義，這是六月廿三日我們學生死的一個重大意義，也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比從前更加利害的表現。第二，北洋軍閥更來得利害，竟派了北洋軍艦進窺虎門，逼近黃埔，這是證明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不使我們做成革命工作。其次東江和南路的敵人，也是加倍利害，如東江的陳炯明……南路的鄧本殷，從湖南新來的熊克武，都是預備着再來破壞我們。楊劉雖然自失敗之後消聲匿跡，但廣州內部像楊劉

這類的人如魏邦平一般反革命派仍然滿省城，對我們更加來得兇猛狠毒，要做一次很大的示威，給我們一大打擊，證明牠們有方法來破壞我們，摧殘我們，所以八月二十那天，就打死廖黨代表，這也是一個表示。這個表示，是反革命派證明還有力量破壞我們，把和蔣校長手創陸軍軍官學校的廖黨代表打死，證明他的力量。那時候，我們的環境是這樣子。在此環境之中，我們同學已經明白自己要負起國民革命的使命——實行總理主義的使命；我們認識了我們的敵人，看清楚我們的環境，結合一起，結合一起是怎麼樣？就是「親愛精誠」我們同學大家親愛，聯合一致，所以能夠抗禦得住帝國主義到現在。

打平東江，同時打平南路，肅清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這是什麼原因，何以能造成這樣成績？就是我們學生能遵守「親愛精誠」四字。去年下半年進攻東江的時候，我們已經得了廣東民衆熱烈的慰勞，現在又蒙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慰勉，這是我們最大的光榮！但是我們要知道，各種壓迫，比從前更利害。敵人已經認識我們，帝國主義更用力量來壓迫我們。雖然廣東統一，東江南路沒有敵人，廣州的反革命掃除乾淨，若是稍爲不留心，他們

死灰復燃，也很容易的。所以我們的責任還沒有完成，一定要統一全國，才算做到我們的責任。剛才同學們發誓說『統一廣東，統一中國。』我希望各同學，要照誓詞做去，將來一定可以實行我們的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現在廣東雖然統一了；但是北洋軍閥關外王張作霖，想借帝國主義餘威，恢復他們的勢力，及長江直系餘孽吳佩孚等軍閥都把持中國政權，時時刻刻要破壞我們革命的力量，他們破壞我們的手段，比從前便要毒辣。他們曉得我們的力量，是由『親愛精誠』團結起來的，所以他們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要使我們同學裏分派別，鬧意見。這比拿機關槍來壓迫我們，用手槍來殺死我們還利害得多！軍官學校學生，稍爲在講堂裏砂砂架，香港帝國主義報紙就大登起來，說黨軍分裂。天津，上海等處都照起樣來了，拿幾千百種新聞電報去宣傳，挑撥離間，想使我們內部分裂。這一層，可曉得今天環境的危險惡劣，比從前還要厲害。在這時候，我們不要想別的方法，還是守我們的老主義，守我們的校訓，『親愛精誠。』怎麽才親愛？親愛精誠才能親愛，由親愛生出互相幫助。同學們看見行動上有不對的互相糾正，也是親愛。就是不受糾正，拿紀律去處罪他，還是親愛，我們的

處罰和別人不同，處罰一部份可以保全大多數。大家團結一塊，自己不要渙散。把意志，感情，勇氣，統統集在一塊；不怕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一切反革命派怎樣來壓迫我們，怎樣來離間我們，只拿我們「親愛精誠」的精神可以完全得到勝利。這一點，就是各位同學誓詞所說：「不愛錢，不怕死，不鬧意見。」這就沒有東西可以破壞我們了。沒有離間挑撥的可能了，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才能繼續前進，於最短期間實現總理遺囑。才不辜負廖黨代表生前所指導我們的，和現在蔣校長所教育我們的。我們今天看見各同學舉行畢業式，非常痛快，我希望各同學要拿「親愛精誠」團結到底。國民革命勝利萬歲！陸軍軍官學校萬歲！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今天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日子。這次開會，從元旦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時候了。這回第二次代表大會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不同的是：這回沒有總理在場的指導，這二十天裏頭，總理的精神是時時刻刻在上頭指導我們的。然而這回的代表大會，是眞眞的全國代表大會，除了十八省的代表以外，東三省內蒙古三特別區域，通通都派出代表來出席，還有海外的代表，從國外囘來。所以說這次大會，是眞眞實實的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年來的進步，就是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的慘淡經營的結果，也是同志們奮鬥努力得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十三年一月舉行，到現在兩年的工夫，已經有這種進步，因此可想將來第三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也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努力，一定能得更大的

進步了。

在這二十天當中，我們由我們所討論的種種提案，實見着很好的精神表現出來，就是各位代表，都是一心一德，忠實誠篤的，來實行總理的主義，即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手定最低限度的政綱，也是完全繼續實行。所以第二次大會，對於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之解釋及政綱沒有修正，第二次大會的精神，就是在討論實行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及政綱的方法。

第二次大會所討論可以分作兩大部分：第一是接受各地黨部的報告，就是把各地同志兩年來的工作，一起審查，幷做成決議案，這種決議案，就是指示黨員工作的方針，告訴同志怎麼去實行主義的方法。

第二，第二是討論種種的提案，賅括說來，我們所討論的就是實行主義及黨綱的方法。

我們革命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傳與事實不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感受最痛苦的，就是當時的事實，與我們的宣傳，確實不能一致。不把事實來改變，是不能

宣傳的，但是想把事實改變，却又必先努力于宣傳。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是我們覺得非常痛苦的事；但是我們覺得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痛苦中感覺得的愈快，就是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宣傳，許多都已變成事實。固然我們現在所希望所討論所宣傳，還未能和事實全然一致；但今後我們也惟有不斷的努力，使我們的宣傳成爲事實，這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稍有使宣傳成爲事實的，就是全國各處同志努力的結果，因此纔有這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既經閉會，以後我們便要拿原有的事實做基礎，把一切現在還未成事實的種種政策，一一實現起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統一全國。我們最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實行總理遺囑中所說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兩件事，現在因爲我們全體黨員動員的結果，已經發現了帝國主義者的裂痕，軍閥的崩潰現象。這種裂痕，這種崩潰現象是什樣人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

呢？就是我們全體黨員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我們又看見世界很多弱小民族的抬頭，中國許多民衆和軍人的覺悟，是什麼人使他抬頭，使他覺悟呢？也就是我們全體黨員使他抬頭；使他覺悟的。我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至少要能夠把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都放在本黨主義領導之下。我們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至少要在武昌南京北京舉行。今天是閉會日子，大家就要分別了，我們希望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漢口北京相見！

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典禮訓話

十五年三月一日

各位同志：軍事委員會議決把陸軍軍官學校改組爲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今天是成立的日子，所以我把這個原因宣佈出來。

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爲什麼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爲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楊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並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大元帥是努力于國民革命工作，而統率中國國民黨黨員同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的，看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創設這個學校，純粹本着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裏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

的下級幹部，然後再來組織黨軍。

十三年五月五日，那天學校成立，總理有一篇很沉痛的訓話，今天在座各位同志有聽過的，有沒有聽過的。我記得那句話說是「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國民黨能夠得到這一個新生命……我們要打破困難的環境，我們要歡迎一個『死』字……」

當時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現在的蔣校長和廖前黨代表，督同各教職員，天天拿總理的精神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努力的訓練學生。但是在那時候，同學訓練還沒有成功，東江的敵人已經到石龍來了。我們一方面要訓練學生；一方面又要趕快整備同敵人打仗，因此就先成立了教導團。出發東江，不上兩月，把陳炯明洪兆麟林虎……等一般反動軍隊通通撲滅了，這是十四年三月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始終不肯聽本黨命令和總理教訓的楊劉……諸逆，他們看見陸軍軍官學校在最短期間有這樣好的成績，知道他們的末路到了，所以決心要勾結北洋軍閥做反革命的工作。

我們知道：當時繼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而創辦軍校的，有第二軍譚軍長和第三軍朱

軍長。譚軍長前年跟大元帥帶兵北伐，進了江西，後來雖然是失敗了，但是他並不因失敗而灰心！回到廣州，馬上就成立湘軍整理處，更進一步又創辦湘軍講武堂——第二軍軍官學校——朱軍長跟大元帥的歷史很久，也受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替本黨做了一個很大的工作，他想改良他的軍隊，後來也有第三軍軍官學校的組織。現在第四軍第五軍和第六軍——攻鄂軍，都先後創辦同樣的軍校。因為各軍軍長個個有決心想本着國民黨的政策和總理的精神以及參照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有的成績來整飭自己的軍隊，去對付我們的敵人，因此才有去年六月陸軍軍官學校聯合各軍掃平楊劉的成績，掃平楊劉之後，才成立國民政府，才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

以後無論什麼軍事和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我們看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和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便可知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是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實上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是國民黨的軍事部，所以無論什麼軍隊或軍校，總是國民黨的，都要本着黨的政策去做，無所

謂特別的黨校，也就無所謂特別的黨軍。

各軍長大家注意改良軍隊，創辦軍官學校，並不是理想上如此，是事實上如此的。如果我們拿全盤來計劃，本來只有一個軍官學校便夠了，並用不着一軍成立一個軍官學校；因為各軍都是受國民黨的指導監督的。如果一軍有一個軍校，就含有地方主義的彩色了。從前政府決議把湘滇粵等軍的名目，編為第二三四軍，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我們不僅是在名義上要如此；在實際上也應該要如此，不然，還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政府為打破地方主義為集中人才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因此當時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後來因為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各位知道：何以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在黃埔軍官學校，這個理由是：第一，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第二對於蔣校長的人格和他努力奮鬥的精神，本黨各同志都是極端的欽敬，所以我們拿蔣校長的人格來改組這個學校，同時并請蔣校長依然担任本校校長。

本來軍事委員會對於統一軍事學校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久，去年十二月就決定了．那時候因爲蔣校長在汕頭担任東征總指揮的事情，非常重要，不能回來，所以等他回來了才實行。我們要知道，集中各省人才來訓練，比較分開去訓練，收效一定要大得多的。

現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佈成立了，我們知道，從前軍官學校已盡了種種責任，有很光榮的成績。現在更大的責任，放在我們教職員的肩上了！我們想起從前有這樣光榮的歷史，現在要怎麼樣繼續，怎麼樣發揚光大這個歷史！從前本校成立的時候，環境是怎麼樣？外面有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內面有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但是在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來壓迫我們直接的還少，間接的却很多，就是拿東江的叛逆和南路的叛逆來壓迫我們。現在的環境又怎麼樣呢？已經把從前壓迫我們的勢力打破許多了，現在各同志所碰的艱難，不是帝國主義者和北洋軍閥間接來打我們，是直接來打我們了！我們想同帝國主義接觸，是不是可怕呢？我們如果聽過從前蔣校長的訓話，一定知道不是可怕的，並且是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好機會。從前是北洋軍閥來打我們的，現在是我們要去打他們了從

前是有不好的環境來壓迫我們，現在已經衝破幾層了。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後的任務，是要繼續從前陸軍軍官學校還沒有做完的任務去努力奮鬥！在最短期間，要統一中國！

我們要負起這個重大使命，一定要有兩方面的整備：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一方面是技術上的。在精神方面的，要常常記着總理所說「革命尙未成功」六個字。這六字是何等沉痛！總理做了四十年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要怎麽樣把牠成功？在技術方面的，我們的責任，既然是一天一天的重大；我們的本領和學問也一天一天的要充實起來，才能夠完成我們的任務。陸軍軍官學校從前的技術還沒有精熟，學生的學術科，還沒有弄得十分完備，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以後，我們曉得責任重大，就要加倍的努力，我們的精神才能貫徹，不然，還是等於無用。

精神上技術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如果一知半解，鹵莽從事，比較軍事上沒有弄好同敵人去打仗一樣的危險，所以同時要注重的。其次我們同志在這學校裏頭，要「虛心受善，實力改過。」「虛心受善，實力改過」這八個大字，我們要時時刻刻拿牠來自勉，

不要忘記！今天是各位教職員就職的時候，兄弟以黨代表的資格希望各同志互相勉勵，同時更希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能夠繼續從前的歷史努力奮鬥，發揚光大。

總理逝世一週年紀念大會訓話

林春華 謝一寰 同記 謝一寰整理

今天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紀念總理逝世第一週年，兄弟有幾句話同各位說：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的時候，正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和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了陸軍教導團，在東江和敵人作戰的時候。自去年二月十六日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醫生剖割後，曉得他這一次的病不能夠好了。在二月初，總理聽教導團已經出發東江，打了勝仗，曾口授兄弟打電報給蔣校長廖黨代表和各位同學；電報的大意是：「我的病剛好一點，聽見你們打勝仗，非常安慰，深望你們努力把敵人打退！」這個電報已經由蔣校長廖黨代表宣布給同學們聽了。後來在二月中，繼續接到東江打勝仗的電報；三月初，知道汕頭克復了，潮州也克復了，在那個時候，總理的精神遂很好。我們接到電報之後，都由兄弟把電報讀

給總理聽。某天克復汕頭，某天克復潮州。總理聽得黃埔學生，已經把東江的敵人掃除，所以雖在痛苦中，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尤其是總理知道我們這次用兵東江，不僅是把敵人打破，而且很守紀律；不僅是不害百姓而且不拉夫不籌餉，並且很努力的宣傳主義。到了那個地方，那地方就開軍民聯歡大會，使民衆明瞭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用兵的意義，總理聽見這消息，比打勝東江還高興幾倍；總理聽見打勝仗，不過面上稍爲好點，聽見這個消息，總理在痛苦中發生微笑說：『這樣子才好！』所以自二月——至三月十二日，總理天天在頂痛苦的時候，能夠使總理稍爲安慰的，就是東江克復，尤其是我們同學守紀律實行與民衆合作！

我們同學戰勝東江敵人之後，又回師廣州，肅靖楊劉……等一般反革命的勢力，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繼續又組織黨軍，到去年十一月再出師東征，因爲惠州克復很快，使南路敵人容易瓦解，能夠把革命根據地完全鞏固，這裏頭，陸軍軍官學校同學的努力是很大的，現在陸軍軍官學校很多的同學已經同死了的廖黨代表把精神生命都犧牲去了，還有許多同學仍在蔣校長指導之下努力繼續工作，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得各軍和軍事委

員會的信任，改組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同志，曉得本校從前的歷史，曉得本校與我們有這樣深的關係，我們應該想想怎麽樣繼續總理的生命，怎麽樣繼續廖黨代表的生命，怎麽樣繼續已死同學的生命，這一層，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

現在在場的學生同志，有許多考進了學校的，也有許多還留在入伍生部的，考進了學校的，不要驕傲，不要以爲自己的本事好，實在也有些是僥倖考進的，我們既是考進了，更要加倍的努力，怎麽樣去學本事，怎麽樣才能做很大的事業，未考進來的，也不要頹喪，不要失望，不要灰心，本來學校裏打算把入伍生通通收容進校，只是現在苦於環境，事實上遂不能做到，但是入伍與學生並沒有什麽分別，因爲我們的目的，總是要革命，要學本事，不在乎入校遲早，從前第二三期的同學因爲種種關係，勤務很多，求學的時間很少，他們畢了業還是恨自己的本事不夠，所以我們入伍生不要存一個進了學堂，就可以達到畢業的目的，不進來就是入伍生，心裏惆悵，把工作放鬆，如有這種思想，就是從前討文憑畢業早一點，就可以

升官發財的惡習，這種惡習我們革命者，不應該有的，並且不能夠有的，我們無論官長教職員，學生，入伍生，通通要把精神聚在一點，去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人類本來都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對於爲國爲民的遺囑，當然要遵守，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要講理性，這遺囑說的話，是不是救一般窮苦人民，一般窮苦人民是不是望我們實行救他們，所以我們一方面是在感情和精神上做，一方面也是爲理性做，把感情和理性集合在一起，然後才能夠把種種困難打破，不怕辛苦，才能忍耐，所以關于遺囑的經過，兄弟打算今天同大家稍爲說說。

關于遺囑的經過，自從二月十六，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剖割手續之後醫生宣布這病不能夠治，一班同志很希望總理有一個遺囑，作我們努力的標準，但是那時候，總理的病，雖然是很沉重，一班同志總不失望，還想用種種方法延長總理的生命，因此我們不敢去向總理問遺囑，到了二月念四，醫生告訴我們說，「總理病到現在，是最末了的時候，如果你們不快向他說話，以後就不容易了。」我們聽見醫生最後的警告，覺得總理的病，沒有方法治了，我們于是到總理臥榻的前面，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都在，總理看見我們

就問「你們有什麼話呢？」兄弟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總想幫助總理病好，不過醫生勸我們要在總理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到二三年後以至幾十年還是用得着，不過我們現在總想得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停了一會說，「不用的，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再詳細和你們說。如果我的病不好，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兄弟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勇去作，總理的工作。」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什麼話呢？」兄弟說，「就是平常對我們所說的話可以了。」總理點頭贊成，兄弟又對總理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給總理看，好不好？」

總理點頭贊成，於是就把我寫下的話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子於你們很危險的，因爲政治的敵人，正在誘惑你們，軟化你們，如果你們有這樣的堅決，這是與你們有危險的」兄弟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怕危險的，不受誘惑的。」總理贊成，簽了字，又有孫科，宋子文，孔庸之……等在旁證明，這就是遺囑經過的情形。

同志們，我們知道，總理爲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爲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後要來軟化誘惑我們呢？是不是總理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革命黨是不怕死的，革命黨人是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我們，是總理已淸淸楚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軟化，一定有敵人來軟化同志，不然，總理何必如此說哩？果然，不到總理死後三天，就是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之後，十五日段祺瑞就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到獄裏去，不但如此，並且不許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時派出許多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份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被收買的就是馬君武，第三個被收買的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些人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就證明總理很明白知道他死了之後，我們同志裏面容易被政治的敵人軟化。

總理說政治的敵人，許多人猜是軍閥或段祺瑞，也有許多人說是指帝國主義，但是我們不管是指那個，我們看遺囑就明白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就是總理的政治主張，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就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誰定不平等條約，就是帝國主義，那個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保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就是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以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派，都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總理曉得他死了之後，政治上的敵人，不僅是硬打我們，敵人來硬打，方法還是很笨，敵人沒有這樣子笨的，敵人除了硬打之外，還要想方法來軟化我們，所以我們同志，一方面要提防硬打，一方更要提防軟化，我們的同志，我們武裝的同志，敵人來硬打，我們曉得的我們既是武裝起來了，總是預備不怕死的，旣做了革命黨人，總是預備犧牲的，敵人來硬打，我相信同志們不怕，敵人硬打我們，我們還是硬打敵人，但是敵人來軟化我們的時候哩，軟化不是硬的，是用種種方法使我們不知不覺受他的誘惑。關于這一點，用什麼方法來提防提防？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張，爲什麼要革命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黨員，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的軍人？要把這幾點弄得淸淸楚楚，使敵人來軟化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現在老實同各位說幾句話。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努力四十年。四十年革命如一日，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主義。總理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總理革命四十年，三民主義在中國，也有四十年，我們略略說明三民主義成立的歷史能怎麼樣的，我們大家看建國方略裏面孫文學說有幾句說「我自從乙酉中法戰後，立心顚覆清廷，創建民國」乙酉是什麼時候，去年是乙丑，乙丑上十年是乙卯，乙卯上十年是乙巳，乙巳上十年是乙未，乙未上十年是乙酉，由乙酉至乙丑足足四十年。所以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些話怎樣解呢，我們看乙未年，總理立定主意要顚覆清廷，創建民國，這年總理起首就定了一個主義做革命的標準「顚覆清廷」是怎麼樣，就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怎麼樣，就是民權主義；那時候還沒有民生主義，四十年前，總理初立心革命的時候，但有民族民權主義，由乙未到乙巳年，第一次革命在廣州失敗了，總理就跑到外國去考察，研究各國的革命事實。總理於是知道革命的目的僅是民族民權主義，還是不能成功，最後并因爲與俄國革命黨員互相研究的結果，才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一起來解決，這是由乙未到乙巳這十

年中，總理把三民主義做成完全了革命的目標，我們看乙巳年，總理在同盟會的誓約就明瞭了，同盟會的誓約上說：「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願衆處罰」「當天發誓同心協力」就是革命黨的道德，「願衆處罰」就是革命黨的紀律，「驅除虜虜，恢復中華」同顚覆滿淸一樣，就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就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就是民生主義。總理認定要解決民生問題先要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三民主義到這年，完全成立爲一個革命的主義，完全成了中國同盟會的主義，我們知道三民主義的成立，足足有四十年的歷史。

由乙巳年過了七年到辛亥年，把滿淸推倒了，辛亥革命後，民族主義已解決大半，本來繼續可以實行民權民生主義，不料到民國元年，忽然有一般同志主張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那件事情的原動力全在北京。總理對於那一次的政策，完全不高興。總理爲什麼不高興呢，我們看看黨綱，黨綱內面已經除掉平均地權一條，完全採用社會政策。各位要知道，社會政策完全和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根本解決勞資問題，社會政策僅是資本家要和

勞動者調和地主要和農人調和，就是想一個方法使他們調和妥協，這樣子，爲什麼國民黨把平均地權來修改成一個社會政策呢？因爲北京完全是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官僚政客資產階級的集中地，同時，總理又不在北京，他們就聯合起來改組國民黨，舉猪仔頭吳景濂爲理事長，當時，總理知道了，非常傷心。我們再看民國元年，總理規定民生主義，除了平等地權一條外，還沒有節制資本的規定，總理本想解決土地問題之後，同時要解决資本問題，忽然民國元年，北京的黨員做出這些事情來，使黨的政策完全失敗，民生問題無從解决。

當總理在南京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就有許多黨員說：『現在革命成功了，民族民權一定要實行，但是民生主義，社會上一般人很駭怕，我們爲避免攻擊，最好請先生把民生主義修改，』那時候，總理憤搥着桌說：『如果不要民生主義，我就不要革命了！』後來他們竟不聽總理的話，把民生主義除去了。民國二年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的精神，第一就是把政黨改爲革命黨，第二就是把國會去開，還是拿人民來做根據，第三就是修改誓約，在當時誓約裏面說：『我們犧牲生命財產，服從孫總理來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三民主義在同盟會實行了八年，忽然元年變爲二民主義，但是不久又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依然採行三民主義，後來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始確定：民族主義對內是打倒軍閥，謀民族平等，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謀民族獨立，民權主義，除五權憲法之外，還規定直接民權之實行，並且找勞苦工人農民共同奮鬥，使工人農民明白本身的痛苦與利益，要工人農民起來做革命運動；民生主義更顯明的指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原則爲解決民生問題的不二法門。同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之後，總理曉得目前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在宣傳，所以，總理曾經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繼續講演，在民生主義上面更說得格外明瞭，因爲這樣子，一般落伍的黨員，總想方法來反對民生主義，甚至想推翻民生主義。在民國十三年的時候，有許多黨員要除掉民生主義，因爲總理意志堅決，在黨裏不敢公然反對，他們沒有法子，只得陽奉陰違。總理死了，兄弟在北京，已經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我們知道總理生前，主義的實行，還有這樣的困難，總理死後，更不用說，差不多跟民國元年一樣了，如同反動派在北京開西山會議，西山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簡單

說就是取消總理的民生主義。

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一定有特殊階級的觀念，爲什麼呢？因爲特殊階級要保守本身的特殊利益，一定是反對民生主義，所以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就是特殊階級，他們決不願把已得的特殊地位放棄，那些沒有特殊階級的人也想做特殊階級，若是民生主義實行，人人都能得到安樂自由平。等但是一般有貴族和軍閥思想的人，一定想保守他們的特殊階級，這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中心分子，特殊階級反對民生主義，難道是民生主義可以使大家窮苦嗎？不是的，我們知道現在社會上有兩個慾望，一個是生存慾，一個是支配慾，生存慾就是人類都想有很好的衣食住，人人都想方法去求滿足的生存，支配慾就是少數人想把他人的生存慾消滅，供給少數人的揮霍，譬如美國的鋼鐵大王和煤油大王……等，他們由剝削多數勞苦工人得來的金錢，任意揮霍，用不完，把金子來建築房子，他們完全用金錢去驅使人家做他的牛馬。又如民國五年袁世凱想做洪憲皇帝，弄出什麼勳一位，勳二位，勳三位……等以致許多很努力的革命黨員，後來也做了籌安會的六君子之流，所以凡是想

保守特殊階級的人沒有一個不反對民生主義。

我們看，現在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帝國主義，一條路是反帝國主義，再不會有第三條路，我們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上，可以不？比如日本先五十年改革還可以，但是我們遲了五十年，現在中國差不多做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已經一天一天的擴大了，不是我們叫他們走，他們就會走的，所以要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中國只一買辦階級的資格，因爲英美帝國主義，既是想拿中國當作殖民地，決不肯放鬆，使我們走到他們的路上去，最多不過使我們做成一個買辦階級而已，買辦階級就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別名，我們想做買辦階級，就反對民生主義，我想將來帝國主義走狗這個名字，一定比勳一位還要高尙，我今天并不是說話笑，是確有事實的，從前滿淸對於有功的人，就加上巴圖魯的頭銜，滿洲話說巴圖魯就是狗的稱呼，滿淸的官僚，做了提督不高興，一加上了巴圖魯狗的稱號，就很高興了，我們如果想取消民生主義，就只有這一條路。第二條路是怎麼樣呢？就是反帝國主義，是要解放一切殖民地使成爲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還要大多數

窮苦的工人農民一齊喚起和所有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通通起來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路上，大家想方法來滿足人類的生存慾，就是總理所說的衣食住行四大端解決的方法。我們對于特殊階級，要壓迫他們的支配慾，節制他們的資本，平均他們的地權，使多數窮苦人都能享受衣食住行的滿足，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們既然知道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跟英美帝國主義的尾巴，一條路是跟世界上大多數的平民共同奮鬥，共謀幸福，我相信人類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階級的少數人之外，決不會想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本黨的主義完全是爲大數窮苦工人農民，絕對不許我們去作特殊階級，十四年的北京西山會議，就是想保存他們的特殊地位，所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這些亂子撤消，不留餘地。

各位同志，我們要看清中國的現狀，認清中國國民黨的使命，認清總理革命的精神，我們的武裝黨員，更要認清楚，我們的槍是要向帝國主義放的，我們爲最多數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窮苦的民衆而放槍，要這樣子，才能夠實行總理的遺囑，才算是總理的信徒，我們不要

有一種特殊階級觀念放在心裏，若是想做特殊階級，就不能做總理的信徒，也就不配說實行總理的遺囑，在過去這一年，我們知道遺囑的努力很大，已經喚起了世界上許多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我們的戰線很長，我們的勢力完全建築在最多數的民衆上面，我們要解放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我們這一條路是很光明的，一定要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做到底，使民族平等，世界大同，這樣子，才不愧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做中國國民黨的武裝黨員，更不愧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總理的病，去年一月二十六日，始告絕望，二月二十四日，定了遺囑的稿，三月十一日簽字。十二日便去世了。在二十四日，我們請求總理給我們幾句遺囑的時候，總理說道：「我死之後，敵人便要來軟化你們了，你們如此強硬，是有危險的。」這幾句話，也由兄弟筆記下來，在場諸人，都有簽字，因爲不是遺囑的正文，所以沒有請總理簽字在上頭。

各位同志想想，總理爲什麼說這些話呢？

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是於乙酉中法戰敗之年，決心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至乙丑年而去世，整整是四十年。顛覆清廷，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民權主義，乙未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海外，看見歐美經了民族民權的革命，一般人民依然得不到眞正幸福，逼着還要做一回民生的革命，由此便研究民生主義。乙巳中國

同盟會成立，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清廷一樣，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是民權主義。至於「平均地權，」却是民生主義。總理的三民主義，至此才明明白白宣布出來，而中國革命，亦至此方纔有明明白白根據着三民主義而成立的革命黨。

辛亥之役，總理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當時便有些同志對總理說：「如今民族民權主義都達到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强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還是慢些說的好。」總理聽了，怫然說道：「我如果不講民生主義，我便不必革命了。」然而這些同志，終於不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牽扯了無數野鷄政客，硬將中國同盟會改做國民黨。哼，這是何等勾當呢？表面說來，一是如今革命已成功了，我們不用做革命黨了，去做政黨罷；二是我們從前的夥計裏頭達官不多，大紳不多，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如今趁着機會，將達官大紳一把拉來，以張聲勢，因爲這樣，纔不恤把一個有二十餘年歷史的黨，硬拆了台，去同吳大頭一班人合夥，另掛招牌，開張生意。哼，這已足夠肉麻的了！然而這還是表面的話，骨子裏頭，依然諂不

離宗，是取消民生主義，只看國民黨的政綱裏，輕描淡寫的，將平均地權抹去，便是一個絕大的表徵。

他們在北京做這勾當，總理却也沒奈他們何，然而總理實行民生主義的意思，不但不因此挫折，反而益加堅强。在這時候，總理的民生主義，除了以平均地權爲骨幹之外，還加上以節制資本爲骨幹，這是總理的民生主義之形成，看當時總理所發言論，便可明白。

民國二年以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了，總理却於此時，成立中華革命黨，須知道中華革命黨不是國民黨之後繼，却是中國同盟會之復活。他的最大表現，一是回復革命黨的性質，二是確確實實將實行三民主義著於誓約。

中華革命黨到了民國九年，改爲中國國民黨名稱雖改實質還是一樣，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提出宣言，對於三民主義，與以極詳明極嚴正的解釋，同時還根據三民主義定出最少限度的政綱，又於建國大綱中，詳細規定革命進行的順序。從此之後，三民主義自然大放光明了。然而道高魔高，第一次代表大會裏，已發見了不少反動

分子的形跡，閉會之後，反動的形跡，更一日一日的擴大起來，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誨之諄諄，他們終於聽之藐藐。十三年冬間，總理在天津，臥病在牀，他們已憑着安福系做媒妁，賣身給段祺瑞，做了走狗，去組織什麼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了。總理臨去世的時候，慘淡的顏色，動不了他們的惻隱，微弱的聲音，喚不起他們的良心。總理死了不過幾日，他們已一心一德的，去做段祺瑞的偵探，來破壞中國國民黨，及至十四年冬間，公然有所謂西山會議，他們這般營營擾擾的其爲什麼呢？原來他們和民國元年那班人一樣，是要取消民生主義。

綜觀前前後後所舉出來的事實，便可明白總理那一句話：「敵人要來軟化你們」的用意了。總理所不放心的，不是敵人來打擊我們，却是敵人來軟化我們，誠然誠然，軟化比打擊利害何止十倍。敵人的打擊不但不能使我們離散，反而令我們團結，我們有時或者會被敵人打敗，然而這般的失敗，在我們不過偶然蹉跌。再接再厲，我們仍然可得着勝利。我再強硬說一句，敵人的打擊，是不能離散我們的，敵人如果聰明，也決不用打擊的方法，而用軟化

的方法。古人說過，攻心爲上，我們如被軟化，我們方纔可以稱得起無疾而終，我們方纔可以配享籌安會六君子呢，敵人也不望軟化我們全部，只要能軟化我們一部，敵人便可袖着手，冷着眼，看我們自相殘殺了。這軟化的方法，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也都容易；總理所不放心的，便是如此。

只是我們何以會被敵人軟化呢？我們如今所要追求的便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那裏？上頭說過，民國元年已經有些同志，顧慮着民生主義，會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哼，可見得民生主義已會招惹出事來，不必待什麼「赤化」了！這些顧慮，似乎可以說是軟化的病根，然而這還是公的意見不是私的意見，我們可以慢慢的解釋明白。解釋的方法，可以分做兩面：其一，我們只是民族民權主義，已經足夠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民族主義之目的，在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那不和帝國主義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是正對頭麼？民權主義之目的，是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命自由平等，那不和軍閥官僚買辦土豪要魚肉人民以自肥，是正對頭麼？我們要他們不嫉視，不疑忌，除非馴馴伏伏的永遠做

他們的奴隸。不然，他們總是放不過我們的，又何在乎民生主義呢？其二，你們如果不要民生主義，那麼，民族民權主義；都成為無意義，人類因為要生存，纔要有經濟權來養活，因為要有經濟權，纔要有政權來做保障，所以民權主義，是要來做民生主義之保障的，而民生主義，是要來達民權主義之目的的。不要民生主義，要政治權做什麼，民權主義可是白講了，不要民生主義，人類何以生存，民族主義也是白講了，所以三民主義，看起來是三個的，其實只是整個的，如何可以拆開呢？以上兩面的解釋，如果出於公的意見，有人必然可以明白的，所以這一層，還是不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近日西山會議的人，比較民國元年那班人，似聰明些，他們說：他們並不反對民生主義，他們要孫文的民生主義，他們不要馬克思的民生主義，他們如此說法，自以為聰明，而不知他們的糊塗，比較起來，還要利害。人人知道民權主義至盧梭孟德斯鳩而大成，民生主義至馬克思而大成，總理生於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思之後，對於他們的學說，自然有所斟酌取舍，在民生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如臨大敵，和在民權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

盧梭孟德斯鳩主義，如臨大敵，同一無聊，最奇怪的，他們口口聲聲的說道：孫文的民生主義，是全民革命，馬克斯的民生主義，是階級鬥爭。」他們又在民生主義裏尋出一個證據說道：「總理說馬克斯是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哼，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達爾文出，然後生物始會生存競爭；馬克斯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馬克斯出，然後人類始會階級鬥爭，這是何等的顛倒！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正因爲馬克斯看得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如今照他們所說，社會階級鬥爭，是馬克斯製造出來的，那麼，馬克斯不是病理學家，竟是病的黴生蟲了，這是何等可氣可笑的見解呢！總理憑著馬克斯的學說，看出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之現象，必日趨其劇烈，苦心孤詣，想出種種防微杜漸的方法，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綜其要旨，無非以革命的手段，所得政權，以平和的方法，處理經濟，以除去階級鬥爭之病根，而謀社會經濟狀況之安全發展。這正是對於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下對症的藥，並不是說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很好的，原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不須去理會他，然則總理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斯民生主義，有何

衝突呢？照他們所說，豈不是衛生學家和醫學家要勢不兩立麼？以上所說，雖然覺得他們無理取鬧，然而仍是出於公的意見，可以解釋明白的，所以這一層也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然則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爲不是出於公的意思方面，而出於私心方面。簡單一句話，便是他們的特殊地位思想，這種思想說來話長，絕非一朝一夕之故，遠從人類未有歷史以前沿襲下來的，本來人類有兩種欲望，一是生存欲，一是支配欲，所謂生存欲，是要滿足自己生存之欲望，如衣食住行之安樂自由等皆是。所謂支配欲，是超於生存欲之上的；如以强凌弱以貴凌賤以富凌貧等皆是。生存欲是人人所當滿足的，一切的民生主義，無非想出種種方法，來解決怎樣滿足人人的生存欲。所以總理的民生主義講義裏，於人生之衣食住行，極爲注意。至於支配欲呢，却是人類相斫之原因，古語說『以天下奉一人』試想想一個人的生存，何至要以天下來奉呢？如今所謂大資本家，若將他所擁的金錢，鎔化爲水，讓他和他的妻子一口一口的飲下去，一生也飲不盡，可見得這都不是他們生存上

的必要品了，然而他們却偏要千方百計的弄來，死死的不肯放去，這全是由於他們要施逞其支配欲的緣故。因爲這樣大多數人生存上的必要品，都做了他們奢侈品的犧牲。甚至於連奢侈品也說不上，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起來眞是傷心！一切的民生主義，便是要對於這般人的支配欲，加以抑制，不但民生主義如此。不過自有民生主義方纔更爲澈底普通便了。人類的支配欲，從前發揮在貴字上頭，所謂貴然後富；自從十七八世紀，歐洲幾番革命，將君主貴族剷除了不少，却是同時將私人資本制度，培植起來，革命的結果，民權落在大資本家的手裏，大多數人，還是落空，于是大資本家做了君主貴族的承繼者，人類的支配欲，發揮在富字上頭，和從前恰恰相反，所謂富然後貴，中國革命的時候，有些守舊派，還抱着貴然後富的思想，所謂聽見人將「老爺」稱呼改做「先生」就把鬍子豎得直甯可留辮子做遺老，躲在家裏，仍然要人叫他做老爺。至於那些爲新派呢，却時髦得很，看破了而今已是富然後貴的世界，任憑將老爺改做先生，全沒要緊，横竪是一樣的值錢東西，這種道理，惟有留學生看得最清楚，而今中國以內，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其次是軍閥，其次是官僚

買辦土豪，這些都是富而後貴的出色人物，一般時髦；一方面要討些特殊地位者的歡喜，一方面要鑽入特殊地位者的裏頭去，一聽見民生主義，是要將私人資本制度根本打破，要將民權普及於一般民衆，不容少數資本家獨享其利，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那可是絕了他們的希望了。不必帝國主義發怒，不必軍閥等等動氣，他們自己就要磨拳擦掌，和民生主義者倂個你死我活；何況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頭慫恿着，有軍閥等等在前頭領導着呢。不幸我們號稱同志裏頭，也有這些人在內。民族主義呢？排去滿洲人，正好讓我們漢人來享福，當然沒有反對。民權主義呢？祇有最滑不破的籌安會六君子，還做有一面老爺夢，民生主義呢？老早已說「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如今索性高高興興的加入什麽「反赤」「討赤」裏去了。這一點點私心存在各人隱蔽的地方永遠不說出來，孟子說得好「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民國十五年之所以亂至不可收拾，革命黨人之所以變節，所以會被敵人軟化，簡單一句話，是原因於各人藏在隱微的特殊地位思想。

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衆來做國民革命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政力的，也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綱裏，固然注重保障大多數農工民衆的利益，同時也注重保障其他民衆的利益。我們並沒有說，我們同志個個都要變成無產階級，我們所要說的，我們同志最少要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爲什這我們要革命？　我們爲求民衆的生存而革命。

第二，民衆如何纔能生存？　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抑制人人的支配欲。

第三，如何纔能做到呢？　要人人有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

第四，辦法和次序是怎樣的？　總理所留給我們的著作已說得明白。

我們必須知道，中國今日誠然還不是能夠實行民生主義的時候，然而我們對於民生主義之根本思想，必須澈底明白，不然，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著帝國主義，如何還能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著軍閥，如何還能打倒軍閥？一旦眼中見着的帝國主義和軍閥，與心中藏著的帝國主義和軍閥，邂逅着了，便融合起來，那時候，便軟化了。

我們同志，於徹底的了解之後，要以不斷的勇氣，猛向前進，則不但不會被敵人軟化，還能打倒一切的敵人！

武力與國民結合

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黨總理孫先生曾說道，『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的武力，』這武力與國民結合，當作何解釋？何以不一直說使武力爲國民的武力，而說由武力與國民結合以至於武力爲國民的武力？

我們要知道這解釋，先要知道歐洲各國革命的歷史及中國革命的歷史。

歐洲革命，無論是從前法國的大革命，以至最近的俄國大革命，首先總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的武裝與專制君主所豢養的軍隊相衝突，軍隊受專制君主的豢養，及受專制君主之嗾使，向於革命的民衆，揮其鐵腕，以肆摧殘。其後革命的民衆的影響，在軍隊裏，越入越深越擴越大，遂使軍隊背叛了專制君主，而傾向於革命的民衆，於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

的武裝，向專制君主進攻的時候，軍隊不但不受專制君主的嗾使，以摧殘革命的民衆，反站在革命的民衆那一面，去敵對專制君主。於是大革命遂告成功了。至於蘇俄的紅軍，是成立於蘇俄革命成功之後的，從革命的民衆裏，挑選出來，編爲紅軍，以與勾結帝國主義的白黨爲敵，這些革命的軍隊，是從革命的民衆裏出來的，自然的軍隊與民衆，趨向一致，沒有歧異。人人知道紅軍的黨代表，是有權威的，其所以有權威的原故，是因爲紅軍中的兵士，出自革命的民衆，早已受過了革命的洗禮，早已知道服從黨的指導。其在軍中，就軍事指揮一方面，服從軍事長官；而就戰爭目的一方面，却服從黨代表，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然，爲什麽黨代表的制度，行於中國，便成了「橘踰淮而爲枳」呢？

中國革命的情形，和歐洲革命，有絕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國自有革命以來，都是一面喚起革命的民衆，一面組織革命的軍隊。此等革命的軍隊的組織，其方式不外三種：其一是革命黨人，利用綠林，使之變成革命的軍隊。其二是軍隊的將官，是革命黨人，得了機會，便統率所部，起來革命。以前所謂革命的軍隊，大概不出於此二者，最近纔有所謂第三種方式，便

是由黨立的陸軍學校裏養成將官，以之組織軍隊。前兩種不用說，不但軍隊裏的士兵，不一定是革命者，便是將官，也不能說一定全是革命者，至多可以說有力的將官，是革命者。至於第三種，似乎可以假定所有將官，都是革命者了，然而所有兵士，却不一定是革命者，因爲所有兵士，都是招募得來的。招募得來的兵士固然都是窮苦民衆出身，然而我們不能說凡是窮苦民衆出身的人，便能爲窮苦民衆出力，必須受過革命的洗禮，纔能爲窮苦民衆出力。

由以上所說，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中國革命的軍隊，不是由革命的民衆裏出來，因此往往發生一種現象，便是將官革命，兵士也就革命，將官不革命，兵士也就不革命，兵士一定跟着將官走，而將官不必一定跟着黨走，明白了這一種現象發生之原因，便可知道中國革命的軍隊裏頭，時時有反革命者跑出來，不足爲奇了！

孫先生早已看到了這一着，所以提倡武力與國民結合，這是說革命的軍隊，雖然不是從革命的民衆出來，但祗要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民衆，互相知道，有不可離的關係，日益親密，日益結合，終至於結合爲一，成爲國民的武力。

如果武力不和國民結合，則這種武力，成為國民以外的一樣東西，和國民越離越遠，終至變成了一個軍閥。無論本是軍閥，或本是革命的軍隊後來變成軍閥，都是一樣的覆轍，一樣的結局。

如果國民不和武力結合，則國民沒有武力來掃除一切軍閥和反革命的武力，縱使國民革命終得成功，而無謂的犧牲，在數量上必然更多，而距成功的期間，必然更遠。

所以一切革命的民衆，和一切革命的軍隊，必須把孫先生武力與國民結合的遺訓，牢牢記着，軍隊千萬不要討厭民衆運動，民衆千萬不要歧視軍隊。軍隊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軍隊精良。民衆運動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民衆運動純熟。平時親愛，如家人父子，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朋友師生，這樣纔能担負國民革命的責任，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黨與民衆運動

十六年七月五日

聞得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於民衆，有一種流行語，說道：『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可說是近來民衆運動一切糾紛之總原因了！

要民衆相信自己的力量，這意義原是好的，因爲這可以促起民衆的自覺和自決的勇氣。但是叫他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這是使民衆和黨及政府失了聯絡，其流弊眞不可思議！

我們先要問：黨是什麽？黨是以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爲基礎，黨是代表這些民衆的利益，爲這些民衆的解放而奮鬥。因此民衆欲求解放，必須受黨的領導。

國民革命，是一種鬥爭，詳細說來，是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對於帝國主義的一切工具之鬥爭。既然知道是鬥爭，則必須依着鬥爭的定律，所謂定律，如組織紀律統一指揮等等。不然，一盤散沙似的，如何能鬭爭？如何能戰勝敵人？

所以民衆必須受黨的領導，是一件不可移易的道理。

孫先生有見於此，所以在建國方略裏，諄諄說明領導民衆的必要；更在建國大綱裏，把方法次序，定得清清楚楚，由黨的政府，領導民衆，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將反革命的勢力，次第肅清，革命的勢力，次第養成，然後入於憲政時期，革命勢力的確定，即是中華民國基礎的確定。這革命勢力，是黨的政府與民衆合成的勢力，是不可分離的勢力，是使中華民國永遠存在和發展的勢力。

如今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却叫民衆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於是民衆運動，不復受黨的政府之領導，不但使黨的政府失了民衆，且使民衆失了黨的政府之領導，單獨與反革命勢力作戰，陷入重圍，終致使黨的政府，手足無措，欲救不能，這是黨的政府

之損失，同時也是民衆運動之損失。

如今舉個例來說：「耕者有其田，」是民生主義裏所提出的，做農民運動的人，將「耕者有其田」來做口號，似乎是根據着黨的領導。可是民生主義裏，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同時還提出這主張的實行方法，說是「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不是叫農民起來，搶去地主的田，便算解決。孫先生還恐怕這種原則的話，聽者不能了解，所以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有一篇詳細的訓詞，要從事農民運動的人，懸着「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做去，不可躐等，反致欲速不達。其最緊要的話，是「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這幾句話，揭示從事農民運動的人，要把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親密結合起來，共同達到農民運動的目的，何等深切！由此看來，所謂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實是與孫先生的指示，相背而馳，凡是做農民運動的人，應該深省的。

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民衆說「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幾句話，除了拆散民衆與黨及政府的聯合，予反革命者以可乘之機以外，實沒有其他效用。因此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必須極力矯正此等錯誤，使黨能領導民衆，民衆能服從黨的領導。（政府是黨的政府，言黨則政府包在其中，以下可以類推。）由此所得之效用如下：

（一）能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二）既然說是一切民衆，則此等民衆除了一個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以外，當然還有各個之特殊目的。此等特殊目的，常因利害之不一致，而發生衝突。這便怎麼樣呢？於此愈可證明黨的領導之必要。有黨的領導，則黨必能對於此等繁然各殊之利害衝突，而加以合理的調節，使之不致妨礙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有人說道：「這樣，豈不是反對階級鬥爭？」不錯，我常聽見如此說。有些人固然極口稱揚，說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勝過馬克思十倍，而有些人也不免暗中菲薄，說民生主義，反

對階級鬥爭，全不懂得馬克思的學理。我以爲兩樣說法，都是不對的。階級鬭爭，本來是社會一種現象，無論何人，無從否認。其所以生出種種不同的見解，全因對於階級鬭爭的態度有種種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少數資產階級，極力壓迫大多數無產階級，使之沒有鬭爭的能力，使之不能反抗。然壓迫愈甚，則反抗亦愈甚，階級鬭爭的現象，不但不能消滅，反而益加發達。馬克思看見歐洲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積重難返，非激起階級鬭爭，使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組織，終無翻轉過來之希望，所以提倡階級鬭爭，這爲的是消滅階級。階級既消滅，則鬥爭自然消滅，故可說是以階級鬭爭，消滅階級鬭爭。孫先生看見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尚未成熟，故主張遏抑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之發生，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實業，使國家經營所得，歸之民衆，民衆得了資本的利，而不致受資本的害。這也是消滅階級鬭爭之一種辦法，故孫先生說師馬克思之意，而不用馬克思之法。孫先生民生主義裏，只說用不着階級鬭爭，並沒有說反對階級鬭爭，所以稱揚非薄，都成了無的放矢。

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

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鬪，同時調節各個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眞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所以我們必要重新肯定一個口號，說：黨及政府和民衆，站在一起，將所有力量，凝結爲一，成爲國民革命的力量！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

十六年七月七日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願意有詳細的討論，但因爲時間關係，僅能將主要的意思，簡略的寫出。這個須請求讀者的原諒。

現時世界上的國家，大別起來，不外兩種：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

現時歐美各國，雖國體政體有種種不同，但就其社會經濟組織看來，都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都操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

（二）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對外敲剝其他民衆之利益，所

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實爲同物。

（三）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固以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爲目的，但有時對於一般民衆之抵抗，不能不採取應付之策，或在物質上與以安慰，或在精神上與以麻醉，使之忘記苦痛。至其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則老實不客氣，遇有抵抗的時候，惟有以機關槍大砲來對付。

以上三點，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特徵，所謂共和盛軌，拆穿西洋鏡，不過如此！

除了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外，新派的蘇俄，可以說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最高權力，都擁於無產階級之手，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做成勞農的大同盟，以鞏固國家之基礎。

（二）由勞農專政，經過軍事共產時代，轉入新經濟政策時代，以漸達到共產主義之最高目的。

（三）爲反抗資本主義，要做成一條西方無產階級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聯合戰線。

以上三點，都是蘇俄的特徵。在新經濟政策時代，雖然容許私人商業資本，但因爲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於無產階級之手，這些私人商業者，不能不仰無產階級之鼻息，以求生存，絕沒有平等的權利。

我們所要建設的是怎樣的國家呢？

資本主義的國家麽？從理論上來說，如果知道中國國民黨裏頭有民生主義在，便知道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決不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就事實來說，中國今日幷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爲何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這是不消多說的。

然則我們所要建設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了，這當然是的。祇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是否完全和蘇俄一樣呢？

從前列甯說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期內，便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斯達林加以

解釋道：「列甯絕對沒有說中國革命將要抄襲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列甯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這個意義，是說中國革命除了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共同點以外，還有他自己的特徵。」這樣解釋，是正確的。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必有其特徵，所以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不能與其他的國完全一樣。

然則中國革命的特徵在那裏呢？

我們要知道：各國革命，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是俄國大革命，要其目的，不外革命的民衆蜂擁起來；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而奪爲己有。法國大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君主貴族之統治勢力，其初原是一班平民起來幹的，後來統治勢力却落於資產階級之手。俄國大革命之目的，其初亦與法國相同，自二月革命成功以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統治勢力，至十月革命，資產階級，卒被打倒，統治勢力，遂落於無產階級之手，這是和法國不同的地方。總之，所謂革命，不過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而奪爲己有。雖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曾經受過各國的經濟的封鎖，並且暗中聯絡其國內的反革命派，從事破壞，然都是在其國內革命

成功以後，纔來騷擾，并不是在革命的當初，即以外國勢力爲對象。中國則不然，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已使中國陷於次殖民地之境遇，中國若不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則不能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可說是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要求此鬥爭得到勝利，不能專用武力，凡政治外交實業經濟，均須集中以趨向於此鬥爭之目的。從前所謂滿洲政府以及現在所謂軍閥，語其性質，不過帝國主義之工具。此等工具，在國民革命時節，必須打倒。然不能謂打倒此等工具，即是國民革命完成。至少限度，須使中國能與帝國主義對抗，不受他的羈絆，方纔可說是完成國民革命。——這可說是中國革命的特徵了。

中國革命，既然有此特徵，所以中國革命的方法，不但不能和法國相同，便是和俄國也不能完全相同。

說到這裏，我可以舉一個例，以爲證佐。

我常常聽得有人說道：「中國資產階級，是非常軟弱的，遠不如一九〇五年時俄國的

資產階級因爲一切主要的工業，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手裏，那麼，中國資產階級，就不能不軟弱與落後了。因此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必然的落在中國無產階級手裏。」以上的話，我有大半，可以承認。只是我要問的：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卽屬於無產階級呢？我們須知道無產階級，嚴格的解釋，是現代產業制度下的工人，換句話說，是工廠的工人，在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社會裏，雖然也有工人，但他的組織，不能嚴密，工人的隊伍，是很散漫的。有了機器工廠之後，許多的工人，聚集在工廠以內，隊伍容易結合，組織容易健全，宛如軍隊之軍營一樣，所以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中，成爲極有力的中堅部隊。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發達的國家，產業興盛，工廠林立，一方面資產階級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發達。反之產業沒有興盛，工廠沒有林立，一方面資產階級沒有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沒有發達。這是必然的關係。俄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政府對於國內工商業，厲行保護政策，集中生產力量，使國內產業，强度發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遂同時並盛。因此在俄國革命運動當中，無產階級能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我們試看，列甯關於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演說，有一段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的十年當中，俄國每年罷工人數，平均四萬三千，這是說十年當中總共罷工人數爲四十三萬，而在一九〇五年正月，就是革命的第一個月內，罷工人數就有四十四萬。」於此可見無產階級爭鬥之勇，進步之烈。及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政權雖然暫時維持在資產階級手裏，卒於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而奪得統治勢力。然而列甯還看出俄國革命單靠無產階級，不能成功，必要領導大多數的農民，參加革命，關於社會主義之實施，甯願對農民讓步，以求獲得革命的堅固同盟，於是有勞農政府之成立，而俄國革命，遂告成功。至於中國呢，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都被攫得，國內一切家庭工業手工業，都被他的機器工業破壞無餘，而國人自辦的機器工業，對於他又不免相形見絀，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資產階級，既然如此微弱，則無產階級所憑藉者，亦不得不謂微弱。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卽屬於無產階級呢？還有一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以內所辦機器工業，日益發達，因此在這些工廠內的中國無產階級，也隨着發達，其數量比較在國人自辦的工

廠內的，還要多些，所以近年中國無產階級，也就有了組織，也就起來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其對於帝國主義之抵抗，也已表現過好幾次。然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以推倒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爲目的，先打倒君主貴族，再打倒資產階級，統治勢力便完全奪在手裏，所以十月革命以後，可以由工人管理工廠，接着由國家管理工廠。至於中國呢，縱使能將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推翻，縱使能將統治勢力完全奪在手裏，然而許多大工廠，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若不能立刻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則所謂工人管理工廠，國家管理工廠，都無從實現。若利用罷工手段，其結果固足使帝國主義之工業衰敗，而同時國內也不免發生工人失業問題。所以中國無產階級，若襲用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方法，是不能有效的。這因爲革命的對象不同，故此革命的方法也不同啊！

我說了以上一大段的話，並不是想頹喪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勇氣，也並不是以爲中國無產階級不能做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中國無產階級，若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自然能在國民革命中，做成中心勢力，這是無可疑的。但這是與本文無關的。本文所要注意的，是

說明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方能完成國民革命，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覺悟起來，聯合起來，先將帝國主義之一切工具打倒，再集中一切政治軍事外交實業經濟的力量，以與帝國主義對抗，一步一步的將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驅逐於中國以外。還有一層，在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中國自己也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那條絕路，不能不思患預防，使中國不致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馴致爲後起之帝國主義者。

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裏，已經將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指示得淸淸楚楚。至於如何打倒帝國主義，以建設起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也已經給我們指示得淸淸楚楚。由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裏，可以看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有幾個特徵如下：

（一）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在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國民革命。所以「扶助農工」的口號，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同時並行。前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中心勢力，後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雖然在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集合起來，可是沒有受過革命的訓練，是不能破壞，更不能建設的。所以由黨領導，使之經過軍政訓政的時期，反革命勢力，完全消滅，革命的勢力，已經養成，然後入於憲政的時期。

（三）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便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經濟問題。其方法：（一）平均地權，（二）節制資本，（三）製造國家資本，發展國家實業。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個人經營，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以上三個方法，一則可以發展國家實業，以抵制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二則可以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三則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全國人民共享，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

由以上三點，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民生主義之目的，是要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又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固然有許多地方，可以取法蘇俄，然決不是和蘇俄一樣，因爲民生主義第二講裏，已經說明用不着階級戰

爭無產專制。

以上所述，皆援引孫先生遺著，絕不參雜一毫我見，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已和有個模型擺在我們面前一樣，清清楚楚，沒有疑義。每一個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既然接受孫先生的遺囑，以努力實行自矢，應該對於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不加修正，不加曲解，用盡心力，以求其實現。這樣纔是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敬告江西民衆

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此文作于七月三十一日，其時尚未得賀龍葉挺受共產黨指使在南昌作亂之消息也。附識。

各位同志：

此次兄弟奉中央命令前來九江，係帶有一種特別任務，料理既畢，卽須囘報中央，時間短促，未能與諸同志詳細晤談，實是抱歉之至。

四五月間，中央實處於四面包圍之境，賴一般同志之奮鬥，已經將此包圍打破如今已到了自由向前的時候了。

在這時候，江西同志責任非常重大，務須和武漢同志，通力合作。以最近中央所發表之

各種訓令及決議案爲根據，從事奮鬥，到其結果必能得最後之勝利。

四五月間，中央環境，非常困難，同時江西亦瀕於危。在這時候，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同志，苦心維持，一切處置，極爲適當，所以江西能危而復安。如今各位同志，能和朱同志始終一致，向前努力，則豈但江西不怕敵人來侵，並且一定能夠向東打出一條國民革命的生路。

最近中央所發表之訓令及決議案，各位同志，必已明瞭，無須重複申述。惟有關於容共政策之經過，兄弟初到九江時候，覺得似乎有少許同志，還不免有些懷疑，所以兄弟不能不再申述幾句。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是總理所定之政策。然若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經過，則是共產黨員，不但沒有共同致力國民革命之誠意，並且利用加入國民黨之機會，密布陰謀，要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是則總理之容共政策，已被共產黨員破壞無餘。我想凡是忠實的國民黨黨員，看了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以後，沒有不始而愕然，繼而毅然決然，主張與共產黨分離的。然而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雖然提出這樣報

告，而于解決方法，則愼之又愼，僅僅請求中央，開第四次全體會議，討論解決的方法，於未開會議以前，僅僅從事于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這已經被一般同志譏爲優柔寡斷了。誰知共產黨員，因爲陰謀發覺，索性急轉直下，於七月十三日，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宣言，攻擊國民政府，並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七月十九日，共產黨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所發布的宣言，其攻擊國民政府之態度，更加劇烈。最奇怪的，他們宣言主張退出國民政府，而仍留于國民黨內。他們豈不知道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既然極力攻擊國民政府，破壞之惟恐不力，則已與國民黨立于敵視之地位，而偏要仍留于國民黨內，無非要於中取事，以遂其改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消滅國民革命之原定計畫便了。他們既然如此蓄意破壞，則中央所採用的裁制手段，不能不稍加嚴厲，這是爲維護本黨生命計，爲維護國民革命前途計，所不得不然的。

這誠然是不幸的事，但我們可怎麼樣呢？我們因爲篤守總理容共政策，曾經和無數同患難共生死的同志，立於反對之地位，我們決不願拋棄容共政策的。但是今日拋棄容共政

策的，不是我們，而是共產黨員。我們今日，只有兩條路：一是忍心將國民黨賣與共產黨，一是與共產黨分手；前一條路，我們萬萬不可行的，我們只有行後一條路。

如今我們有兩件事，必須注意的：

其一，國民黨中，向來有左右派之分，這不獨國民黨爲然，既然有黨，則黨內不能無派，普通所謂左右派，大概以激烈溫和爲區別，所謂左派，是富於革命性的。然所謂革命性，是國民革命性，不是共產革命性，是三民主義之革命性，不是共產主義之革命性，不然便不能稱爲國民黨左派，如今共產黨人，每每說道，「國民黨和共產黨分離，便失了革命性了。」又說道，「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派，縱然不是跨黨的共產黨員，也是表同情於共產黨的國民黨員。」這兩種說法，侮辱國民黨，侮辱國民黨左派，可謂已極。我們今日第一要義，是將富於國民革命性的同志，富於三民主義之革命性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責任，方能推進革命，以底於成功。

其二，共產黨員，平日自命致力於農工運動，同時又說國民黨員不肯從事農工運動。然

徵之湖南事變，則共產黨員所領導的農工運動，實爲走入迷途，而且共產黨員平日對於農工羣衆，不但借國民黨之名義，以行共產黨之政策，而且還要使農工運動之報告，只送達於共產黨，不送達於國民黨。所以國民黨與農工運動之間，確有共產黨爲之障礙。我們今日第二要義，是直接的從事農工運動，必使農工羣衆，能夠接受本黨的領導，以解除苦痛，獲得利益，如此，國民革命的基礎，方纔堅固。可是於此有不可忘記的，我們一面贊助農工，以造成革命的中心勢力，一面還要使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以擴大革命之聯合戰線。

以上兩件事，是我們目前最要的工作，凡是我們同志，應該一致努力的，謹此貢獻於我所敬愛的江西同志。

主義與政策

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凡黨必有其主義，根據於主義而有種種政策。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而所謂聯俄容共農工等政策，卽是根據於三民主義而發生的。

聯俄的意義，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三民主義之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蘇俄是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堅決最有力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應該聯合蘇俄，這是聯俄的眞意義。

如果說，中國革命要受第三國際的指導，那麼，是加入第三國際，不是聯俄。

如果說，中俄在外交關係上，應該聯合，那麼，只是以外交關係的意義而聯俄，不是以革命的意義而聯俄，將總理聯俄政策的精神，完全消失。須知道中國革命，因爲要反抗帝國主

義，所以纔有如此困難和曲折，蘇俄也因爲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結了不解之仇。如果雙方拋棄了反抗帝國主義之目的，則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以拉攏，何必蘇俄而蘇俄也正好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之歐美列強締結什麼協商同盟，何必注意到這樣分崩離析的中國？

我們要實行總理的聯俄政策，應該在三民主義中得其眞解，一方面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境遇，世界上多了一個地大人衆的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帝國主義便也多了一個勁敵，一方面使中國革命不致走上了資本主義那條路去步那帝國主義的後塵。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們拿什麽去聯俄，我們可以答道：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與共產主義之蘇俄，都是反帝國主義的，都是非資本主義的，所以有聯合之必要與可能。

其次容共的意義，也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所謂容共，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於此有一個問題：共產黨員，所信仰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

是有衝突呢？總理於此，有兩個解决問題的方法：其一是教國民黨員的，說：「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其二是教共產黨員的，說：「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凡是要實行總理的容共政策的人，必須要充分了解這兩層意義，並且要誠意接受這兩層意義。

如果對於共產黨員，見着就捉，捉着就殺，固然是與總理容共政策大相刺謬。

如果要將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適用於國民黨裏，甚至將國民黨共產化，那麼只能說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不能說是容共，必爲總理所不許。

以上聯俄容共兩政策的意義，有許多人弄不明白，以致發生種種誤會，所以根據着三民主義的理論，加以解釋。

至于農工政策，拙著「黨與民衆運動」已經說明，其要點是黨與政府應該喚起民衆，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民衆應該服從黨與政府的指導，結合成國民革命的基本勢力，於此不必復說了。

夾攻中之奮鬥

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們正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的當中，我們的隊伍裏，忽然生了裂痕了，共產黨同志，根據他們中央委員會七月十三日對時局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了，我們的隊伍裏，忽然消退了一部份了。

幾個月來，我們和反革命者奮鬥，以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封鎖，軍閥之武力的壓迫，以及反革命者之抵瑕乘隙無所不至，當然使我們遇着了無數的困難，與無數的障礙，有我們許多想做的事，眼睛望着做不到手，有許多我們所不願見的現象，擺在面前，撇不開去，因此引起了一般人無窮的失望，與無窮的怨恨，我們一方面要用十二分勇氣，來戰勝這些困難與障礙，同時一方面還是要用十二分勇氣，來忍受這些失望與怨恨。共產黨同志，覺得不能

和我們分担這些失望與怨恨事，於是做一篇對時局宣言，將所有失望與怨恨，一齊推在我們身上，而他們自己走了開去，落個乾淨。我們此時，可怎麼樣呢？只有不容分辨的，單獨担負起來。

有人說道，「共產黨同志，既然脫離了他們的隊伍，他們可要漸漸的腐化起來了。」哼！不要說這樣無理的話，我們不肯共產化，我們尤其不肯腐化，我們不能共產化的理由，在我們所做的「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及「主義與政策」裏，已經說得明白，今試將我們不能腐化的原故，試說如下：（一）我們要堅決的繼續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帝國主義與否，是本黨裏頭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分野，亦可說是左派與右派之分野，其實已經反革命」，那裏還配稱做右派呢！本黨自改組以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分外顯明，反革命派對此，便不安起來了，他們第一怕租界裏不能安居樂業，第二怕亡命的時候，得不着領事簽字的護照，因此對於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詆為不度德，不量力，不識時務，這是改組以來反革命派口中所公然說出來的，馮自由便是其中一個代表者。至於革命派呢，認清國民革命之對象，是

帝國主義，認清非打倒帝國主義，不能得中國之自由平等，認清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打倒帝國主義之最大手段，雖然打倒帝國主義的用心，或者與共產黨同志不同，共產黨同志，則從第三國際着想，而我們則從救國着想，所以所用的方法，有時也不能一致，然其認打倒帝國主義爲目前最大之工作，則無不同的，我們如其堅決的繼續反帝國主義運動，則我們決不會腐化。

（二）我們要堅決的繼續做喚起民衆運動。反革命派是不要民衆的，他們對於一切民衆運動，不但漠視，而且仇視，他們裏頭，文人的結果，不過做個官僚，武人的結果，不過做個軍閥。有人說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這話是不確的。中國如今幷沒有獨立的資產階級，祇有一些食帝國主義者之饞餘以爲生存的奴隸性的資產階級，這些奴隸性的資產階級，有帝國主義者做靠山，幷不要他們來做代表，他們亦不能做代表，最多不過做利用機會狼狽爲奸罷了；反革命者，所過的是這樣生活，所以心目中，幷沒有所謂民衆，西山會議，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至於革命派呢，守着總理喚起民衆的遺訓，以「扶助農工」培養國民革命之中

心勢力，以「農工商學聯合起來」擴大革命之聯合戰線，他和共產黨同志不同的所在，共產黨是一階級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專政為革命之目的，對於其他民衆，不過一時利用，認為同盟。國民黨不是一階級的黨，而是一切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的黨，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國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徵之歷史，必是以一切被壓迫民衆為基礎，沒有以一階級為基礎的。所以中國國民革命，必須以中國國民黨為領導者，其領導之作用，即在聯合一切被壓迫民衆起來，參加革命，我們如其堅決的繼續做喚起民衆運動，則我們不但不會腐化，而且必然可以完成國民革命。

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的政策，我們因為篤信謹守，曾經與違背這政策的人，實行決裂，無論他們在黨裏有如何的關係，和我們曾經如何同生死共患難，我們因為他們違背總理政策，便無疑無貳的，和他們實行決裂。如今放棄總理政策的，不出於他人，而出於共產黨同志了。有人很担心的，對我們說道，「你們未免太孤了。」我們不孤，我們有總理的遺訓，懸在我們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風駭浪之中，一個放出光

明的燈塔，我們要忠實而勇敢的，繼續奮鬪，繼續猛向前進。

錯誤與糾正

十六年八月六日

我們有錯誤沒有呢？唯，有的。

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

總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共產黨員如果不和我們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我們便立刻不能容他。我們爲什麼一直等到共產黨員快要消滅國民革命，我們纔不容他，這眞是我們極大的錯誤。

共產黨員要使國民革命變成共產革命，使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所謀不遂；則破壞國民革命，破壞國民黨，都無所恤，我們對之可怎麼樣呢？

如果恬然受之，只有以下幾種辦法：

其一，居國民黨領袖之名，行共產黨傀儡之實在國民黨中，占了一個領袖的地位，手下用的盡是共產黨人，一切聽憑他們鬧去只要毫不用腦的，點點頭，簽簽字就行了，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廢物，無恥。

其二，名爲國民黨黨員，而其實早已完全接受共產黨的理論，暗中呢，已以共產主義代替了三民主義了；表面呢，說這纔是左派，這纔是革命，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狡詐，無恥。

其三，已經是國民黨黨員了，而又悄悄的不待國民黨之許可，加入共產黨，爲共產黨黨員。於是在國民黨裏，成了探頭探腦的奸細，在共產黨裏，成了知彼知己的軍師，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陰險，無恥。

我們幸而不曾犯了這種罪惡，我們只有錯誤。

現在共產黨已經在南昌公然與本黨宣戰了，公然破壞國民革命了，公然從國民革命軍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於此之時，本黨黨員如果還有厚着面皮替共產黨迴護的，這人便是本黨的叛徒，我們如今不是引咎的時候，是補過的時候。

人的知識，是有限的，而革命是無前例的，以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所靠得住的，發見錯誤，立刻糾正。

我們不能飾非文過，瞞着良心說硬話。我們只有悲痛，我們只有加緊工作，我們唯一的糾正錯誤之方法，是先補過，後引咎。

懷廖仲愷同志

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民國十三年春間，中國國民黨改組，對於本黨，實在是起衰振廢的良劑。自從改組以後，本黨的主義，深入人心，因而形成力量。以這種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作戰，戰勝攻取，四年之間，遂由珠江流域，以至長江流域，進而至於黃河流域。國民革命看着就要告成了。改組以後所以能有如此的成績，原因雖多，概括起來，不外以下幾點：

其一，自從改組以後，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次第出版，建國大綱，亦已制定頒行，本黨主義和實行方法，都已在青天白日之下，顯耀出來。國民革命因此得了極明確的道路和方向。

其二，自從改組以後，本黨的行動，日趨於紀律化，其結果使黨內一切潛伏着的反革命，

假革命，不革命的份子，立脚不住，叛了出去，革命份子的活動，始能自如。同時屬於黨的軍隊，也發生同樣的現象，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軍隊，以次歸於消滅，革命軍隊，受黨的命令，來担負國民革命的責任。

其三，自從改組以後，對於帝國主義及軍閥，採取不妥協的態度，集中黨的力量，對之施行攻擊，無論遇着如何的窒礙和困難，絕不因而餒却。其結果使一般國民，都知道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惟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遂相率而集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其四，自從改組以後，努力於喚起民衆，尤其是大多數勞苦民衆。一方面增進其地位，扶助其發展，於可能的程度，改良其生活，解除其痛苦；一方領導之參加國民革命，以求得國民革命之共同利益。同時對於自己的地位及生活，也得一個正當的根本解決。所以改組以後，「贊助農工」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遍於全國。

以上四者，雖然不敢說是已概括改組精神之全部，然其爲改組內容中最重要的部份，

可以斷然無疑。本黨所以獲得今日之進步，其原因率由於此。

決心改組本黨的是總理，而贊助總理最力的，是廖仲愷同志。本黨改組的事業，所以能活潑進行，實由於廖仲愷同志之努力。當改組進行之際，發生障礙，是必然不能免的。廖仲愷同志，最努力於排除此等障礙，所以障礙，卽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份子，此等份子，在黨內各處都有，而在軍隊中最多；其為障礙亦最甚。廖仲愷同志日日和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份子奮鬥，其死也亦卽死於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然而當廖仲愷同志死時，本黨的改組，已告成了，本黨基礎，已置於廣大羣衆之上了。三月間東江之役，將陳烱明等掃除；六月間廣州近郊之役，將楊希閔劉震寰等掃除；廣東以內，大部份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勢力，次第肅淸。所以廖仲愷同志之死，可以說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的，且於其死時，已有一部份的成功，來做他良心上之安慰了。

我們今日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是紀念廖仲愷同志為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我們旣然紀念他，便要繼續他們那種為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的工作。他那工作的

精神，是在於不妥協的，和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作戰。每一個同志，要能爲國民黨奠定基礎排除障礙而死，纔算是死得其所。

以上是我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的感想；於此尚有幾句附帶要說的話，令我說時十分難過。便是當廖仲愷同志和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作戰的時候，曾經努力於團結革命份子，當時共產黨人，初加入本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自任。所以也引之在革命份子之列。自從廖仲愷同志死後，我們也是將共產黨人和本黨革命份子，視同一律，不分彼此，我們未嘗不以爲共產黨人可以和我們始終站在革命戰線上的。誰知到了今日，共產黨人反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做國民黨的障礙，其所作所爲，更甚於以前所謂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份子，這眞是我所意料不及的。我今日紀念廖仲愷同志之死，已是十分難過，想起共產黨人之有負於國民黨，有負於廖仲愷同志之斬望，更十分難過。

在南京歡迎會上演說詞

九月五日

兄弟等今晚與諸同志相聚一堂，實在是從無窮的痛苦之後，得着無窮的歡喜。

回想四月中旬，在武漢的諸同志，和在南京的諸同志，因爲意見不同，以致分歧。這些不同的意見，並非箇人間意氣之爭，乃由於對於黨國前途之見解不同。其所以不同，則因兩方同志之注意點不能一致。當那時候，南京同志，發覺共產黨徒危害國民革命，於是注意於清黨。清除黨內的反動分子，即所以清除國民革命之障礙。武漢同志，則以爲中央黨部及政府，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否則黨將陷於分裂，於是注意於提高黨權，以爲如非一切權力悉集中於黨，則必不能以整個的黨領導整個的國民革命。以是之故，兩方同志，意見不同，而這些不同的意見，關於黨國前途，非常嚴重，不能隨便放過，遂致釀成分裂的局面，幾個月來，武漢同

志，抱着無窮的苦痛，南京同志，大約也是一樣的。

漢寧分裂以後，兩方同志，還未至於直接衝突。武漢方面，因爲完成北伐的任務，遂以第四方面軍沿京漢路綫北進，與帝國主義之工具奉天軍閥張作霖作戰，將士死傷一萬四千人，卒將奉天軍隊完全擊潰，收復河南全省。而南京方面，同樣以完成北伐的任務爲目的，沿津浦路綫與孫傳芳張宗昌作戰，先後收復浦口蚌埠徐州等處，以直取山東。由此可見，兩方同志，雖在分裂的時代，而打倒帝國主義，打到軍閥之工作，未嘗因以少息，此稍可爲慰的。

可是黨的根本問題，未能解決以前，不但黨內危機四伏，其影響所及，國民革命亦無由進行。縱使完成北伐，打倒北京，亦祇能消滅敵人，不能團結同志。這眞是大可憂慮的事。惟是四月中旬以來，武漢同志，亦已發覺共產黨徒破壞本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毫不姑息的加以裁制，裁制愈嚴，則共產黨徒之陰謀亦愈急，卒致有七月三十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之事。這是武漢同志所引爲疚心的。然以是之故，關於淸黨之見解，遂與南京同志一致。

甯漢兩方同志的合作，這其間，絕無所謂個人意氣之爭，站在黨國的面前，個人是不成

問題的，況且如今兩方同志間，方互相引咎之不暇，何從有意氣之爭呢。還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則兩方同志間應該知道引咎，尤其應該知道補過。

中央黨部和政府的問題，所關甚大。如今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在卽，則一切取决於此會議。兩方同志惟有一致促此會議之成立，及擁護此會議之决議，以解决一切糾紛，而奠定黨的根本，使分裂之局，歸於完整，這樣則對於提高黨權的見解，兩方同志，也可歸於一致了。

兩方同志，經過無窮的痛苦之後，方纔得到這樣合作的機會，眞令人感慨不已。我們惟有痛定思痛，加倍努力，以期國民革命早日完成，三民主義早日實現。今日初到，行色匆匆，謹以簡略的話，申述滿腔的熱誠與敬意，並祝賀武裝同志最近之勝利。

在南京第二次歡迎會上演說辭

十六年九月八日

主席，各位同志。今日得與各位同志相聚一堂，又聽得主席一番誠摯而懇切的訓話，實在令兄弟們非常感動。回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一般忠實同志皆以至誠接受遺囑，努力實行，以期完成國民革命工作。但爲時不久，一般忠實同志間，便發生了裂痕，這是極可痛心的事。此裂痕之由來，是發生於工作上的關係。一般忠實同志在三四月間，方纔破敵東江，便要回師廣州。六月十一日，方纔將廣州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除，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將機關槍大砲，把巡行民衆，殺得尸横滿地。八月二十日，一班反革命分子更將最忠實的同志廖仲愷，亂槍打死在中央黨部門口。我們一部分同志悲痛憤恨，達於極點，拚命的去抵抗帝國主義，掃除反革命派，以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而統一廣東。在那

時候，精神氣力，專注於此點，其他一切，皆不暇顧及，恰如駕車的馬，有眼罩罩住眼的兩旁，只顧沒命的向前，一直跑去。說到這事，不能不想起蔣介石同志，和今日席上當時同過患難的同志來了。我們一部分同志，正在埋頭做這工作，而又一部分同志，却已看出本黨的危機，和國民革命的危機，認為除了反革命派之外，還有共產黨，其危險程度，並不亞於反革命派，很怪我們一部分同志不能兼顧，因此便發生了裂痕。這道裂痕，不但在中央黨部裏看見，便在黨軍的基礎黃埔學校裏，也可以看見。這道裂痕之發生，不是由於同志間有什麼意氣之爭，有什麼自利自私之存心，乃是由於同志間工作上之注意點有所分歧。這是當時實在情形，無可飾非文過的。

去年三月二十日以後，兄弟離國，暫停工作。其間事實變遷如何，不能臆斷。今年四月一日，回到上海，四月十日，行抵武漢。兩方同志間的裂痕，較之在廣州時，更為嚴重。一方注意於清黨，一方注意於提高黨權。因注意點之分歧，而致言論行動之衝突。兩方同志間，雖幸而不致以兵戎相見，然撫着這道裂痕，其痛心之處，是無可以言語形容的。

武漢同志，雖然專心致志於提高黨權，然因共產黨破壞本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日益恣肆，日益顯著，也不能不逐漸覺察，逐漸防制了。始而在各種民衆運動上，矯正共產黨的錯誤。繼而知道共產黨這些錯誤，不是無心之失，乃是有意做成的。至六月初旬，發見了共產黨的秘密議決案，遂決心淸黨。因爲要有種種的布置，所以至七月十五日，始能在中央提議宣布實行，較之南京同志的淸黨運動，已遲了三月。雖然將湘鄂贛三省共產黨的勢力，次第削除，然還免不了三十一日賀龍葉挺南昌的叛變。武漢同志因爲布置未周，釀成變亂，對於黨國，實抱有無限疚心的。

我們正在萬分疚心的時候，忽然於八月九日接到南京李宗仁同志等聯名的齊電，電文的周詳懇摯，不但不責備我們對於共產黨裁判過遲，並且勗勉我們，惟恐不力。還邀約我們同到南京，商量根本解決的辦法。這眞令我們非常感動的。我們便回覆了蒸電，將我們的抱歉，和對於黨國前途的希望，盡情傾吐。今日甯漢兩方同志相聚一堂，可說是齊電之賜。聞得南京有些同志，對於武漢皓電，有些誤會。以我們所知，皓電的前數行，是撮錄齊蒸兩電的，

因過於簡略，以致引起誤會，我們深抱不安。然而蒸氣裏頭已明白說出，武漢同志對於南京同志，當日權宜措置之苦心，十分諒解了。這樣一時間的誤會，總可渙然冰釋，不致妨礙合作之進行的。

我們今日必須團結，這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也絕對可能的。在中國歷史上，已有康蘭的故事，來做榜樣，在近世各國革命歷史上，革命黨人以信念之不同而分歧，復以信念之一致而歸於結合，更不勝枚舉。誠以革命的事，是無前例的，而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祇要此心爲黨爲國，無絲毫個人觀念，夾雜其間，則錯誤是可以滌除的。我們要以十二分的誠意，和十二分的勇氣，來糾正既往，補救現在，開濟將來，我們永遠忘不了此次分裂的苦痛，我們永遠不要有第二次的苦痛。

我們的團結爲什麼呢，一班同志忽然分離，忽然復歸於好，與民衆有什麼關係，與革命有什麼關係。我們的團結，不是要我們復歸於好，便作爲了事。我們的團結，是要集中力量，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共產黨，打倒一切腐化份子，完成北伐，完成國民革命，實現總

理遺囑，做成三民主義的國家，這樣，纔可以慰總理在天之靈，纔可以解除一般民衆的痛苦，纔可以減輕我們的責任。

按演說辭所引齊電蒸電均關重要，茲錄原電如左：

▲齊電　漢口汪精衞先生，譚組安先生，唐孟瀟先生，孫哲生先生，程頌雲先生，朱益之先生，張向華先生，幷轉各同志均鑒：伏讀江電，喜極而涕。我輩終身之交誼，最近之努力，均不至為三五根騙如陳獨秀李立三輩所賣，稱慶之餘，俯首總理之臨佑，黯然而神傷。所為個人問題，無關重輕，豈特無關重輕而已。在弟輩鹵莽從事，過舉極多，倘共黨終於安處，此事便能不矯枉過正，方日惶懼默祝我友之我助，安有絲毫缺望。嗟乎，書本上之共黨主義，未嘗非一種之同志，但總理則合萬殊而幷包，列寧乃強世界之類我，相去毫厘，差以千里，矢人函人，擇術不同，求果自異。況江南之橘，踰淮為枳，彼等所造中國之信徒，十九佞巧，其父攘羊，其子證之，殺人放火，亦固其所。所以欲求始終容共，幷非理想所不通，乃為事實所不許。情勢今已至此，糾紛即可消釋。前電明令，共黨全退出黨部，則黨

之祗有整個善後，並無兩派爭執，開一中央全會，以促大會之進行。早望澈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會集，漢上同志，早有決議，翹請漢同志及早蒞臨，以踐夙諾。故今之對共黨，已無問題，軍閥未殲，大計乃在北伐。只須執監委員湊集於一堂，忠實同志，遍培養於全國，海內既定，即黨國之進行不難矣。弟等愕喜交集，聊馳貢見，不盡百一，敬候明教。弟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中正，胡漢民，李烈鈞，鈕永建，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同叩齊（八日。）

▲蒸電　南京李德隣先生，並轉諸先生均鑒：齊電奉悉，弟等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致釀成南昌之變，至深內疚。祗以責任所在，應先補過，然後向第四次全體會議引咎，請求處分。以諸同志平日相知之雅，必能深喻弟等此時所耿耿者，不在個人意氣，而在黨國前途。青日致各黨部各同志電，已述其詳。現在武漢之中央黨部及政府，實爲黨國之最高機關，萬不能以不慊於供職之個人之故，遂並機關而否認之。於此有當竭誠相告者，弟等雖無似，決不致欲藉此機關以爲護符，誠使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能開，則不但個人

負責問題，卽機關改組問題，亦可於此解決。此方爲正當解決，亦根本解決也。由此會議可以產生眞能統一全國之政府，則一切分崩離析之現象，完全消滅。願諸同志深念之也。誠使毅然捐棄而服從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則諸同志，當日權宜措置之苦心，必將轉爲天下後世所深諒，諸同志之有造於黨國者尤大矣。專此布覆，並候毅示。益之向華兩兄，現在南昌，故未列名。附聞。汪兆銘，譚延闓，程潛，孫科，陳公博，唐生智，顧孟餘，蒸（十）

甯漢合作之經過

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

主席，各位同志：自今年七月卅一日共產黨徒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後，兄弟深疚對於共賊裁制過遲，致釀成此變，曾於八月五日在中央會議席上報告事變經過，並謂俟事變平定當請求中央加以處分。如今正謀補過，未敢卽引咎而去。此次兄弟向中央提出自劾，聽候處分，便是基於這個原因的。

在這時候兄弟本打算閉門讀書，聽候處分。惟疊接武漢同志函電，以中央遷甯經過情形相詢問。對於南京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尤深致疑慮，囑詳爲說明。是以兄弟不得不來武漢一行，報告梗概。預料不久譚組安孫哲生諸同志必更會派人前來報告一切的。

迴想八月二十日兄弟偕譚組安，于右任，孫哲生，顧孟餘，唐孟瀟諸同志由武漢出發，前

赴九江。二十一日到了九江，會見了朱益之陳公博諸同志。程頌雲同志亦由武漢來到。二十二日李宗仁同志由南京來到，具述自胡吳張蔡李諸委員去後，南京方面黨務政務均無人負責，孫傳芳正謀渡江來攻，希望武漢同志迅速前往南京，並希望上下游諸軍，迅速訂定軍事上共同行動的計劃。所以當時決議，由譚組安孫哲生兩同志偕李宗仁同志先赴南京，其餘各同志仍留九江處理各種應辦之事。譚孫兩同志到南京後，正值孫傳芳渡江部隊拼命來攻，情勢危急，李宗仁同志等均往督戰，譚孫同兩志本急難之誼，迭次來電催促武漢同志迅速前往，並催促武漢諸軍迅速前進，以期夾擊敵人。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諸同志迭次來電亦是同樣說法，並派楚振兵艦前來九江武漢，迎接中央諸委員。所以兄弟和顧孟餘徐季龍陳公博何香凝朱益之陳護黃諸同志卽渡楚振於八月五日抵南京。于右任王法勤潘雲超諸同志亦陸續來到。祇唐孟瀟程頌雲兩同志因爲指揮部隊關係，暫緩起程。兄弟等到了南京之後，譚孫兩同志往上海訪問各同志未回。及至回來，先後會合在南京的同志開談話會，又同往上海會合在上海的同志開談話會。討論結果，多數同志都主張本黨分裂之後，應

速謀團結，而團結之方法，必須使各方面負責任的同志都同心協力，共策進行，所以纔有特別委員會之提議。論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在本黨原已有不少的例子，如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廣州發生廖案，中央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授以特權，使得以臨時緊急處分一切，特派兄弟及許汝爲蔣介石兩同志爲特別委員會委員。當時兄弟是中央執行委員，汝爲是中央監察委員，介石不是中央委員。可見特別委員爲非常事件而設，原沒有一定的資格。又如最近中央特派孫哲生潘雲超孔庚三同志爲湖北特別委員會委員，孔庚同志亦不是中央委員。由此點而論，則此次南京特別委員會委員有一部分不是中央委員，徵之往例，不足爲異。且此次特別委員會之產生，係由中央會議所決定，其委員亦係由中央會議所推舉，亦於往例無所抵觸。惟有一點，是大有不同的。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之後，中央在特別委員會存在期間，雖不常開會，然中央黨部，仍然存在，不過授權特別委員會使之措置時局。如今南京特別委員會，却是代行中央職權。還有一點，中央原已決議於九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如今南京九月十五日所開的中央會議，却不是第四次中央全體

會議。關於以上兩點，在談話會裏，曾有激烈之辯論，卒因遷就事實，不能不爲此權宜措置。自九月十二日談話會大體決定之後，兄弟便向中央提出自動，離了上海。十三日以後的事，當讓別位同志前來報告了。

此外還有應當報告的，便是武漢政治分會之經過。此是八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甯以後，武漢不可無政治分會，以指導黨務政治軍事，故決議設立，並特派唐孟瀟顧孟餘諸同志爲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去年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即於廣州有政治分會之設立。今日武漢設立政治分會，正事同一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負責爲此決議，亦正與今年六月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在鄭州決議設立開封政治分會，事同一律。如今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既已遷甯，唐孟瀟顧孟餘諸同志又先後由九江上海歸來，雖然有些同志尙未到齊，武漢政治分會已可依法成立。此爲武漢革命根據地前途極有希望的事。

以上報告已完，還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的，如今長江上下游所流行的口號，是國

民黨同志團結起來，而國民黨同志團結起來之後，其所要做的工作，提出的口號是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這些口號都是必要的。如今國民黨同志已經團結起來了，團結之有無效力，要看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之工作如何。所謂北除奉魯軍閥南除共賊，其工作都有積極消極兩方面。先以北除奉魯軍閥而論。所謂消極方面的工作，便是武裝同志一致團結，製定軍事計畫，共同行動，於最短期間將奉魯軍閥完全消滅。這些工作誠然必要，只是還有積極方面的工作，也要同時注意。所謂積極方面的工作，是要認清楚，怎樣便是軍閥，怎樣纔不是軍閥，我們和軍閥的分別在什麼地方。我們是服從黨的決議，爲黨的主義，及政策而奮鬬，以求實現民衆之幸福的。而軍閥則不知有黨，不知有主義及政策，不知有民衆，只知有地盤，只知有個人掠奪得來之權利。這便是我們和軍閥的分別。我們應該認定奮鬬之目標，努力做去，這便是積極方面的工作。此項工作如能做得透澈，則軍閥必倒，且永不會再起。不然則日日說打倒軍閥，其結果軍閥不能打倒，而自己反變成了軍閥。再以南除共賊而論。所謂消極方面的工作，便是於最短期間將竄擾粵閩之賀龍葉挺殘部一律肅清，再將各處潛伏着

的共產黨徒之惡勢力一律掃滅。這些工作，誠然必要，只是還有積極方面的工作，也要同時注意。所謂積極方面的工作，是要不斷的訓練出一大批幹部人才，務須明瞭本黨的主義及政策，且能誠實勇敢的去實行，分布在農工商學裏頭，從事宣傳及組織，並要使人人了解共產黨徒在世界各國運動失敗之原因結果。其在英法美各國家內，何以氣息奄奄，不能活動？其在德國戰敗之後，何以一度活躍而終於一蹶不振？其在匈牙利，何以一經試驗，而即爲羅馬利亞所屈服？其在意大利，何以一經試驗，而即有法西斯蒂之反動？其在俄國，何以一經試驗，而即以新經濟政策爲有計畫之退却？其在土耳其，何以俄國曾拯之於垂危，而基瑪爾仍然驅逐共產黨？乃至環繞俄國之諸弱小國如波蘭芬蘭立陶宛等，何以畏聞共產黨？東方諸弱小國如波斯等何以一度嘗共產黨之況味，便相與咋舌，不敢領教？凡此種種，一經研究，不難洞見共產黨之癥結。即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關係而論，何以共產黨徒於加入國民黨之始，口口聲聲說只爲國民革命而來，不是爲宣傳共產黨主義而來，而其後一年變更一度政策，愈變愈兇，意欲將國民黨收歸掌握，爲其宣傳共產主義之工具？何以國民黨因

容共之故，鬧得黨內四分五裂？何以共產黨憑藉國民黨的勢力，在國民黨勢力所及之地，小試其端，即弄得四民失業，連天叫苦？凡此種種，一經研究，即不難洞見中國共產黨危害中國國民革命之眞實經過情形。如此，則中國以內一般民衆必不致爲共產黨所誘惑，而國民黨內亦再無人將共產黨的理論來做國民黨左派的理論，這樣方纔能使共產黨的惡勢力根本消滅。同時本黨的主義及政策纔能得一般民衆之了解及擁護，而日即於實現。若沒有這些工作，則雖日日說反共，也於事無濟的。如今長江上下游似更有一種風氣，以爲能反共的，便是忠實的國民黨員。殊不知謂忠實國民黨員必反共則可，謂反共則必是忠實國民黨員則尚難斷定。我們固然要從消極的工作方面看其是否反共，我們還要從積極的工作方面，看其是否眞能爲國民黨做工作。因爲必須眞能爲國民黨做工作，纔是反共的最大努力啊。

以上是兄弟由甯漢歸來一種感想，隨便說出，以求各位同志指教。

與南京代表團商權恢復中央黨部之經過

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今天想把此次來漢口的原故向各位報告。

九月二十一日，兄弟在這裏和各位相見，二十七日回到廬山舊寓，十月一日接朱培德同志南京來電，二日接許崇智同志上海來電，說要來相見。四日朱培德同志到了，許崇智張繼居正孫科伍朝樞吳鐵城劉成遇麥煥章陳策陳翰譽江和風諸同志也到了。還有由廣州來的劉裁甫李朗如伍朝樞諸同志，是於前幾日已到了的。一共十餘位同志連日所討論的，都是關於黨務軍事等等問題。武漢政治分會諸同志聞此消息，電囑兄弟代邀各位同志前來漢口，並派龔琪趙祉威同志前往歡迎。當時除了朱培德同志因為初到，關於江西事務，須

要料理，麥煥章同志因還有別項事務，以致不能分身前來之外，各位同志，都於雙十節日到了漢口。連日和在漢口中央各委員及武漢政治分會諸同志略商，除了關於完成北伐問題，有關軍事秘密者外，兄弟如今將關於黨務討論的經過，提出報告。

自從九月中旬以來，各處黨部及各方同志，曾發表了不少的意見，總合這些意見，約可分為兩端：其一是黨的人才問題，其二是黨的組織問題。關於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為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人人知道本黨同志之分裂，不僅是本黨之不幸，實是國民革命之不幸。本黨同志於分裂之餘，重復結合，所謂痛定思痛，必當本「親愛精誠」之旨，一致結合，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早日完成，國民的痛苦，得以解除，本黨同志的責任，纔得以減輕。斷沒有於這時候，還去抉起從前的裂痕，以引起現在及將來無窮之不幸的。即如來漢口的各同志，從前分散四方，如今聚首一堂，其中如許崇智張繼各同志在本黨奮鬥之歷史與人格，凡是同志，沒有不佩仰的。集中人才，以共同負責，是今日本黨的一件大事，兄弟敢信斷沒有人於此忽持異議的了。

至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黨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舉一個例來說：本黨有二三忠實同志，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曾被處分的，如今由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負責免除，以請求全國代表大會之追認，此於黨的紀律精神，並無違忤。再舉一個例來說：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是主張繼續總理容共政策的，所以有統一革命勢力的決議案。但是自七月十五日以來，共產黨既決議退出國民政府，並陰謀破壞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甚至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自七月三十一日以來，索性實行叛亂，容共政策，已被共產黨破壞無餘了，則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變更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案，不但於事實上已爲必要，即於法理上所謂「同一機關得以新決議變更舊決議」之原則，亦爲至當。舉此兩例，其他可以類推。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採用。於是第二個提

議，見諸實行，即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其產生理由，具見於九月十五日南京頒布的宣言中。不須複述。自從特別委員會產生之後，各黨部及各方同志對之，對於事實方面委曲求全的苦心，十分體諒，而於法理方面，謀有以補救。簡括來說，不是否認特別委員會，不過謀有以補救而已。此次上海南京各同志來漢口共同討論的結果，也承認補救之必要，並想出補救的方法，即是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特別委員會，仍然存在，並規定常務特別兩委員會之權限，恢復中央監察委員會。如此，則黨的組織，不致破壞，而集中黨的人才之主張，亦得以貫徹。本月十一日在漢口的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王法勤朱霽青暨兄弟等與由南京來的中央執行委員孫科伍朝樞等擬成草案，即夜由孫伍兩同志，攜赴南京徵求各同志之同意。總理建國大綱裏，規定了國民革命的進行程序，由軍政訓政以至憲政。在軍政時代，是以黨治軍以黨治國的。所以軍政訓政時代黨的重要，等於憲政時代的國民大會，因而黨章的重要，也等於憲政時代的憲法。不集中黨的人才，不能負荷國民革命之大任，不鞏固黨的組織，不能建立國民革命之中樞，凡此，皆純為黨着想，決沒有派別觀念及

對人問題，夾雜其間，想為一般同志所諒解的。

以上關於黨務討論的經過，報告已完，於此還有幾句附帶的話，想對各位同志說說。

各位同志當努力工作的時候，不可忘記了四十餘年以來本黨艱難締造的歷史，尤其不可忘記了民國十三年以來本黨改組的歷史。總理於改組本黨時候的種種訓話，以及改組以後本黨所表現的種種精神，實為今日國民革命積極發達之根源，兄弟敢說本黨改組以後的精神，雖然有些因共產黨之搗亂而混淆，但決不因共產黨之搗亂而埋沒，本黨改組以後的精神，不是兩三句話所說得完的，兄弟僅能提出兩三點，來與各位同志討論。

（一）組織與紀律　兄弟聽得有人說道：「組織與紀律，是共產黨用以破壞本黨的一種工具，如今共產黨既驅逐了，則組織與紀律可以隨便，不宜以之束縛同志間的自由與感情。」這種說法，可謂錯誤達於極點了。共產黨誠然有利用組織與紀律以破壞本黨的事實，但其罪在共產黨，不在組織與紀律。不但此也，本黨正因有組織有紀律，纔能將共產黨驅逐出去，如果本黨沒有組織與紀律，則本黨自己破壞自己而有餘，不必待共產黨來破壞了。

凡是人類，便有團體，凡是團體，便有組織與紀律，其在秘密團體，則組織與紀律，尤爲存在之要素。本黨自成立以來，卽有組織與紀律。其後勢力愈發展，則組織與紀律亦愈嚴密，組織與紀律愈嚴密，則勢力亦愈發展。舉例來說，中國同盟會時代，誓約是「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其紀律何等森嚴。其後中華革命黨時代，誓約的規定，則更森嚴了。及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的黨章，關於紀律的規定，則不但森嚴，而且精密。本黨要集合革命同志，領導革命民衆，和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者作殊死戰，沒有這些森嚴精密的紀律，如何能統一活動。至於組織，更不待言，每一個革命同志，因爲富於情感，纔能勇於犧牲，既然有舍己救人的決心，定然有屈己從衆的定力。熱烈的情感，與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正是合一不可分的。共產黨常說道：「國民黨自容共以後，方纔有組織與紀律。」這是替自己瞎吹，而厚誣本黨的話，本黨同志不可上此老當，更不可因噎廢食，以爲驅共以後，則組織與紀律，可以放鬆。須知如今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已嫌太放鬆了。老同志的浪漫態度，新同志的放縱態度，已足夠使本黨分崩離析了，還禁得再浪漫放縱下去，使本黨的組織與紀律失其

效力麽？

（二）反對帝國主義　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與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精神面目，完全不同。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理由在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裏，說得最爲詳盡，民族主義之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二步在求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帝國主義，是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對頭，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對頭，所以要反對他。而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是爲第三國際著想，不是爲中國着想。他的心目中視第三國際爲作戰的大本營，視中國爲作戰的一支隊，如果於全盤戰局有利，雖犧牲一支隊而不惜，所以如果於第三國際有利，則犧牲中國以爲第二次國際戰爭之導火線，亦所不惜。此與本黨民族主義之目的步驟，大是相反的。至於反對帝國主義之方法，本黨主張用文化，軍事，政治，經濟種種力量，以對於帝國主義，爲積極之抵抗，而最低限度，則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斷絕中國自由平等之鎖鍊。與共產黨之濫用排外手段，更大是相反。從前本黨容共時代，宣傳裏頭不免往往夾雜些共產黨的調頭，這應該注意矯正的。至於擬想到本黨驅共以後，便不妨拋棄了反

帝國主義的主張。這是說夢，若更癡想到本黨聯共以後，帝國主義者便會來修好，那更不知夢到那裏去了。

（三）喚起民衆　本黨喚起民衆之目的與方法，也與共產黨完全不同，本黨爲民衆而革命，並非爲革命而求民衆。其所以喚起民衆，乃要使民衆知道革命與民衆本身有切膚之關係，使民衆起來，參加革命，使革命的利益歸於民衆。同時還感到民衆的能力須以漸養成，故定出軍政訓政憲政的計劃步驟，使民衆的幸福，與民衆的能力。同時增進。至於各民衆之間則務引導之，使向於共同的利益而進行，而務引避其相互間之利益衝突。此於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其他重要宣言訓令決議案裏，已不憚反覆說明。至於共產黨呢，口裏說爲民衆而革命，其實是爲革命而求民衆，口口聲聲無非說怎樣「抓住民衆，」抓住二字，何等兇狠，恰如鷹抓住兔一樣，而其所謂民衆，又不過祗是無產階級民衆。在無產階級未發達的地方，則無業遊民，也算在內。抓住了這些無產階級其實無業遊民之後，對於其他各階級民衆一味打倒，有的說些「聯合農民」有的說些「聯合小地主小商人中地主中商人，

」有的說些「聯合小資產階級，」其實所謂聯合不過一時抓住了作工具，以後仍然要打倒的，這樣東打倒西打倒各階級民衆固然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所謂無產階級，也因經濟衰落的連帶關係，成了失業工人，於是無業游民的集團勢力，愈見浩大，而共產黨即利用之操縱之，以爲奪取政權之憑藉了。一般民衆所懼怕的是經濟衰落，而共產黨所蘄求的，正是經濟衰落。一般民衆，所憂慮的，是社會恐怖，而共產黨所蘄求的正是社會恐怖。他要將一般民衆因階級鬥爭而死亡的尸骸，做他跳上政治舞台的墊脚，此是共產黨與本黨極端矛盾的所在，也是本黨驅共的最大理由。如今驅共以後，共產黨說本黨不要民衆了。本黨所不要的，是矯揉造作出來的假民衆，花四角錢，僱一個人手持一面小紅旗，口裏大喊，這樣的老把戲，實在看慣了，也看厭了。本黨決不要這樣假民衆。本黨所要的，是一般爲民衆而革命的人，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驟的，來領導民衆，參加革命。固然要使民衆知道革命的成功，纔是民衆利益的總匯，同時也要於革命勢力所及的地方，於可能的範圍內，將民衆的利益一點一滴的，積累起來，使民衆知道革命勢力所到，便是民衆利益所在，即使有時不得已而使民衆犧牲

利益，也必要使民衆知道少許之犧牲在目前，而巨大之收穫在將來。於是民衆對於革命，纔能漸漸發生與會發生信仰，纔能漸漸起來，參加革命。革命與民衆利益之關係，日益密切，則民衆與革命之關係，也日益密切，這樣纔是眞民衆，纔是眞的革命民衆。我們不但不能如軍閥官僚之不要民衆，而且不能如共產黨之矯揉造作假民衆，我們所要的是眞民衆，是眞的革命的民衆。

各位同志，四十餘年以來艱難締造的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三年以來改組過的中國國民黨，荷在各位同志肩上，兄弟望各位同志努力，祝各位同志健康。

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說

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潘慶濤筆記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到這裏來，受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市政府那麼盛意的歡讌，實在很慚愧！很不敢當！但是，兄弟很想趁着這個機會，來和隔別了一年多的各位同志說幾句話，并且想求各位的指教。

兄弟離開了廣東，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個期間，廣東各位的同志，做了很多很偉大的工作。自從第一次北伐以來，在前方的同志，把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三大軍閥打倒，恢復了長江南北。第二次北伐，恢復了河南，把最大軍閥張作霖也打破了，若是當時沒有特別事故，爲之障礙，兄弟相信必定會發展到黃河以北去。同時在後方的同志，也很努力的做工作，使

前方得到勝利，後方得以鞏固，盡了很大努力，收了很大效果；兄弟對於各位同志，深致革命的敬禮！

我們在同志間，所要說的，不在於贊美過往的成績，而在於將現在應該怎樣進行，將來應該怎樣打算？多說幾句互相勉勵和互相督責的話。

我們記得本黨經過總理二十多年的努力奮鬥，才把滿清打倒，建樹民國；又經過了十六年，才有國民革命軍這次的進展。第一次的成功，軍事勢力達到了長江南北，一部份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其勢力已到了山東；滿清才退位，民國才統一。這次的成功，似乎很快，雖然是快，但只有軍事的進展，沒有黨務的進展，因此便不是眞正的成功，才有後來的許多糾紛。

第二次的成功，才幾個月，軍事勢力便已達到長江南北，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如第四軍第十一軍，其勢力已恢復了河南。這次的成功，似比辛亥革命的成功還快，但是也同一看法，黨務仍沒有多大的進展。

一方面軍事的進展，前後方的同志經過很多的勞苦，很大的犧牲，才博得來，是我們很

値得安慰的！但是黨務還沒有進步，怕不怕會蹈的辛亥的覆轍呢？若是再一個覆轍，又要經過十六年的糾紛，我們又將如何打算？關於這些問題，想各位也是抱着同一感想的。所以不應該祇說過去的奮鬥成績，而急待解決的，就是「現在怎樣進行，將來如何打算？」

各位想想，辛亥革命爲甚麼不能成功；是否帝國主義的壓迫，軍閥的阻礙？不錯，這的確是有的，但這都是外部的阻力，還不十分要緊的；最要緊的，就是內部的障礙。辛亥革命的失敗，與其說是袁世凱或是六國五國銀行團所致，不如說是受內部同志的影響。這是怎麼說呢？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引章太炎先生的話說過——這位老先生是黨裏的老同志，他所說的話，可以使黨裏的同志搖動信仰總理的念頭的。他怎麼說，他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總理說這兩句話時，異常奮激說「於是大家聞聲附和，弄到現在只看見軍，沒看見黨，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成績，所以本黨至今仍是失敗，」直到現在，這幾句沉痛的話，還在我們的耳朵裏。

到了南京政府成立，也是一種新花樣出現：宋教仁先生勸告總理只要民族主義和民

權主義「不要再說民生主義了。」總理當時拍案大怒說：「我們惟其要民生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才去革命；若是不要民生主義，我們儘可不革命了！」

一個說不要黨，一個說要刪去黨的主義；這兩個是甚麼人？是章太炎宋教仁兩位先生，都是黨裏的老同志！所以黨務不振，不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罪惡，而是因爲老同志們搖動同志對於總理的信仰心，不能跟着總理去革命，因此革命便遭失敗！幾個月內推翻滿淸，而黨便十六年來蒙了大害，可見外面的惡勢力容易消除，內部的便艱難了！說到這裏，想各位也有同樣的感慨。剛才聽見主席王同志說充實革命的理論，嚴密革命的組織，這兩句說話，是很好的！革命的組織嚴密，使得建設一個强有力的黨，革命的理論充實，做革命工作時便有了把握。

這幾個月來，碰見了吳佩孚，便打破了吳佩孚，碰見了孫傳芳，便打破了孫傳芳，碰見了張宗昌張作霖，便也把他們打破；碰見一個，打破一個；軍事上可說得是沒有抵抗，軍事的進展可說得很快，但是黨務又怎樣？又到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時候了！

各位想想，這處是甚麼地方？本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舊址。中央執行委員會爲甚麼搬去，是因爲軍事的進展，所以由廣州搬到武漢。今年八九月間又由武漢搬到南京。進展的確可說是進展，革命軍的進展的確可說是革命軍的進展；現在怎樣？現在這個「進展」消滅了！請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到那裏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消滅了！爲甚麼消滅？不是被帝國主義消滅，不是被軍閥消滅，而是被老同志消滅了！本來大家因爲容共反共的問題，已經有了多少意見。武漢方面，因爲清黨遲了，所以武漢的同志到南京去，到上海去，見着一班老同志，總是引咎說「我們反共遲了！」責己很深，期望大家也很切，無非想把我們中國國民黨弄得好好的。那知到老同志們回給我們的甚麼？回給我們一個不要總章，不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而要特別委員會！辛亥革命是因爲不要黨的原故，所以才失敗；到現在又是這麼了，又要消滅黨了，把黨裏最高的機關消滅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吳佩孚消滅不得，孫傳芳消滅不得，張宗昌張作霖消滅不得，現在老同志消滅得了！總理的遺訓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到了現在，原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經腐化

了，腐化到要消滅中央執行委員會了！總理假使仍在，見着這種情形，多麼痛心！多麼悲憤！

我們忠實的同志，想設法補救，設法糾正，這些老同志便製造出一個標語說「反對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哼，我們可以改作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

如果不忘總理的遺訓，總理的革命策略，總理的革命主義，那麽無論老同志也好，新同志也好，總而言之，都要緊記着，一定要把中央執監委員會恢復，不要使中央執監委員會亡於老同志手裏，這點是要向各位詳細說的。

兄弟剛才在這個地方感觸起中央執監委員會的過去和現在，所以不能不詳細對各位說說。

還有一層，現在覺得黨的情形，比辛亥革命還要危險。辛亥革命後不過只是老同志想消滅本黨，現在要消滅本黨的，除了老同志以外，還有一班從前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共產黨。說到這層，不能不把武漢的經過情形，對各位說說。

有很多人要問武漢的同志，因爲篤守總理的容共政策，所以纔不惜和一些老同志分

離，然而不久却又和共產黨分離，是不是思想矛盾。兄弟可以回答，這完全不是思想矛盾。以前因爲是篤信總理遺教來容共，後來也是因爲篤信總理遺教才分共，是同一樣的精神，絕不是利害的屈服，而是事實上的變遷。從前的容共，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幫助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工作的。不錯，他們以前確有相當的工作表現。到後來發覺了共產黨確有陰謀消滅國民黨的證據，便要反共了，要知容共不是容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要緊記我們的主義。我們照着主義去革命是根本上解除民衆痛苦，爲民衆謀利益的。共產黨在武漢的情形，便不是這樣，詳細的經過，現在這個短促的時間，很難說得完滿，現在舉兩個例來說，第一是工人運動，第二是農民運動。

先說工人運動的例。我們到漢口時，見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當初不明瞭是甚樣原故，後來忽接着漢陽縣黨部的通告，說已把十五間工廠沒收，多設管理委員會交給工人管理。這時廠主不用說，當然是失業，就是工人的本身也是失業，便紛紛寫信來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設法維持。漢陽縣黨部辦理這件事情，沒有問過省黨部，沒有問過中央執行委員會，而

擅自處理，究竟是甚麼居心？而且工人管理工廠，他們共產黨已經實驗過兩次，都是失敗的。一次是在俄國，當民國六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時，便把工廠收歸工人管理，但是不久工廠便沒有材料沒有燃料，而且還沒有錢給工人的工資，弄得不得了。幸而這時俄國革命已經成功了，把工人的管理權收囘，由國家來管理，才能夠維持下去，但是工人已經吃苦不少了！這是一個例，其餘一個是在意大利。當大戰以後，共產黨人也曾霸占工廠，給工人自己管理，便很得意的豎起紅旗唱革命歌！那知到快活了不久，便也和俄國一樣的情形，弄到工人自己不能維持，要請政府調停；那時候，被意大利的棒喝團首領慕沙里尼看破，意大利的工人運動便受了絕大打擊了。漢陽縣黨部沒有經過上級黨部的許可，而擅幹出這件事情，已經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還要去幹他們試驗過已經失敗的工人管理工廠的勾當，這不但是違背本黨的政策，而且不是爲民衆，尤其不是爲工人謀利益的所爲。所以在政治會議當中，我們便極力反對這件事情，當時可以看見出席的共產黨員是若何氣怒；但是無論他們怎樣氣怒，這種工人運動的謬誤，我們不能不起來糾正的。

次要說到的，是農民運動的例。他們硬要實行土地革命，不管適合中國的環境不適合不管適合當地的情形不適合，只把俄國的本子一字不易的抄來。我們看看俄國，自從一八六一年便開始要求土地革命，到一九〇五年還沒有成功，直到一九一七年才能成功；但是為甚麼以前總不能成功，直到這個時候才成功呢？這是因為聯合了農工兵一齊幹去的原故。因為兵，多數是農民的子弟，土地問題，和他們是有直接影響的，工人也有些間接關係，所以一聯合起來，都能夠同心合力的鬥爭，力量增大，才能夠成功。歷史上有名的，因「土地飢餓，」才發生「土地鬥爭，」這是俄國特別情形。中國共產黨徒，不去考察俄國情形，與中國適合與否，一味的去抄本子，已是大謬。而且實行的時候，不注重聯合民衆，而反去離間民衆，弄到民怨沸騰，幾乎把湖南革命根據弄翻了。我們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俄國農民運動的方法與理論，國民黨不能采用的。何況他們這樣亂做，危害了國民革命的前途，我們如何能不加以糾正呢。因為糾正的原故，便得罪了他們，他們說要改造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改造國民革命軍。總而言之，反對共產黨的他們便要改造，便要排擠，還使種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使中央

執行委員會爭鬧，使國民革命軍打架！舉例來說：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辦事的何部長和兄弟，都是死命持着總理的容共政策原意不放的，他們便先攻擊我們。現在在座的張發奎同志，是努力革命的武裝同志，他們便先向四軍十一軍攻擊，挑撥賀龍葉挺從中作怪，還要謀害張發奎同志。他們以爲不消滅革命的武裝同志，便沒法奪取政權，所以不憚用盡方法，使局面糜爛！武漢的同志看淸這點，所以不能不加以制裁，不能不淸黨！共產黨存在，國民黨便不能存在，我們中國祇需要三民主義的，要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能夠成功，所以我們便堅決的實行反共。

在這兩重壓迫之下，一方面有老同志腐化份子的壓迫，一方面有共產黨向着我們進攻，比張作霖，楊森，夏斗寅還利害幾十倍！所以一班同志和兄弟從今年的四月直到八月，都竭盡心力在這兩重壓迫之下來奮鬥，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爲國民革命而奮鬥。老同志方面，說我們是準共產黨，是共產黨的走狗。共產黨方面說我們反革命，腐化。我們都不怕，還繼續的奮鬥着，守着總理教給我們的方針，向着總理指給我們的大路前進，說我們腐化也好，說

我們準共產也好，我們仍舊始終不變的前進！

現在兩重壓迫的勢力依然存在，南京還有特別委員會，中央執監委員會還未恢復，覺得我們的爭鬥，仍要繼續進行，要把老同志中之老腐敗，不要黨章，不要中央執監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的分子打倒，使第四次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得以開會，使中央執監委員會得自由行使職權！如果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在他處不能開得，在廣東可以開得！前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達到了長江南北和河南；這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相信可以達到了北京！

剛才有幾百工人到我這裏來，說打倒個人的不必說，還說「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國民黨的假面揭穿，共產黨的成功萬歲。」又可見惡化的勢力還在，我們更應該繼續努力，把這些既加入國民黨而從中陰謀消滅國民黨的共產黨一律肅清，保持着固有的精神，使國民黨日益鞏固。這樣做去，兄弟相信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會早日成功！

守着總理留下的組織，不要分散！照着總理留下的教訓，不要凌亂！確定我們的信仰，不

要動搖！前進努力不怕危險，不避艱難，完成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

最後，兄弟抱着滿腔的革命熱誠，敬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武漢分共之經過

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大講，林霖記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會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為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之經過」武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

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敍說，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於事實有關係於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於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於什麼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見滿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攏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爲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着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麼政策什麼主義，然後才定出什麼政策什麼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

間便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祕密革命運動起以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需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握有軍閥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爲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總理即發表一個宣言，即北上宣言，說明不僅在要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之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

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能再和他們聯合，即吳曹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爲段張巳爲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爲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

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爲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爲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內否決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議。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決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

黨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為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為三派：一派人稱他為最右的。他們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是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落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為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滿，反對很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現狀尚且如此不滿，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落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革命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為共產黨加入國

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的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是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中文，用眞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是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裏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辨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的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麽解

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說，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麽呢？如果是兩隻船，同走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是一隻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卽使時機未至，

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麽要容共，我們試看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路在鄧本殷手裏。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尚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楊，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便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楊劉已在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楊劉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在沙基殺我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去，把當日克復

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胆的，殺死了廖仲愷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着，只顧往前面直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曾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間，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

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為避去一切離間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載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為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裏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孑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庭，

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的，以為必需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為共產黨所把持。兄弟說道，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粹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看見李石

會同志所編「革命」曾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函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發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精衞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不同，汪注意於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原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然從這封原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多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決定移往南京，極爲欣慰，以爲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決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爲蔣同志等是不對的。但是如今看來，不但不是蔣同志的不對，而且是兄弟的不對。因爲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卻不出蔣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

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陳獨秀發表過一篇關於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裏。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等，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

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誓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裁制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的了。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做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份子雜在裏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麽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時代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

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候，死尸堆裏可以證明。卽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死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鮑羅廷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廷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

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爲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決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革命，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而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爲湖南事變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搆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要是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決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

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黃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為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庭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為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為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庭的意思，則以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為國民黨的，見了這決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鮑羅庭的，遂將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緊張，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

議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廷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裁制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爲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裏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裏，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胆做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裏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建立非法

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爲明顯。兄弟如今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攷。

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尤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因爲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存留在國民革命軍裏頭，要想利用軍隊的地位，以爲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荼毒，其流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便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爲危險，在河南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埔；夏斗寅軍隊

到了土地堂，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共產黨乃乘人之危；德國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洛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爲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可見共產黨在當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爲「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鬪，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總理的精神擺在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爲國民黨而分共，是爲三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是不是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臥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國民黨到了五六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之暫時虛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補元氣，便能回復健康。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剖腹以後，健康未復，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用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間已實

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爲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之熱症，不能不以全副精神去治好他。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時期以內，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卽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旣然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夠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分的必要工作，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能夠的，還要做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之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下，在黨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這些工作，担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要能夠於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爲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應該如何做法，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麼田地！

我們要把精神力量聚集在黨裏，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于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分共以後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

上回說的，是武漢分共之經過。黨內分共，武漢爲最難，亦爲最遲。及至最難的部分，已得到最後的解決，分共便成爲黨內一致的主張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分共以後要怎麼樣？兄弟在此，想提出幾個要點。

第一，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所謂分共，是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裏，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後，便怎麼樣呢？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宣言，都有同樣的語調，即是一面攻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一面仍主張不要退出國民黨。這顯然是藉着國民黨的掩護，以破壞國民黨。恰如要將國民黨做鷄蛋殼，而他却要做雞蛋殼裏頭未孵化出來的雞雛，平時借着鷄

蛋殼的掩護時候到了，卽破蛋殼而出。這種一相情願的事，只好說是妄想。他爲要實現這妄想，已經定下種種計畫。綜合幾個月來，莫斯科所發表的議論，以及中國以內所得到的報告材料，他的計畫，大概是：以蒙古爲根據，向北方各省，逐步進取。他以爲國民黨在北方各省的勢力，比較微弱些，可以爲所欲爲。至於南方各省，無論什麼運動，都有國民黨做他的對頭，所以他必以破壞國民黨爲第一著。其破壞方法，除在國民黨外實行種種擾亂，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國民黨內，做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他以爲國民黨分裂之後，創痕是一時不能卽合的，借此機會，使國民黨自相殘殺，不難使之同歸於盡。如此說來，現時所謂分共，只能說是國民黨已經確定的主張，而不能說此主張已經完全做到。如今担負國民革命之責任的，是國民黨，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不但國民黨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中國國民也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

第二，我們要重新整理國民革命的理論。我們所謂分共，不但要將共產黨分子，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尤其將要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國民黨自施行容共政策以來，共產

黨分子，在國民黨名義之下，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如今共產黨分子，雖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論，仍然存在於農工商學各團體裏。農工商學各團體，倉卒之間，不能分別出那些是國民黨的理論，那些是共產黨的理論，這已是極大的危險，而尤其危險的，是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頭，有些熱心的人，本來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而誤認共產黨的理論，是國民黨的理論，且以爲是國民黨裏頭最革命的理論。這種的人，說他是共產黨，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論，却與共產黨一般無異。這種的人，在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遇見了不少。所以國民黨當前最急的工作，是將數年以來，國民革命的理論，重新整理一遍。將共產黨的理論，夾雜在國民黨的理論中的，一一剔了出來。明明白白，指示給農工商學各團體，這些是共產黨的理論，必須拋棄，這些是國民黨的理論，合乎國民革命的需要。然後農工商學各團體，方不致迷了方向。這不但是國民黨當採的手段，而且是國民黨當盡的義務。不然，只將共產黨分子分出去，而共產黨理論，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至於整理的方法，當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義爲度量衡。凡理論之合於三民主義者

則留，不合於三民主義者則去，不能有絲毫苟且假借。舉例來說，階級鬭爭，是共產黨的信條。而民生主義裏却已將階級鬭爭的理論，批評得清楚。人類因有階級，纔有鬭爭，這是事實，無論何人，不能無視的。如其要消滅鬭爭，必先要消滅階級，階級消滅，則人類致於平等，進於大同，自然用不着鬭爭了。這一點，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總理說「民生主義，卽是共產主義。」然共產主義，是要無產階級，用鬭爭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階級，卽有時貪圖聯合戰線的便利，與農民同盟，甚至與小資產階級同盟，都不過一時的便利，不是永久的結合。所以各階級間之互相殘殺，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是有意做成，並非是出於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義，則是用思患豫防的方法，使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以引而致之於自由平等之域，所謂事半而功倍。所以總理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因爲經濟落後，大工業沒有發達，沒有什麼大資本，沒有什麼大商業，所以社會階級，是不甚懸絕的。而且就全社會看來，

最大的壓迫階級，是帝國主義，而全社會皆處於被壓迫階級的地位。所以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祗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社會間各種力量，應該分功合作，以達此目的。提出階級鬬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國現在的情形來說，已是如此。照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來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所以要達到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也不當採用階級鬬爭之方法，而當採用聯合社會間各種力量的方法。

如今舉幾件實事，來做證明。

先就農民運動來說，自去年北伐以來，共產黨在兩湖做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須知道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得明白，是要用

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並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把耕者有其田的意義，更解說得詳細。共產黨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沒收土地，並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這種做法，正是民生主義所痛恨的。我們分共之後，必須向農民解釋明白，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之理論與方法，和國民黨的，全然不同。共產黨之農民政策，所謂沒收土地，不過說得好聽。其實農民不但沒受其益，反受其害。因爲他只圖唆使農民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其結果社會聯鎖，爲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他却正好利用這些失耕農民的騷動，以爲其獲取政權的憑藉。這眞是農民之蟊賊。至於國民黨之農民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於農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農民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更爲非常密切。我們可以對每一個農民說：農民所患的，不是沒有土地麽?然而中國有些地方，土曠人稀，農民不愁沒有土地，却愁有地不能種。近年以來，所謂華北旱災，深知原因的，知道不僅是由於天旱，却是由於有地而不能種。因爲農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體手足，便可勞動，以得工錢。農民單是勞動，還不夠的，勞動之外，還要本錢。買牛，買耕具，買

種子，都是非有本錢不行的。農民何處得本錢呢？是由於借貸。鄉村間的高利貸，說起來，駭人聽聞的。農民從高利貸得到本錢，幸而那年無水旱之災，得以豐收，租稅之外，得以還債及供衣食。不幸而那年有水旱之災，賠了本錢不算，還要賣兒賣女，以納租稅，及還債呢。這便是有田而不能種之一原因了。所以農民問題，不是有了土地便得，還須計及本錢。各處設農民銀行，以輕微利息借給農民，資其耕作，纔可以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農民銀行，談何容易？若不是國家財政充裕，社會經濟舒展，何能辦到？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農民本身，而當兼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錢，似乎可以耕作無憂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刼，不但禾稼被其蹂躪，雞狗被其殺戮，田廬被其焚掠，有時連兒女也被其擄去勒贖，再遇着不良軍隊，眞所謂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社會相互經濟關係，而當兼着眼於政治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農民似乎可以安居樂業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出口的是農產品，入口的是工業製造品。農民辛苦種出來的豆子，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搾成豆油等

等，運之入口，農民辛苦種出來的棉花，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織成棉布，運之入口。其價値相去，不止倍蓰。諸如此類，數之不盡。農民將一滴滴的汗換得來的金錢，以爲可以放在手裏，不知其結果是加倍蓰賠了出去。幾十處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幾十個創口，有限的膏血，從幾十個創口裏日夜流出，無論如何強壯的人，也要病倒的，何況是著名的遠東病夫呢。不平等條約，片而義務的關稅制度，如果不能廢除，全國勢必淪於破產，農民自然不能倖免的。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政治關係，而當兼着眼於國際現狀了。

以上所說社會關係，政治關係，外交關係，和農民本身密切連帶如此。可見得國民革命的三個口號（一）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二）打倒軍閥，（三）打倒帝國主義，正是農民運動所必需的。這三個口號，爲國民革命計，亦卽爲農民計。國民黨的農民政策，實實在在，是爲農民謀利益的。經此一番解釋，農民定必恍然無疑。再不去上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老當，而明白承認民族聯合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爲農民解放運動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運動來說，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

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攷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產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其他階級，更不用說。今年五月間，漢陽縣黨部，爲共產黨所把持，擅自議決，沒收漢陽十五間工廠，組織工人管理委員會。須知道工人管理工廠，是共產黨已經試驗過失敗的事情。俄國十月革命之初，曾經幹過工人管理工廠，不多幾時，原料缺乏了，工資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見勢絀，不能維持下去，趕快由國家收回管理。意大利當大戰以後，曾有一兩處演過工人管理工廠的喜劇，當其佔領工廠之始，豎起紅旗，唱國際歌，十分高興，不多幾時，原料工資燃料都無着落，無可奈何，及去請求政府替他向資本家調停，於是慕索里尼窺見弱點，乘之而起，以棒喝團把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這兩件失敗的經驗，中國共產黨豈有不知道的。何以還想在湖北從新搬演？哼，你以爲這是他的愚獃麽？其實正是他的狠毒。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廠，其勢不能維持。一面以要求國家管理，挾制國民政府，暴露其弱點。一面利用工人失業之衆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他

只圖以共產黨替代國民黨，操縱國民革命，工人的死活，那裏放出他的心裏。所以與其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友，不如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敵。至於國民黨之工人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也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于工人目前之需要。而且工人之解放，與國民革命，息息相關，也和農民一樣。國民革命，不專爲工人謀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於國民革命成功之後纔得到眞正之保障。國民黨戮力於國民革命，卽是戮力於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必不再信共產黨什麽無產階級獨裁騙人的話，而誠心誠意，加入國民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

再就商民運動來說，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倒資本，」國民黨的口號，是「節制資本，」兩個口號，截然不同。共黨還利用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名詞，今日說打倒這個，明白說聯合那個。九月中旬，我到上海，聞得人說南京淸黨的時候，捉着一個當舖的老板，說是共產黨，這固然是奇聞。五月中旬，我在漢口聞得咸寧縣黨部的宣傳，有五十塊錢以上的，便是小資產階級。我想田舍間養一只耕牛，價値往往在五十元以上，然則一只耕牛也是一個小資

產階級了。我因此聯想到布哈林說過，「我們對於聯合農富，其意味等於養取肥牛，搾取牛奶。」所以共產黨說聯合小資產階級，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麼聯合，不過打倒的代名詞便了。至於國民黨之節制資本政策，在建國方略裏，說得最爲明白。「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卽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所以打倒資本的口號，實與國民黨政策，大相違背。容共時代，有些黨員，隨着共產黨的口吻，高叫打倒資本，實是大上其當。分共以後，按照民生主義，和實業計畫，切實宣傳。並時時注意於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則一般商民和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

再就學生運動來說，五六月間，我聞得湖北省黨部青年部的宣傳，有所謂「讀書卽是

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時不信，以爲斷沒有如此荒謬的人，說如此荒謬的話，後來問顧孟餘同志，始知確有其事，眞是可惡之極了。不讀書的仍然好叫做學生，猶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農民，不做買賣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眞是名實不符之至。他還說道，「打倒智識階級。」社會譬如人身，勞動階級，要打倒智識階級，譬如兩隻勞動的手，要打倒一個儲智識的腦，何愁不打倒，只怕同歸於盡便了。如果想中國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必須有自由平等獨立之文化。這個責任全在學生身上，學生不去求智識，是自暴自棄其責任。而所謂打倒智識階級，是逼人自暴自棄其責任。這眞眞是亡國滅種之罪人了。孫文學說，諄諄告人以知難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決沒有如此滅裂鹵莽的理論的。

以上嚕嚕囌囌的，說了一大段，是證明對於民衆運動之理論及方法，共產黨的，與國民黨的，截然不同。分共以後，第一要義，是將共產黨的理論，從國民黨理論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聲聲，不要民衆，凡有接近民衆的，幾乎就要疑心他是共產黨，這種荒謬心

理，固然可恨可憐。但是接近民衆的時候，如果不將國民黨的理論認識清楚，隨手檢起一些時髦舊辭，便根據宣傳，也是莫大的危險的。

第三，中國國民黨第一緊要的口號，是「建設起來。」我們的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些誠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後，可怎樣呢？自從北伐以來，我們已打倒了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不久便要打倒了張作霖，我們已收回了漢口九江英國的租界，我們已將共產黨驅逐出國民黨以外，這些工作，在國民革命史上，誠然有相當價值的。但這些都是消極的工作，不是積極的工作。只能在國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礙。還沒有將國民革命的目的，實現出來，所以今日我們第一緊要的任務，是將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實現出來。即使一時力不從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綱，不可不求其實現。今日國民之望治，眞眞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了。孟子說得好，「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又說，「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這眞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亂思治的心理。我們不要性命的去做國民革命，如能爲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獲得一點點的幸福，我們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們如

其能建設起來，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以前做過的，不爲徒勞，以後做去，當更有把握了。不然，不但不能打倒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反爲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做機會了。

以上所說三點，都是分共以後，必要的工作，隨便說來，期與諸同志努力做去。